

洪堡人类学和教育理论文集



大学—思想与制度 书系
崔延强 主编

HONGBAO RENLEIXUE
HE JIAOYU LILUN WENJI

安德烈亚斯·弗利特纳 编著

胡嘉荔 崔延强 译

重庆大学出版社
<http://www.cqup.com.cn>

洪堡是18世纪著名的教育改革家，他在当时的普鲁士教育部任职期间所进行的改革奠定了现代大学的教育模式。本书集合了15篇洪堡有关人类学和教育学的文章，如《论公共国家教育》《人的教育理论》。本书便于今人直接研究他的经典观点及哲学前提，了解现代教育的历史面貌，更加理性地看待当今的教育问题。

西南大学“211工程”三期建设资助

洪堡人类学和教育理论文集

大学——思想与制度 书系
崔延强 主编

HONGBAO RENLEIXUE
HE JIAOYU LILUN WENJI
安德烈亚斯·弗利特纳 编著

胡嘉荔 崔延强 译

重庆大学出版社

Humboldt, Wilhelm von:

Schriften zur Anthropologie and Bildungslehre /

Wilhelm von Humboldt. Hrsg, von Andreas Flitner.

Ungekürzte Ausg. —Frankfurt / Main; Berlin; Wien. Ullstein 1984.

(Ullstein-Buch; No. 39084; Klett-Cotta im Ullstein Taschenbuch)

ISBN 3-548-39084-6

因本译作之原著版权所有者无法联系,本社已将使用该作品的版税交给重庆市版权保护中心代为转付,请原著版权所有者与该中心联系。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洪堡人类学和教育理论文集/(德)弗利特纳编著;

胡嘉荔,崔延强译. —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3.9

(“大学:思想与制度”书系.第1辑)

ISBN 978-7-5624-7367-1

I. ①洪… II. ①弗… ②胡… ③崔… III. ①人类学
—文集 ②教育理论—文集 IV. ①Q98-53 ②G40-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191063 号

洪堡人类学和教育理论文集

安德烈亚斯·弗利特纳 编著

胡嘉荔 崔延强 译

策划编辑:林佳木 雷少波

责任编辑:李桂英 版式设计:林佳木

责任校对:谢芳 责任印制:赵晟

*

重庆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出版人:邓晓益

社址:重庆市沙坪坝区大学城西路 21 号

邮编:401331

电话:(023)88617190 88617185(中小学)

传真:(023)88617186 88617166

网址: <http://www.cqup.com.cn>

邮箱: fxk@cqup.com.cn (营销中心)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重庆现代彩色书报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930×1280 1/32 印张:5.5 字数:137 千

2013 年 9 月第 1 版 2013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624-7367-1 定价:28.00 元

本书如有印刷、装订等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版权所有,请勿擅自翻印和用本书
制作各类出版物及配套用书,违者必究

译者序

洪堡的教育观对德国的学校制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特别是他的大学理念对世界现代大学,包括中国大学有着根本性的影响。国内大约从1980年代开始比较集中地对德国教育史以及洪堡的教育思想进行研究。与洪堡教育观和教育改革相关的内容主要是在外国教育史、外国教育家评价等文献中被简单提及,并侧重介绍洪堡关于大学的理念产生的时代背景、主要内容以及产生的影响和被接受的程度等。也有学者对洪堡的教育思想和蔡元培等人的教育思想进行比较研究。洪堡的教育思想一直是国内学者关注的热点,研究呈现从宏观到微观,从抽象的理念到具体的办学模式的趋势。但目前国内对洪堡教育思想文献的译介工作做得不够。一则因为国内教育界缺乏精通德语的专业人才,一些与德国教育有关的文献也大都译自英语、日语或俄语,而且涉及德文引用方面也有不少错误。二则因为洪堡本人并没有一本专门论及教育的著作,他关于教育理念以及教育改革的思想散见于其政治学、人类学、美学、语言学等作品中,也见于写给国王的报告以及与亲朋好友的通信中。三则因为洪堡的文章多写于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其语言较现代德语难懂,比如用词较古旧,上下文指代不明确,从句套从句,断句不明显,有时未添加标点符号等,加之涉及的内容又较广泛,因此翻译有一定的难度。

原文参考文献中涉及的洪堡总集有3个版本,按时间顺序分别为卡尔·布朗德斯出版:《威廉·冯·洪堡总集》,7卷本,柏林1841—1852(Wilhelm von Humboldt's gesammelte Werke. Hrsg. v. Carl Brandes. 7 Bde. Berlin 1841—1852);普鲁士皇家

科学院出版:《威廉·冯·洪堡总集》,17卷本,柏林1903—1936(Wilhelm von Humboldts Gesammelte Schriften. Hrsg. v. d. Königlich Preußig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17 Bde. Berlin 1903—1936);《威廉·冯·洪堡:五卷本》。编者:安德烈亚斯·弗利特纳;克劳斯·基尔。达姆施塔特:科学出版社和斯图加特:科塔出版社1960—1981(Wilhelm von Humboldt: Werke in fünf Bänden. Hrsg. von. Andreas Flitner u. Klaus Giel. Darmstadt: Wissenschaftliche Buchgesellschaft, und Stuttgart: Cotta 1960—1981)。在译稿的注释中分别用17卷本,7卷本,5卷本来标注。

本书译自唯一一本德文版的有关洪堡人类学和教育理论的选择集,是编者安德烈亚斯·弗利特纳在5卷本(内容分别为“人类学和历史”“古代文化和美学”“语言哲学”“政治和教育”“自传片段、文艺创作、评论”。第四卷中与教育有关的内容主要来自洪堡在教育部任职期间所写的各类报告)的基础上再次精心选编的。书中选文集中体现了洪堡的教育理念,其中也含已有中译本的几篇文章。一来因为版权问题,二来为使译文风格统一,本书译者在参考同行译文的基础上重新对这几篇文章作了翻译。除此以外的其他文章乃是首次与中国读者见面,比如《论古代文化特别是希腊文化的研究》《人的教育理论》等,希望能供国内学者参考使用。

原编者在前言中已经对选编的文集和节选作了简单说明。为方便读者更好地理解本书,译者将原编者放在文集末尾的“生平与思想发展简史”置于前言之后,正文之前。原著注释放在正文中,编者的注释在全书正文之后,译者将两种注释都放在正文书页下面,以适应中国读者的阅读习惯。

译文有不妥或错误之处,望读者批评指正,译者将不胜感激。

感谢重庆大学出版社为译作出版提供便利。

前言

洪堡和他的同僚在他短暂的普鲁士教育部任职期间所进行的改革,已被同时代的人称为“教育革命”。洪堡改革的初衷是废除等级森严的教育制度,建立普通的、接纳所有社会阶层的、以培养人为目标的学校,这种学校要尽可能给予学生广泛的知识教育并赋予学生选择课程及学术研究的自由。这种人文主义教育模式不仅是 19 世纪德国教育政策发展的起点,也是有关德国基础教育政策和德国大学模式讨论的基点,尽管这个讨论离洪堡那个时代的哲学和教育理论相去甚远——那个拥有歌德、裴斯泰洛奇、费希特、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的时代。研究这些经典的观点和他们的哲学前提对我们理解教育是一如既往不可或缺的,它的重要性不仅仅在于要掌握教育的历史面貌,还在于感知我们现在面临的教育问题并且正确评价针对 20 世纪一切改革所作出的批判。

自从洪堡的这本选集面世以来,有关他的研究和传记有了长足发展,我自己也在研究洪堡文集 5 卷本^①的过程中学会了对一些问题作出不一样的评价。今天我仍然认为这里所收集的文章对标题所涉及的主题是最重要的。如果人们想从整体上把洪

^① Wilhelm von Humboldt: Werke in fünf Bänden. Hrsg. v. Andreas Flitner u. Klaus Giel. Darmstadt: Wissenschaftliche Buchgesellschaft, und Stuttgart: Cotta 1960-1981.

堡作为思想史上的一位大人物和富有影响力的思想家来进行研究,并把这本小册子作为一本入门读物,那就还有两篇文章值得推荐:一篇是《论语言发展不同时期的比较语言研究》(1820,收录在第三卷 1-25 页),包含了洪堡语言哲学最重要的思想,另一篇是洪堡的《阿迦门农》翻译入门(1816,收录在第五卷 137-145 页),以少量的篇幅谈到语言的可译与不可译性在文化理论方面的一些思考。通过这两篇文章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年轻的洪堡在尝试了历史的、性格学的和相面术的研究之后,他的人类学思想是如何在他广泛的语言哲学里找到系统的构成和专业基础的。洪堡成就最伟大、最有影响力的领域是语言哲学——如今几乎没有哪个重要的语言学研究流派不涉足他的语言哲学(参见第五卷第 442 页和 632 页);他思想的其他主要方向都在这本选集里了,包括教育理论(第 3 篇)和教育理论研究基础——古希腊罗马文化(第 2 篇)、人类学(第 4 篇、第 5 篇),中小学教育(第 7 篇、第 8 篇)和裴斯泰洛奇教学方法的建立(第 14 篇),论述了柏林大学成立的纲领和 19 世纪德国大学模式的大学理念(第 9 篇),最后还有人文科学方面有关注释学、历史学的经典理论(第 11 篇)。

这本文集的第三版是在第二版的基础上出版的,文字和备注未加改动,只是书目修订了一下,评论和备注更为详细,还有第 3、第 4、第 9 篇的一些时间说明标注在前面提到的五卷本全集的第五卷中。

安德烈亚斯·弗利特纳

生平与思想发展简史

选集的末尾对洪堡的生平作了一些说明,为方便读者理解,译者把这部分内容放到前面并有少量删减。文集内容没有一丝一毫的改动,只有个别不太重要的文献没标注。

洪堡认为他的生平只有在具有超越纯个人的内容和反映思想界的时候,才具有记录下来的价值,但他的作品不是康德式的自我冷静的思考,也不是黑格尔式的客观系统文献。它是非常主观的成果,深受他自己的教育成长经历、他的旅行、他和朋友之间的友谊以及他的各种经历的影响,没有这些个人的因素也就没有他的作品。

洪堡生于 1767 年 6 月 22 日,他的青少年时代在波茨坦和父亲的特格尔庄园度过,他的父母虽然给予他和比他小两岁的弟弟亚力山大符合时代和他们家庭地位的各种教育,但和孩子们之间沟通不畅。父亲稍微好点,但在他 12 岁的时候就去世了;而严肃内向的母亲总是关心自己和自己身体上的病痛,没有精力管他们。洪堡长大以后认为自己的青年时代是非常无趣的,而他在博爱的卡门普(约哈希姆·海因里希·卡门普,1785—1792 年出版了第一部现代教育百科全书,是德国启蒙主

义教育追求民主的代表),以及后来在性格呆板但内心善良的家庭教师昆特那里所接受的家庭教育更加深了这一印象。其后一些来自柏林的著名教师给他们兄弟俩上过课,这些课程以及洪堡自己的刻苦钻研都给他坚实的学问奠定了基础。18岁的时候他就掌握了希腊文、拉丁文、法文,通晓法国、德国和古希腊罗马文化。昆特又让他们上了贵族教育的必修课:法学、政治学和经济学课程。哲学课主要是在洪堡称之为“狼”的恩格尔那儿上的,他不仅给了洪堡严格的逻辑训练,还使他理解了莱布尼茨哲学。

比这些课程对洪堡影响更大的是他和柏林启蒙运动沙龙的交往,这些人中包括“柏林月刊”的出版者比斯特和盖迪克,集医生和哲学家于一身的马库斯·赫尔茨以及他的夫人亨里埃特(洪堡狂热地喜欢她)，“道德联盟”的创始人弗里德伦德尔和拉罗赫,后来 K. G. 冯·布文科曼和著名的出版商兼政治家弗里德里希·冯·根茨也加入了这个“道德联盟”。通过这群致力于维护道德的朋友和外围朋友伦厄费尔特的姐妹们,洪堡又建立了和其他人的联系,比如埃尔富特的总督神父助理达贝尔格,魏玛的席勒以及他自己后来的妻子夏洛琳·冯·达赫尔奥顿。

在奥德河畔的法兰克福度过的一学期没给洪堡留下什么深刻的印象,接下来在哥廷根待的三个学期学到的法学知识为他以后的政治生涯作了铺垫,但他把大部分时间都用在了其他方面:研究康德,特别是在施勒策尔的历史课上研究英国孟德斯鸠的国家理论;研究希腊的语文学和文学,海涅的研讨课为他渊博的古代文化打下深厚的基础;在海涅活泼的女儿特丽莎和她阅历丰富的丈夫格奥尔格·福斯特尔,以及奥古斯特·威廉·施勒格尔、对宗教颇有研究的弗里德里希·海因里希·雅各布等人身上获得了新的友谊,也使他思想上远离了柏林时期的许多想法。1789年他开始旅行,先和他最早的家庭教师卡门普去了

巴黎,那里正是法国大革命发生的中心,巴士底狱才被推倒几个星期,洪堡不怎么赞同卡门普的观点,但从这时候起他开始研究革命的政治方面的基本内容,也是从这时候开始他写的文章崭露头角。他继续旅行到德国南部和瑞士,在埃尔富特和卡洛琳订婚,1790年初回到柏林在柏林高等法院开始了先前设计好的政治生涯。由于岳父认为一个候补官员有损颜面,通过关系他又当了公使馆参赞,但这种生活不能让他满足和快乐,因此不久不顾朋友们的反对就主动放弃了职务,1791年他彻底辞去公职,在埃尔富特举行婚礼,定居在岳父母家。

放弃政治生涯不仅仅是想全心全意经营婚姻,这两个情趣相投、门当户对的夫妇之间进行内心思想交流的通信已经成为文学史中的一朵奇葩。而这正是洪堡对国家、宗教和教育等问题进行思考的时期,这一时期他也深受法国大革命和在此基础上产生的国家教育计划^①以及当时普鲁士发生的事情,特别是1788年《沃尔勒宗教宣言》的影响——这个宣言对背离学校里的信仰和法律惩罚以及失去职位的教义产生了威胁。洪堡的这些思想先反映在两篇小文章《论宗教》和《对国家宪法的思考》里面,然后在和根茨的通信中逐渐形成为《论国家职能的界限》。洪堡把一部分内容作为单篇文章出版,比如第六章“论公共国家教育”。这些文章在政治上的阐述涉及对法国大革命的印象,对1791—1792年德国思想界带来突变的好感^②,也混合了一个独特的贵族的个人主义的教育思想。他觉得在政府里从事的工作远远不能满足他,因为那时的政府看来只是保证外部安全的机构,充其量只能开路并创造条件让个人的力量得到发挥,但并不努力去影响个人的力量。

① 洪堡这里引用了法国政治家米拉博的观点。

② 参见毛瑞斯·鲍赫尔的《1789年革命》,巴黎,1954; Maurice Boucher: La Revolution de 1789 vue par les Ecrivains allemands ses contemporains, Paris 1954.

《论国家职能的界限》整篇都涉及个体的力量、它的维护与发展。“内在的力量”“活力”是不断出现的关键词。“我的想法,活力是人最根本唯一的美德”,“活力,仿佛是每种美德的源泉,是达到更高级更多元教育必要的条件”^①每种美德,绝不只是美学上的“思考并感受到的力量”,而是“研究和创造”,是一种天生就存在的力量,并能自我发展,塑造自我,作为力量发展,而不是被压制成固定的形式^②。政治领域不属于“力量”和思想的行为和形象。一切行为都符合自我完善的任务,并且只在和个人有联系的时候起作用。在艺术作品或者科学上,而不是社会团体更不是政府身上。

“人真正的目标是对他的力量(这个力量来自“内在的力量”和“活力”)进行最充分和最均匀的培养从而成为一个整体,对这种教育来说自由是根本必要的条件”^③“自由”就是个人的自由,这里出现了一对概念的对立,但这对概念并不是来自洪堡。这种对立在18世纪的政治和教育讨论中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那就是人和公民的对立。从术语上说它来自赫伯斯和普芬多夫,然后卢梭用在他的《爱弥尔》里面,随着大众媒体对法国大革命的传播,它便在同时代的德国政治教育学的系统学家那里流行开来了。卢梭一会儿把人设计为是天生的并厌恶存在的社会,一会儿又从完美的社会出发厌恶个体,这对这个概念,对人和公民之间的鸿沟影响很大,这也反映到了洪堡的思想中。这对洪堡和他的思想是不公平的,自从与1848年运动有关的《论国家职能的界限》出版并教条地运用以来,人们认为他在这篇文章中宣扬个人主义的自由。这也体现在洪堡后来在他的学

① 见7卷本《洪堡总集》第1卷第104及166页。

② 见7卷本《洪堡总集》第1卷第171及174页。

③ 7卷本《洪堡总集》第1卷第106页,参见鲁宾·施泰因的《作为洪堡道德原则的活力》,发表于《哲学杂志》,1905第13期;S. Rubinstein: Die Energie als W. v. Humboldts sittliche Grundprinzip, Zs. f. Philosophie, 13. Jg. 1905.

校计划中放弃了这种对立。

洪堡想致力于“力量的最充分、最匀称的培养”，他认为这种培养只能通过古希腊罗马文化和希腊人的知识，因此在随后的几年他专注于对古代文化的研究，研究因为中途几次旅行耽误了：他去柏林、北德，去拜访福斯、尼古诺威乌斯、克罗普施托克以及其他的朋友，然后去了哈勒，在那里他认识了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沃尔夫，他是德国古典语文学的泰斗也是新人文主义教育运动的领袖，他们之间内容颇丰的通信是这份友谊以及他们所描述遗留下来的思想运动的见证。他还常去埃尔福特、魏玛、耶拿，并始终与达尔贝格、歌德和席勒保持着友谊，从1794年开始洪堡兄弟因为这些友谊大部分时间都待在魏玛。

朋友们都醉心于古代文化的研究，他们还想扩大影响，因此洪堡和沃尔夫计划出杂志《海娜斯》，主要翻译和宣传实用科学，目的是传播古希腊罗马文化方面的知识，作为这个行动（没有得以实现）纲领性的导论也是自己教育追求的思辨，洪堡写了《论古代文化特别是希腊文化的研究》。

在这篇文章里一个概念起了作用，它是洪堡所特有的，在某些地方，尤其是西格弗里德·凯勒的最重要的专著中对它的误解导致了令人遗憾的错误阐释。通过对古代文化的学习研究，洪堡提到，同时代的人必须走出具体化和功利化回归到“内在的美和享受”，“纯粹享受的人”是在更高贵时刻的人，高贵最充分的快乐是人在自我审视和与人交往过程中享受时体验到的。对人的研究就是为这种享受做准备，同时也是这种享受最重要的内容。^①

“享受”这个词在这儿不能从现代狭义的范围上来理解，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虽然那时就流行而且被康德作为贬义用，洪堡

^① 见7卷本《洪堡总集》第1卷第260和275页。

对这个词的运用是从另外一个传统上来说的、虔诚派就曾提过神的享受；克罗普施托克把这个词用来描述多方面的感觉体验，对自然、艺术和人的观察、深思、领会混合着宗教的热情作为享受被经历；“狂飙突进”^①认为享受是他们感觉体验的关键词，他们特别谈及自我享受、自我心灵和自我内心的享受，认为是主动和被动之间的一种漂移状态；赫尔德认为“存在即享受”，享受从体验、人的可能的获得这个意义上来说对人自身是延续性的。^②

洪堡对这个词的使用是从这个意义上说的，像赫尔德一样这个概念主要是归属于对人的理解。洪堡在《论国家职能的界限》里就已经提到：人在他感到力量的和谐得到最大程度发挥的时候最享受。即使是最痛苦和自我毁灭也包括在真正的享受中^③，在《论古代文化的研究》中享受被认为是生活中高贵的时刻并和对人的研究以及洪堡特有的人类学紧密相连。这个概念和享乐主义或者感官享受作为目的本身^④毫无关系。

与《论对古代文化的研究》同一时期写成的片段是《人的教育理论》，文章的题目来自第一位出版商莱茨曼，但题目和内容并不完全匹配。更多的是有关学术理论的方法（费希特的还没出版）、有关系系统论和学术概况以及考虑到对人的知识和人的教育有贡献的其他思想成果的计划、有关作为教育理论前提的科学。

“教育”这个词那个时候还不具备现代意义，因此人们还谈

① 18世纪70—80年代初发生于德国的一场声势浩大的文学运动。——译者注

② 参见曼弗里德·格里福的《享受词组的含义——歌德的享受》。博士论文，柏林，1956；Manfred Gräfe: Der Bedeutungehalt der Wortgruppe genießen-Genuß bei Goethe. Diss. Berlin 1958.

③ 见17卷本《洪堡总集》第1卷第126页。

④ 见科勒的书第26页。西格弗里德·科勒：《威廉封洪堡和政府》。第二版，哥廷根，1963。Siegfried A. Kaehler: Wilhelm von Humboldt und der Staat. Ein Beitrag zur Geschichte deutscher Lebensgestaltung um 1800 (1927), 2. Auflage. Göttingen 1963.

不上“教育理论”，教育的意义是在洪堡自己也参与的思想运动的影响下才出现的，因此他的“教育”还有以前的意义上说的外表的身体上的塑形，也指思想形成和人的教育，带有以前的内涵以及塑造的美学含义。塑形这个意义比如今在语言的使用上强得多。^①

在这篇文章里洪堡的兴趣从对古希腊罗马的语文学和实用学科转向研究古希腊罗马人和他们的教育以及人的可塑性上来了。他一开始就确定和启蒙教育家所持的平均完善性观点不同。显然人的机会和命运有多样性，就像古希腊罗马人和现代人之间的比较所表明的多样性那样，该是用类型学研究这种多样性的时候了。洪堡从人最基本的不同开始首先在席勒的《女神》上发表了两篇文章《论性别差异》和《论男女形态》（1794—1795年）。他在文章里面用了康德的术语，但观察方式完全不同于康德：广义上的相面术，是对内外天赋的共同观察，是用男人和女人这两种最基本的形态表现出的理想的人的形态学。

在对人类进行批评式的分类和形态研究中洪堡认为找到了他的根本任务。对性别差异的研究只是一部大部头著作的序曲，这部著作应该成为“用不同的形式来认识和评判人的性格特征”的科研基础。洪堡大胆地希望“通过不断的深入思考和广泛的学习，对各种各样的人、国家和风俗习惯进行孜孜不倦的研究最终会找到通晓人类伟大人物秘密的钥匙，最终会发现规律，用这个规律人们可以给每种特征作出判断，给他们规定发展的方向”。^② 最初在《比较人类学计划》中他阐述了这个研究的影响范围和方法。如果这个计划实现了的话，正如他在写给沃尔夫

^① 没有让人信服的阐释“教育”这个词的历史，见沙施密特的材料：《教育（动词）和教育（名词）的词义变化》，博士论文，科尼斯堡，1931；I. Schaarschmidt：Der Bedeutungswandel der Worte bilden“ und Bildung”，Diss. Königsberg 1931.

^② 《给沃尔夫的信》，见7卷本《洪堡总集》第5卷第176页。

的信中所言：“它一定包含了普遍的观点：首先是关于可能的性格差异，关于性格差异、性别、年龄、气质、民族以及时代的独特性。”^①

通过创建比较学科的想法，洪堡进入了特定的学科的相互关系中。比较科学在 18 世纪下半叶特别在形态学和人体解剖学领域发展起来。在耶拿的时候洪堡自己也研究过自然科学，他也提及一些比较学家如卡门普尔、尤塞奥伊以及哈拉瑞。当然在这方面最有力的对话者是歌德，歌德 1792 年尝试了普通比较学，1795 年进行了比较解剖学的导论研究，他有名的解剖学上的发现是运用比较的方法找到了人类的切牙骨并提出一条定理：自然科学就是建立在比较的基础上的。^② 洪堡有意识地靠近自然科学研究结果，他认为“比较不同的人类群体和个体思想组织上的差异就如人们习惯用比较解剖学来比较人和动物的身体组织一样”。^③但这是一种应该研究特殊性和性格差异的比较，就像获得典型和与此有关的特别思想史的形式和方法。

在《论人性的思想》里洪堡总结了所有人类学研究的结果，1797 年他在同标题的片断中对题目进行了说明。它包含了人文主义哲学和洪堡自我教育思想的总结，以及关于未来研究的纲领，他对人的本质换了个说法。《论人性的思想》是他后续研究的纲领。在洪堡看来，“人性（Mensch-heit）的构成”有点像“希腊化（Griech-heit）”：人类（Menschentum）、人性（Menschlichkeit）来自拉丁词“人文（humanitas）”以及它非常丰富的历史含义。用“人性的完美”并没有历史哲学的思想在里面，也不是指人类的全部（洪堡习惯上用另外一个词 Menschen-

① 《给沃尔夫的信》，见 7 卷本《洪堡总集》第 5 卷第 177 页。

② 参见海纳曼·弗里茨·海纳曼：《威廉·冯·洪堡的哲学人类学和人的认识理论》。哈勒，1929。Fritz Heinemann: Wilhelm von Humboldts philosophische Anthropologie und Theorie der Menschenkenntnis. Halle 1929.

③ 《给沃尔夫的信》，见 7 卷本《洪堡总集》第 5 卷第 176 页。

geschlecht),而是指人性(Humanität)的完善,这是这些年洪堡教育思想的表现(在以后的文章中洪堡才使用如今比较普遍的说法)。

洪堡想先写一本关于现代人的特征、题目为《18世纪》的书,他很快开始收集素材和资料。导论已经完成,在导论里详尽讨论的不是对象本身,而是学科特征的方法以及人类性格特征的类型研究,还有对洪堡的理解学说的陈述:理解不是智力的过程,而是用所有的精神力量、研究、想象以及思辨和检验性的理性来接近。两年后在给歌德的信里^①他设计了一个科学的相面术计划,也属于这个研究范围。

为了完善现代人特征的研究需要“不同国家、人和风俗习惯”的知识,特别是那些性格鲜明的文化民族,因此他决定和家人旅行。他想先去意大利,但被拿破仑战争阻碍了,于是在维也纳改变了路线,途经瑞士到了巴黎,随后决定在那里待几年,对法兰西民族性格进行广泛研究。洪堡交往大小人物,在剧院里、沙龙里以及政治场所,他作为清醒的旁观者,只在日记中写了些速记。他对关于《论人性的思想》这本著作思考了多长时间不能清晰地确定。在他的美学尝试中(《论歌德的赫尔曼和多尔特阿》),人性的思想作为一切充满责任感的科学的重点是很清晰的。两次到西班牙的旅行,一次是和卡洛琳深入这个国家进行研究,第二次是系统研究巴斯克人以及他们的语言,这些都和这个工作有很大的关系。^②

1801年洪堡和家人离开他一直作为冷静的旁观者生活的巴黎,经过布尔格纳回到特格尔庄园,在那里他开始对收集到的材料进行整理,开始写关于巴斯克人的专著,但是柏林和它的社交生活、浪漫主义者的捣乱也对他有一定的吸引力,同时也使他厌

^① 见7卷本《洪堡总集》第2卷第345页。

^② 这些旅行日记都在7卷本《洪堡总集》里。

恶,卡洛琳的健康状况以及对古希腊罗马文化和南部的渴望都影响了写作进度。于是他申请到罗马任普鲁士公使,他得到了这个外交职位,1802年深秋他作为部长总督到罗马任职,在路上没忘去拜访耶拿时期的老朋友:沃尔夫、歌德和席勒。在接下来的几年中洪堡除了利用职务的便利研究政治并很快写出了精湛的报告外,主要就是研究罗马这个城市取之不尽的文化以及语言。“我每天更深入地进行我的语言研究,在巴斯克语中发现了越来越多的希腊语”,还在柏林的时候他就对巴斯克语中语言的原始现象和基本语素的发现进行了简单说明,并且听从沃尔夫的建议研究伊特拉斯坎人,他希望能找到相似的内容。“从根本上说我进行的一切是语言研究”,在罗马也一样。“我想我发现了把语言作为手段来使用的方法,为了研究整个世界最高级和最深刻的东西以及它的多样性,我越来越深信这点。”^①但这时候还没有重要的研究成果出来,只是在《拉提乌斯和海拉斯》(1806)中简单地说明不放弃对思想形式的研究,而是开始专注于研究语言——作为个体和民族思想精神的表达,作为人类存在不同形式的载体,作为了解人和人的教育机会敲门砖的语言。和赫尔德致力于把语言理解为无限价值的个体不同的是,洪堡找寻高度发达民族的语言原型,首先是不同语言价值的评判标准。他认为相对于物质的词形变化不丰富或没有词形变化的语言,在丰富的词形变化中、在丰富的形式的多样化中找到了不同语言价值的评判标准。由于这种想法,对他来说相对于现代语言,希腊语作为教育财富具有新的重要的意义,表现在希腊语的形式和语言形成的价值里并且不考虑它是否到达一定的程度,因此打开了理解希腊文艺创作和文化的大门。直到今天这种观点在德国学校语言的地位这方面都起着作用。^②

① 《给沃尔夫的信》,见7卷本《洪堡总集》第5卷第266页。

② 参见博伦的观点。

只有到了罗马,洪堡才感到真正的生活,就像他在给朋友的信中写的那样。这里的生活状态和城市气氛使他写出了《罗马》这首诗,是他为数不多的诗作里比较成功的。但在罗马的岁月里他还是失去了两个儿子,普鲁士在耶拿的失败以及带来的后果给他在罗马的最后岁月蒙上了阴影,他的特点就是尝试在对古代史的研究中巧妙地加入时代大事,如《论希腊共和国的衰落和灭亡》这篇文章。对他个人来说这些历史事件以及罗马教廷政治上的式微使他在罗马的职位越来越显得多余,1808年秋天他让家人留在罗马,他自己先回德国处理因为战争弄得七零八落的财产。在慕尼黑的时候他就间接接到消息说施泰因伯爵认为他去教育部门任职比较合适。在埃尔富特他就接到正式的要求,接手文化教育部。他犹豫着,然后提出要继续保留罗马的职位,最后接受了新的任命。

人们有理由相信,洪堡不具备教育管理方面的专业知识,他既不懂部门运作也不懂中小学教育,对于教育理论和管理也都不懂。只是他一直对教育问题进行思考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观点,也因此他毫不犹豫地开始工作。在任职的16个月里,他在一定程度上对普鲁士的教育进行改革,也为后续的改革打开了局面,这真的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他在《柏林科学院的就职演说》中表达了对这个科学的教育场所的看法,他的意见都在《论柏林高等学术机构的内外组织》里得到阐述。根据这些思想成立的柏林大学成为了德国大学的领头羊。洪堡对中小学教育的看法在《科尼斯堡和立陶宛学校计划》中一览无遗。他在教育部门能做的和计划做的在1809年写的《文化教育部报告》中体现出来。个别教育政策方面的措施完全是为这篇报告中提到的目的服务的。他认为,应该致力于人的普及教育,教育也要分层次,从国民小学到高级中学然后到大学一级一级上来。裴斯泰洛奇主义、古代语言的人文主义和理想主义哲学应该为这个原

则和整个教育保驾护航。他在任期间的主要成就包括：为成立裴斯泰洛奇似的小学开路，成立新人文主义的高级中学以及培训与此相匹配的教师，剔除多余的学校，建立柏林大学，他自己则为柏林大学找来了一大批优秀的教授。关于这方面的详细内容爱德华·斯普林格在他的第二部关于洪堡的专著中有深入研究。

1810年洪堡因为权利范围和政府措施结构上的不明确提出辞职时，他的改革已经基本上完成或者说已经进入状况，因此后来和他意见一致的聚费恩、尼克洛维乌斯、施莱尔马赫、乌登等可以在此基础上继续进行改革。^①他继续到维也纳当普鲁士的外交官，接下来他完成了许多外交工作：为奥地利加入反对拿破仑的联盟作出贡献，陪弗兰茨皇帝参加1813—1814年的远征，代表普鲁士参加夏提隆会议，陪同弗里德里希·威廉去伦敦，陪同哈登贝克参加维也纳和巴黎和谈的谈判。接下来的几年里哈登贝克因为害怕独立的思想让他不能如已所愿在柏林的部门任职，而故意让洪堡远离柏林：去法兰克福联邦议会，驻守伦敦。在这些动荡的年月里，洪堡都没停止他的研究。《论一个民族科学和艺术繁荣的条件》就是这个时期写成的，文章再次谈到科学的教育价值，他还继续翻译埃斯库洛斯的《阿迦门农》，它于1816年经过20年的精心雕琢出版了，“帝国会灭亡，但好诗永存”。

1819年洪堡又被一个部门授予职位，这时已经闻名的在跟施泰因男爵交往中成型的《关于普鲁士社会状况的研究报告》和也移居到柏林的梅涅特的观点不再一致，他的两篇反对总理地位过高以及反对卡尔斯巴登决议的文章在年底导致预料中的国王对他的撤职。

^① 参见米泽贝克的《100年前的普鲁士文化部》，柏林，1918。E. Müsebeck: Das preußische Kultusministerium vor 100 Jahren, Berlin 1918.

洪堡平静地回到特格尔庄园,非常开心,终于可以摆脱繁忙的职务专心于学术工作和精神生活。他请申克尔把庄园装修成古典建筑风格,特格尔成了他收藏的古希腊罗马书籍和雕刻复制品的博物架。他主要进行的是语言研究以及与此有关的庞大的丰富的语言学材料的哲学研究,1820年作的学术报告《论比较语言研究》就是对语言哲学方面进行思考的初步成果,后来成了《论人类语言结构的多样性和对人类思想发展的影响》这部专门研究爪哇语的著作的导论,这部著作结束了他的语言研究同时也使其语言研究达到了顶峰。^①在老年时期他还作了学术报告《论历史学家的任务》,这篇文章中洪堡发展了他的注释学,可能是他唯一一部直接具有经典地位的作品,也是任何一个研究洪堡的人不能错过的文章。在这里收录它不是因为它的地位和历史理解学说的意义,而是里面提出了一个教育的基本原则性问题:学习者和文化的关系服从于同样的法则,正如历史的理解自身也是一个教育者必须深入思考的注释学上的问题。教材的内在价值和学习者的内在和思想价值与历史编纂学上观察的主体和被观察的客体之间的一致问题有相似的地方。这种一致性在洪堡看来是对情绪的接近。在关于古代文化研究的论文里洪堡就谈到了情绪和思想情绪,内在的对古代思想的接近。情绪就成为了洪堡教育理论和理解学说的关键词,指那种用一切精神力量去靠近、去获得,是与理性的具有距离的观察以及客观知识的记录相对立的。^②

评论《歌德的第二次罗马之行》也是出自这一时期,这是一篇歌德和洪堡在自然和精神世界共同观察相貌学上的尝试,歌德自己也深入研究过。随笔《论席勒和他思想发展的过程》就是从

① 见7卷本《洪堡总集》第7卷第1页。

② 参见博尔洛夫的《情绪的本质》,法兰克福,1956. O. F. Bollnow; Das Wesen der Stimmungen, Frankfurt 1956.

这个特征出发,属于洪堡完全成熟的直到今天仍然有名的作品。

卡洛琳死于1829年。失去了亲密的精神上的伴侣,洪堡的生活陷入了寂寞,他常常与自己以及死去的人进行对话,沉思多于真正的创作,这个时期写成的非常有名的《致女友的信》主要讲述了他的生活哲学。一生醉心于工作与学术的洪堡于1835年4月8日去世,长眠于特格尔公园卡洛琳身边的“希望”雕塑下。

目 录

1	论公共国家教育(1792年)	1
2	论古代文化,特别是古希腊文化的研究(1793年)	6
3	人的教育理论(1793年)	23
4	比较人类学计划(1795年)	29
5	论人性的思想(1797年)	58
6	柏林科学院就职演说(1809年)	69
7	科尼斯堡学校计划(1809年)	72
8	立陶宛学校计划(1809年)	81
9	论柏林高等学术机构的内外组织(1810年)	89
10	论一个民族科学和艺术繁荣的条件(特别针对德国和当前的时代)(1814年)	99
11	论历史学家的任务(1827年)	106
12	论性格[节选自《18世纪》](1797年)	122
13	论语言作为特殊思想形式的特征[节选自《拉提乌斯和海拉斯》](1806年)	128
14	文化教育部报告[节选](1809年)	134
15	歌德的直觉和形象[节选自《论歌德的第二次罗马之行》](1830年)	144

1 论公共国家教育^{*} (1792年)

本文作为独立的论文发表于1792年12月的《柏林月刊》，洪堡虽然准备出版整篇文章《论国家职能的界限》，但犹豫后放弃了，直到他去世后的1851年才发表，本文主要思想已经在给福斯特尔、莱茨曼的信中提及。

* 题目直译为《论公共国家教育》，实际上讲的是国家的公共教育，这部分内容曾由林荣远、冯兴元在《论国家的作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的第六章里翻译过，读者可参考。——译者注

最近一段时间人们尤其强烈呼吁在国家中防止违法行为和运用道德的方法,每当我听到这种或相似的言论,我都很高兴。我承认,这种限制自由的行为在我们这里越来越少,而且几乎在所有国家目前的形势下都越来越不可能了。人们追溯到希腊和罗马,但对他们的宪法了解越多就越清楚这种比较是不合适的。那些国家是共和国,共和的机构是自由宪法的基石,它使公民满怀热情,这种热情使限制个人自由的负面影响减弱并且对性格中的活力伤害很小。另外他们也享受到比我们更多的自由,他们所牺牲的就是参与另外一种活动,即参与政府事务。在我们这些大部分君主制国家里是完全不同的。那些古希腊罗马人想用的道德手段——爱国教育、宗教、道德准则,在我们这里收效甚微,而且还带来更大的危害。所以现在人们认为是立法者聪明才智表现的大部分东西只是现实的,也只可能是摇摆不定的需要法律批准的习俗。费尔古森已经出色地在作品中描写了吕库尔古斯*设置的机构和大部分未开化民族生活方式的一致性。^①因为较高的文明使民族得到完善,事实上最后遗留下来的是那些机构的弊端。最后,我想,人类现在处于只有通过个体教育才能发展的文化层面,因此所有妨碍教育的和使人成为非独特个体的机构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具有杀伤力。

为了先谈似乎离题最远的道德的方法,就从这几点评注看公共教育,即由国家规定或引导的教育,至少在很多方面是令人担忧的。根据前面的整个思考,所有的一切完全取决于最充分的多样化的人的教育。但即使公共教育要避免这个错误,如果它只想局限于聘用和管理教师的话,就得倾向于一种特定的形式,因此所有的在研究的第一部分就已经充

* 古代斯巴达人的立法者,也译作吕库古,来库古,来古格土等。——译者注

① 费尔古森. 文明社会史速写,1766;巴塞尔,1789:144页. A. Ferguson: An essay on the history of civil society, (zuerst 1766) Basel 1789, S. 144.

分阐述过的弊端也暴露无疑。^①我只需要补充的是,每种限制如果涉及道德的人的话,可能会更有害;如果有什么对个体产生作用的话,恰好应该是对个体进行培养的教育。毋庸置疑的是,正是从教育中产生非常有益的结果,人以他周围的环境和状况赋予他的形象自觉地出现在国家中,通过磨合——如果我可以这样说的话——一方面他通过政府给他安排的和他自己选择的环境被塑造,一方面国家宪法自身也在发生变化,同样的,虽然这些变化不是一下那么明显,但根据民族性格的变化可以看出这些变化在所有的国家里都是显而易见的。这种状况会在一定程度上被公民从儿童时代起就接受公民教育而改变。如果人和公民的关系尽可能地融合在一起,那当然是令人愉快的。但这只有在公民尽可能少地索取特殊个性的情况下,以至于人的自然属性不用牺牲什么就能保留下来,这是我在这一研究中敢于提出的所有理念追求的目标。完全没有益处的是人给公民作出牺牲的时候,因为即使去除了人与公民之间不协调关系的弊端,人也失去了他努力在国家中争取到的那些东西。因此我的看法是,各处都应该推行最自由的、尽可能少的以把人培养成公民为目标的人的教育,这样培养出来的人可以进入国家,国家的宪法也在他身上得到检验。只是在这样的斗争中我才能够希望通过一个民族宪法得到真正的完善,并且不担心在这样的斗争中公民机构对人产生负面影响。因为即使公民机构有很多缺点,试想一下,正是通过他们的束缚,人的那种对抗性的活力才得以保存。但只有人的活力先前自由发展起来时这种情况才有可能,因为在束缚从青年时代就开始压制的时候这种潜力也不同寻常地凸显。因为国家思想在每种公共教育中都占主导地位,公共教育就得赋予人一种特定的公民的形式。哪里有虽然单调但美的形式存在,正如我们在古代

^① 也就是个人积极性、独立性和责任感的削弱;对自由力量游戏、个体性格的多样性、各种方法的竞赛和助人为乐等性格的妨碍。

国家或现在的一些共和国里发现的,其公共教育实施也较容易,而且负面作用较小。但在我们君主制宪法里是完全不存在这种形式的——肯定对人的教育是幸运的。虽然有缺点,但显然他们的优点在于,因为国家的联合只被认为是一种手段,个人的力量不必像在共和国那样用到这种手段上。一旦臣仆听命于法律,他自己和他舒适的没有任何不良后果的工作得以延续,国家就不会关心他更详细的存在方式了。因此即便是强调过的,公共教育也不像私人教育那样看重人,而在意的是公民或臣仆,更不是把特定的美德或者方式当做目标。公共教育仿佛更多地追求所有人的均势,因为正是这种均势创造并保持安宁,而安宁又是国家最热衷追求的东西。这种追求(如我在其他地方指出的那样。^①既不能促进人的发展又导致人的活力的匮乏,相反遵循私人教育特别重视的某些方面,通过生活中各种不同的关系和联合更能产生那种均势并且不以牺牲人的活力为代价。

但是,如果人们想禁止公共教育作出一切这种或那种教育方式正面的提升,而只是把倾向于力量的自我发展作为公共教育的义务,这是无法实施的,因为具有统一规划的东西也肯定带来某种片面的作用。在这种前提下无法看出公共教育的益处。因为其目的仅仅是阻止孩子不是完全不受教育,那么给父母马虎的孩子设置监护人或帮助需要帮助的人就更容易并减少了负面影响。此外公共教育连这个他们一直强调的目标,即习俗根据国家认为最适合自己的模式发生改变,都达不到。因此重要的对一生产生影响的也应该是教育的作用,更重要的是陪伴人一生的环境,这些因素不同时发生作用的地方单靠教育是不能成功的。教育尤其不应该考虑给人赋予特定的公民的形式,只应该塑造人,所以不需

^① 《通过新法国宪法引起的对国家宪法的思考》。柏林月刊。1792,1.7 卷本《洪堡总集》第1卷77页。Ideen über Staatsverfassung, durch die neue französische Constitution veranlasst. Berlin. Monatsschrift Jan. 1792, GS. I, 77).

要国家。在自由人中所有的行业都能得到更好的发展,所有的艺术都会开出更美的花朵,所有的科学都更繁荣;在自由人中所有的家庭也更紧密,父母努力照顾子女,在更富裕舒适的生活中满足孩子的心愿。在自由人中能产生一种努力向上的气氛,产生一批素质更高的教育者,他们的命运取决于工作的成功,而不是必须由国家来提升他们。因此既不缺少呵护备至的家庭教育,也不缺少有益的必要的共同的教育机构,如果公共教育应赋予人一种特定的形式,人们也可以说就是为了防止违法行为和为了保障安全,其他什么都不用做。因为道德和不道德的行为不取决于人的这种或那种类型,不是和这种或那种性格有必然联系,而是更多地取决于各种性格特征的和谐或不和谐,取决于力量对喜好数量的对比关系等因素。每种特定性格的形成是有能力纵情自我发展并发生蜕变的,如果一个民族首先只保持一种特定的性格,就缺少一切反对的力量,因此就会失去平衡。也许这也是古代国家宪法经常发生变化的缘故。每种宪法都对民族性格产生巨大的影响。这种民族性格,肯定也是被培养的,发生蜕变又产生出新的宪法。最后如果人们想让公共教育完全实现他们的意图,那么它的作用就太大了。为了保证国家必要的安全,甚至习俗的改变也没有必要。我只在结论中保留用来考虑支持这个观点的原因,因为这些原因涉及国家影响习俗的努力,我还可以谈谈个别的同类的方法。因此在我看来,公共教育必须完全保持在国家发挥作用的界限之外。

2 论古代文化,特别是古希腊文化的研究 (1793 年)

本文是洪堡去世后才发表的作品,曾被他命名为《希腊人速写》,是为一家教育杂志写的刊首语,写于 1793 年 1 月。手稿由席勒、达尔贝格和沃尔夫作了大量的注释。文献见莱茨曼的《六篇未印出的文章》及斯普林格的《教育改革》第 61 页。
A. Leitzmann: Sechs ungedruckte Aufsätze; Spranger: Reform d. Bildungsw. S. 61.

1. 研究古希腊罗马时代的遗产——文学和艺术作品,有内容和形式上两层作用:内容上是指它给其他学科提供研究的素材,就这点来说古代语言文化的研究是其他学科的辅助学科,其他学科不清楚古代文化研究的作用本身可能有多重要。

2. 形式上的作用又有两层含义:一方面倘若人们只研究古希腊罗马文化遗产本身并把它们看成是所属类型的作品,也就是只关注遗产本身。另一方面把它看做它那个时代的作品并关注它们的创作者(我还会再区分一下)。第一种作用是美学的,非常重要,但不是唯一的。人们常认为这个作用是唯一的,这种观点会造成对古代民族作出一些错误的评价。

3. 对古希腊罗马文化遗产进行研究时考虑到它们的创作者就产生了古代人本身的知识或者古代文化中人性的知识。^①一方面是因为内在的重要性,一方面是习惯上很少被提及,下面我唯一要谈到的就是这个观点。

4. 研究一个民族能完全保证历史提供的所有好处:历史通过行为和事件等事例来扩展人的知识,增强人的判断力,提升和改善人的性格。研究一个民族还可以有更多的作用:它不仅研究一连串历史事件发生的线索,更试图研究这个民族的整体状况和全局形势,就像给民族写传记一样。

5. 这种传记的特别之处首先在于通过描述民族整体的政治、宗教和家庭状况,对民族性格特征全方位地进行研究,不仅把个别特征相互之间的对立关系,还把它们和外部环境的关系作为原因和结果分别进行研究。这里我只说明这种研究独特的优势,而忽略那些通常被人提及的优点。

6. 人们习惯上认为人的知识只在和人交往时才有必要用到。人们习惯上把这称为人的知识:当人观察了一定数量的单个的人并由此获得了通过人外在行为猜测出他们内在

^① Menschheit, Menschlichkeit, Menschtum.

意图的能力,或者反之通过人为的干预促使他们做出某种行为。在一定政治意义上这两者都可能是真的。单从哲学意义上说,人的知识——首先就像单个的真实的个体的知识,只能是不同智力的、感性的、道德的人的力量的知识,是人互相获得的改变的知识,是人的正确或错误的关系可能产生的行为方式的知识,是涉及人的外界环境方面的知识,是这些外在环境在特定的气氛下必然产生或者从来不会产生作用方面的知识,简而言之,就是内在的必要性原则和外在环境变化的可能性原则方面的知识。这种知识,或者毋宁说追求这种知识,因为这里只有追求是可能的,导致真正的人的知识,这对每个作为人的人来说,他也生活得和人完全不同,只在内涵和外延的不同程度上是必要的。

7. 下面从最简单的人手——首先是行动的人,我把行动的人和只与思想打交道的人相对立,就像最后把这两者和纯粹享受的人相对立一样。一切实际的生活,从最不起眼的社会交往到最高级的国家统治或多或少都直接涉及到人。谁真正在意自己的道德尊严,谁在这些情况下都不会疏忽一切道德的最高目的、人的高贵和人的不断提升的教育。为此人的知识对他来说是不能缺少的,一方面是为了促进这个目的,一方面,如果他的活动是如此不均衡——就像这种方式也可能有令人尊敬的方面一样——就得在一些方面给他设限,但得注意保持这种限制的最小量。这样就教会他在道德上可以做什么,在政治上可以成功,并由此引导他的理智。另外,通过引起对人的真正的尊重也引导了他的意志。一切的不完美都可以追溯到力量的不均衡^①,在那种人的知识显示整体的时候,这种不均衡好像消失了,同时表现出来的就是产生的必要性和均衡的可能性,因此先前被片面研究的个

^① 见17卷本《洪堡总集》第1卷168页。Wilhelm von Humboldts Gesammelte Schriften. Hrsg. v. d. Königlich Preuß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17. Bde. Berlin 1903-1936,普鲁士皇家科学院出版的17卷本《洪堡总集》。

体通过全方位的观察仿佛被置于一个更高级的层面。

8. 接着是和思想打交道的人——这里我可以不用进行精确的逻辑分类——从字面上看最广义的是历史学家、哲学家或者艺术家。历史学家,倘使我从最原本的理解——只描写历史事件,而不描写人和人的行为的人^①,可能最不需要人的知识的。然而,如果历史研究者不仅想列举外在的历史现象,还想发现内在结构的话,就绝对不能缺少人的知识。因为第一我们所有的关于组织的理念最初都来自于人,第二,大自然中也存在着内在结构的相似性,如同外在形象的相似性一样,因此缺乏人的生理方面的知识就无法深入了解组织特征和毫无生机的自然的特点,生理方面的知识又要以心理方面的知识为基础,反之随着心理方面知识范围的增加这种对人的了解也更准确,即便研究常常是在很小的程度上进行的。最后我要指出,我在这里没提及任何一个伟大的自然科学家都不会错过的整个自然的相互关系和自然与人之间的关系,就像我的本意首先就是试图让不是很清晰的关系尽量显示出来一样。

9. 为了遵守这个原则我只涉及哲学家中最抽象的形而上学者,如果形而上学者应该测定整个认识能力,此外如果从现象到真实本质只存在实践理性这个方法,如果自由和普遍原则的必要性能够证明最重要的先验论原则,那么对各种混合的人的力量的最多多样化的研究必然也使这种工作轻松许多并最能让人明白:什么是普遍的,什么在每种混合中保留下来。

10. 艺术家的唯一目标是美。美是毫无概念地对一个对象普遍的、必要的、纯粹的喜悦。这种喜悦不是通过信念被强迫出来的也不应该被强迫,这种喜悦必须是普遍的,它的

^① 历史学家在当时哲学语言使用中是普遍的:专业、实事的研究者,也就是一切具体科学的研究者,和理性的哲学的思辨的科学相区别,特别是自然科学,本来的理解,历史学家 Historiker 就是今天常用的研究历史的人 Geschichtsforscher.

对象也不是通过概念引起的,这种喜欢必须涉及感受者最充分个性的全部心理情绪,就像审美观上表现出来的无限的多样性一样。谁想创造美,谁就得让他的本性与最细微和最多姿多彩的事物的本质趋于同质,要做到这点没有深入持久的研究可能吗?除了这个虽然普遍证实但也更抽象的解释外,艺术家同时还属于实践的群体,当他直接作用于最高级和最高贵的事物的时候,就更需要所有那些实践者不可缺少的知识。不只是为了作为人从道德上,还为了作为艺术家成功地发挥作用,他必须深入了解他作用的对象,最后他的工作要么是表达要么是描述,表述是单个、直接地作用于感受,而描述是难以领会的,所以间接作用于感受,因此感受和感受的人一直是艺术家的主要研究对象。

11. 最后是纯粹享受的人,本来没什么好说的,因为享乐的顽固性无规律可循。但我现在公平地不是置身于最高贵的人的位置,而是置身于人在更高贵的瞬间,在这些时候最高级的快乐的类型就是人通过自己和其他人,通过自我观察,通过和一切外部环境交往,通过友谊和爱情感受到的情感。如果人没有对自身和其他一切真实存在有着敏锐的见解,那么这些感受越高级就越容易被毁坏。而这种见解离开了对人的深入研究是完全不可能的。自然和艺术作品美的享受提供的情感和这种快乐等同起来不是不恰当的。这些快乐首先通过刺激感受起作用,这些感受又通过外在形象正如通过符号一样被唤醒。对人的研究给人的可能的感受提供越鲜活的观点,心灵对这些外在事物就越敏感。因为我在前面提到过这种活动自身和由此产生的享受(第7至10点),因此这里就只谈及感官的享受了。在想象力根据享受个体的差异赋予他可能的丰富的多样化的面貌,同时也将许多个体融为一体的时候,这种享受就成倍增加并得到升华和细化。最终因为拥有这种想法真正不幸福的感觉就降低了。痛苦,就像坏习惯一样本来就只是一部分。谁有这种全局观,谁就会发现,当痛苦在这里消失的时候,它又是如何在那

儿出现的。

12. 到目前为止,我勤奋研究的是单个人的活力,上面提及的几类人身上都没显示出需要我这里谈及的人的知识,就正好说明掌握人的知识是必要的,并以此来证明,为了让个别的追求统一成一个整体并和最崇高的目标一致,即人的最充分和最均衡的教育^①。因为单方面研究力量对作为活力的研究的益处不大,更多是对创造性的作品产生影响,只有经常从整体美的角度来对人进行研究,才能把散漫的目光聚集到真正的终极目标上。

13. 因此如果获得了这种关于人的知识,这种知识就作为内容发挥作用。但同样有益或许更有益的是它们的形式,即获得这种知识的方式。为了把握一个人的性格特征并更多地从整体上把握一个更多样化民族的性格特征,人必须调动他所有的力量,理解者必须让自己以某种方式和要理解的内容做到相似,因此产生了一个更宏伟的工作,就是均匀地使用一切力量,这种工作特别塑造人。谁持续不断地从事这个研究,谁就了解形式的无限多样性,他的棱角也仿佛磨掉了^②,从这个吸收新内容的过程中循环产生出新的内容。这也正是为什么这种关于人的知识有益而其他知识无法做到这点,因为其他知识从来没有不断地被研究,因此最高贵的人性通过对人最深入的研究起作用。

14. 用个别民族的性格来进行目前的人的研究,从各民族的遗迹来看,虽然每个民族在一定程度上都有可能被用来作研究,但用这个或那个民族来作研究首先要根据下面四个

① 见席勒的注释:如果这不从人类文明进步方面起作用,我们在每种经验上要注意什么?这里注意三个因素:1. 对象完全在我们面前,但是是混在一起没有界限的。2. 我们分离并区别个别特征,我们的认识是清晰的,但是是支离破碎和带有偏见的。3. 我们把个别的和整体的都放到我们面前,不再迷茫,而是全方位地研究。第一个阶段是希腊人,第二个阶段是我们,第三个阶段还期待出现,这样人们就不会再想希腊人了。

② 达尔贝格有顾虑:如果所有的棱角都磨掉了,一切都变成平的圆的单调的,长时间的对陌生的性情和艺术品的模仿和深入会完全抹去有特色的性格特征。

因素来决定。**第一**：看民族现存的遗迹是否是其思想和性格特征的忠实翻版。科学或艺术作品具有自身的、由它本性决定的同时也是客观和理想化的完美，但即便在最接近完美的过程中个体独特的思想精神或多或少体现在他创造的作品中，当然常常在最无意关注完美的时候表现出来。因此思想作品的客观价值和独特性常常在相反的情况下出现。最引人注目的是这种差别常常表现在真正的思想作品中，而较少地表现于艺术，在艺术中又更多地表现于音乐、舞蹈这类动态艺术而不是造型艺术如绘画、雕刻等。

15. **第二**：看一个民族的性格是否具有多样性和统一性——原则上它们是一个整体。个别的、伟大的、美丽的性格特征和对它们的研究有着无可争议的但并不是本该有的益处。尤其用个别的例子来进行人的研究要求性格差异的多样性以及它和整体之间联系的统一性。

16. **第三**：看一个民族的性格是否拥有多样化的形式。这里不仅取决于一个民族是否处于一种优秀的教育或美德的程度，对它的研究应该提供那种益处，还更多地取决于，它对外和对内是否足够敏感和有激情因而易于感知非常丰富的形象。

17. **第四**：看一个民族的性格特征是否具有这种风格：最接近人的在任何不考虑个体差异的情况下都能并应该存在的。这种性格特征外在（特征）的比较也表现出各民族性格特性的差异，对那些拥有地方化教育的民族更多地侧重于个别的人的类型的研究，而较少地去研究人的本性；另一方面在一些民族身上人的本性表现比较突出。我在这里谈到的情况可以归于两个原因：一是缺乏独特性和毫无意义，二是简单的性格特征。只有第二点“简单的性格特征”是有益的，对人的研究最能通过对一切时代一切国家的所有民族进行研究和比较得出成果，除了研究工作的庞大芜杂更多地取决于以内延程度来研究一个民族，较少地取决于以外延程度来研究一系列的民族。如果只研究一个或几个民族是有益的，

那么选一些具有代表性的民族也是好的。

18. 通过以上分析结论应该显示出来了:对古代民族的研究最能保证在人的知识和教育方面获益,我这里说的古代人指的是希腊人,而且常常只是指雅典人,个中原因如果不能通过推论显现出来,我将在下面提及。**对第一点(第14点)的说明:**希腊人的文化遗产最能体现创作者的个性特征。最明显的就是文学作品,首先是对语言的研究,在语言中偏离说话者个性的情况首先是因为以下三个原因:①因为借用了外来语的单词和谚语;②因为需要,现存的词汇不能很好地用于说明完全普遍和抽象的概念,要么完全是新造的词汇要么使用具有强烈引申含义的表达方式,在这个过程中新的表达方式与旧的词汇之间差别越来越大,尤其当一个民族不太具备易感和创造性的想象力去领悟从自身词汇感性的一面衍生出的抽象概念的时候;③因为对语言本质,特别是对特色语言相似的思考,从中产生出许多因为使用语言引入的和说话者特殊情况更有关联的变化,尤其在句法和语法上。希腊人没与在它之前的以及同时代任何一个教育程度更高的民族保持普遍和亲密的关系,因此在其语言中有外来词,这些词和整个词汇相比只是很不起眼的部分,至少不具备明显的外来词变位和外来句法结构的痕迹,第一个原因排除掉了。同样的是后两个原因,因为和语言早期的形成相比很晚才出现更确定的哲学,更晚些时候产生语言哲学并且特别考虑到第二个原因,没有哪个民族像希腊人那样在隐喻表达创作方面如此轻松地拥有如此丰富的想象力。个别体现词汇构成、变位和连接意图的例子能够表明希腊人的语言和性格特征的一致性。

19. 思想作品本身就是历史、文艺创作(我把艺术也归于此)和哲学。历史基本上是希腊的历史,有些内容不涉及希腊历史是因为早期希腊的历史学家还不习惯比较几个民族并把自己和其他外来民族区分开来,他们太专注于研究自己祖国的历史,以至于希腊人应该经常看。在希腊的历史中有

几种情况,我把它归结为:首先是个别人对公共事务较大的影响;宗教和政治、家庭和宗教状况的结合,还有历史自身的小小的允许更细致的范围;最后还有奇特和重要的更孩子气的想法。因此古代史比现代史包含更多的性格和习俗描写。

20. 如果艺术作品和历史应该有所不同,那么要以更确定的关于可能与不可能,真实与非真实的想法,用一个词“批评”为前提条件来看。希腊人稍晚先是通过情节和宗教,更晚些时候和民族自尊的结合才获悉这点。很长一段时间,艺术作品和历史是没有分别的,当它们真正互相分离的时候,艺术家就脱离不了那些能给大众留下印象并和他自己的个性相似的东西了,艺术家不仅为欣赏美妙艺术的行家和业余爱好者,也为在艺术品上不单单要看见艺术,还要看见自己和自身荣誉的大众创作作品。艺术家应该如何改变主要情节而又不十分希腊化,因为他没有先例可循,并且艺术理论是以后才产生的。此外,希腊人艺术作品的优秀类型——史诗般的、悲剧的、抒情诗的作品都来自习俗和公共活动,如宴会、节日、祭祀等,因此直到晚期他们还保留着这种历史的,但不是美学起源的痕迹。

21. 哲学应该是最少地承载哲学家自身特点的门类。但在希腊人身上表现出来的实践哲学显示了很高的程度,思辨哲学至少好长一段时间也是这样。

回头看现代民族,他们的语言(第18点)借用外来词,哲学在很大程度上变质了,甚至他们祖国的历史(第19点)因为熟悉一切时代和其他国家的情况以及其他一些原因被描述得没有什么特色了。他们的艺术作品(第20点)几乎都是出自外来的神话并根据客观的普遍理论改编,他们的哲学(第21点)抽象而普遍。

22. 对第二点(第15点)的说明:希腊人在那个我们对他们有最初的比较完整的认识的时期,还处在文明程度非常低级的阶段。在这种状况下,因为需求和满足手段都不足,希腊人对个人力量发展的关注比对物质的准备和使用多很多。

物质手段的缺乏也使人的发展更为必要,因为还不存在先去从事个别方面的理由,因为人只是遵循自然的发展过程,因此人行动和受苦的时候,人整个的本性就更多地融合到从事的工作中,而不是因为感官被刺激,而这也最能把握人的整个本质。因此文明程度较低的民族比文明程度较高的民族相对地更注重从整体上发展人的个性。

23. 在希腊人身上显示出一种双重的、最奇特的也许还是历史上唯一的现象:当他们还显示出原始民族很多粗鲁的痕迹时,他们就已经拥有对自然和艺术美的伟大的敏感性,拥有优美的行为举止和正确的审美观,这不是批评而是感受的审美观,也出现了反对这种行为举止和审美观的看法,但至少易感性和敏感性是不可否认的,当文明上升到一定高度的时候,他们依然保持着一个民族青年时代所拥有的那种简单的性格和品位。个中原因不是这里要探讨的内容。只是现象就足以说明。在牙牙学语的时候希腊人就显示出细腻和正确的感觉,在成熟的年龄他还未完全失去最初的单纯的孩子气,我想,其民族大部分独特性就在于此。

24. 因为希腊人身上特有的对美的易感性(第23点)和一切文明不那么发达的民族通常更关注个人的发展,尤其是身体力量的发展(第22点)以及在希腊气候条件下养成的特别喜欢感性生活的爱好相结合,他们就更有必要关注身体的塑形使之强壮和灵活,更何况外在环境也要求身体强壮和灵活。这两个在外形训练上表现出来的特征轻易获得易感的人的尊重和热爱。即使文明上升到很高的高度而且早就排斥尊重身体力量,他们还是比其他任何一个民族更多地保持对身体强壮、灵活和美的训练的关注。在普遍和抽象概念不大常见,对美的敏感性已占统治地位的时候,人们自然首先得在这种形象中展示出思想的优点,在希腊人的心灵里如此温柔地融合了身体和思想的美,以至于现在那种融合的诞生比如柏拉图的关于爱情的思考都提供一种真正的令人陶醉的享受。如果这种情绪也只是个别和自我的,那么还可以列

举很多的历史事实说明,在希腊对身体和思想教育是如此呵护备至而且这种教育首先是由美的理念来引导的。

25. 如果有任何一种人性完美的观点能创造多样性和统一性,那必然是那些来自美的概念和感性的观点。根据这种观点,道德的人在个别性格方面不会缺乏正确的比例,正如一幅漂亮的画或一座精美的雕像四肢比例不会失衡一样,谁像希腊人一样被形式的美滋养着,谁像他们一样对美尤其对感性的东西如此热爱,谁最终会拥有细腻的情感而反对道德的不均衡,就像反对身体上的不均衡一样。综上所述,希腊人的一大趋势是毋庸置疑的,就是尽可能地对人进行多样性和统一性的培养。

这里我得作点说明——因为这里最容易产生歧义——这里谈到的希腊人的性格特征,虽然整个民族所有的个体不可能都完全符合这种特点,但可以肯定的是,拥有这种性格特征,他们拥有这里描述的性情,他们不仅仅比在其他地方更常出现,而且这种性情的细微差别在整个民族中呈分散状态。作家,尤其是诗人和哲学家,他们仿佛是民族思想最高贵部分的翻版,首先具有这种性格特征。为了使这个推荐研究古代文化的目标的实现成为可能,更多的就不必补充了。

26. 希腊人创造的其他一些外部环境也对他们呵护教育以及促进人的教育的方式作出了贡献。我归纳为下面几点: 1) 奴隶制。奴隶制解放了自由人的大部分劳动,这些劳动只需要身体和头脑单调的练习——机械性的技能。^①自由人就有了闲暇,他把时间用于:通过体操锻炼身体,通过艺术和科学扩充思想,通过积极参与国家宪法、与人交往和自我思考训练性格。优越感的想法使自由人凸显于奴隶,他认为他的幸运不仅感谢奴隶,他也有权对他们提出要求,因为他个人的伟大以及地位他看不起奴隶,这些权利一部分是他通过危

^① 见席勒的注释:奴隶制在中世纪没有显示出一丝一毫的相似的作用,是很特别的。其余千差万别的状况虽然解释了很多,但没解释一切。

险和艰苦奋斗获得的,就像为祖国而战一样,奴隶是不和他分享的。这里产生了没在其他民族身上出现的很高程度的自由思想,也就是主宰心灵的高贵的、伟大的和一个自由人真正相称的思想意识,这种思想鲜活地表现在深厚的教育和优雅的肢体动作中。

27.2)尤其是政府宪法和政治活动。希腊唯一的真正合法的宪法是每个公民或多或少都能参与的共和宪法。谁想贯彻自己的想法,因为没有权限,谁就得说服别人。发言者不能缺少的是对人的研究、适应人的能力以及性格的灵活性。但这个对教育程度很高的民族要求更多。它不仅要求发言者解释原因和本质,还要求发言者要注重形式、雄辩技巧、嗓音以及肢体的礼貌动作。可以说没有哪一方面是政治家可以随便忽略的。政府管理要求的还不仅是特别详尽的各学科丰富的知识,还要求这方面的天赋——在这些知识的各部分都还没分别发展到让人一生只献身于其中一方面的时候。这些让希腊人成为伟大人物的性格特征,也使他们成为伟大的政治家,通过参与政府事务,他不断地对自我进行更充分和更全面的培养。

28.3)宗教。宗教完全是感性的,它促进了一切艺术,使艺术通过和政府宪法精确的结合上升为更高的尊严,更伟大的不可缺少的东西。通过这个它不仅滋养了我上面谈到过的美感(第24点),还使美感更普遍,因为整个民族都参加艺术总是陪伴左右的仪式,就像我前面(第25点)试图说明的那样,在美感促进人的正确、均衡的教育的时候,宗教间接地出色地对此产生了作用。

29.4)民族尊严。正如希腊人拥有很高程度的热情和易感性一样,他们也首先强烈地表现在他们对名誉和身后荣誉以及在公民和政府紧密结合中对民族荣誉的感觉中。因为民族价值建立在公民价值基础上,尤其在战争中的胜利以及和平时期的繁荣与这密不可分,这种民族尊严就使对个人价值教育的关注加倍了,民族荣誉让每个公民个体的才能和功

绩归于国家,国家也把每个公民纳入自己的保护中,由此产生出新的对艺术和科学尊重的理由。

30.5) 希腊分成许多小邦国。^①如果一个邦国只为它自己存在,那么它的力量教育就选择单个力量必须使用的方法。力量自身不断地提高,当到达一定程度时,它就蜕变成另外的样子。力量的蜕变总是在自身找到动机,这样它就或多或少地总和片面单调联系在一起。但在希腊,各民族几乎都拥有不同的文明程度和千差万别的教育方式,它们形成相互对立的团体,一个民族的有些东西迁移到另外一些民族身上,即使在一些古老民族的机构中外来的东西难以找到自己的位置,但也越来越多地出现融合,比单独一个民族的存在多得多。这种情况尤其出现在所有的希腊人在性格的原始天性上相似的时候,因此移风易俗从一些民族到另一些民族就很容易,即使没出现这种情况,别的民族的存在和相互的嫉妒都使一个民族不会忽视别的民族可能胜出的优势,至少这种嫉妒让每个民族的力量都积极行动起来。

31. 对第三点(第16点)的说明:许多综合起来的原因创造了古代人显著的民族性格,但在单个公民的性格和教育上具有较少的多样性。从这方面看,古代公民比现代公民具有相对较少的多样性。另一方面受过更多科学教育的民族却是大大的例外。此外,还有两种情况可能又促进了多样性的发展,尤其从这方面来看:1) 希腊人的想象力对外界如此易感,他的内心又如此灵活,所以他不仅对每种印象都极其敏感,还允许每种印象都对他的教育产生巨大的影响,通过这种影响至少逐渐形成他自身独特的教育。

32.2) 宗教绝不支配信仰和思想意识,而是局限于仪式方面,每个公民总是从政治方面来看待这些仪式,同样地,道德观念很少给思想精神设置枷锁,因为道德不是根据单一权衡利弊的标准局限于个别的美德或恶习,而是相反地由美和

^① 洪堡对小邦国的评价显示他探讨过孟德斯鸠。

自由的理念来界定。

33. 对第四点(第17点)的说明:希腊人性格特征中突出的一点,正如上面(第23点)说明的那样,是在文明的早期发展阶段其感觉和想象力的教育就具有不同寻常的程度,以及在文明发展晚期还保留着可贵的孩子气的简单和幼稚。因此人类原始的性格特征常常表现在希腊人的性格中,像永远可能的那样精致。希腊作家描写的人是由纯粹最简单、伟大——至少从一定的角度来看——总是美丽的特征组合而成的优秀的人。对这种性格的研究必然在任何(社会)状况和任何时代都对人的教育产生有益的作用,因为这种性格特征构成了人类性格特征的基础。但首先得在这样一个时代:因为太多综合的状况较多地关注事物而不那么关注人,较多地关注群体而不那么关注个体,较多地关注外在的价值和益处而不那么关注内在的美和享受;高级和多样化的文明远离最初的单纯,这时研究那些一切刚好与这种情况相反的民族是肯定有益的。

34. 希腊人第二个突出的性格特点是:美感和审美程度很高的教育以及这种感觉在整个民族中普遍流行,有大量的例子说明这点。现在没有哪种教育方式在任何时代任何地方像这种这样不可缺少,这种方式仿佛把人天生具有的完整本质融为一体并赋予这种本质真正的光彩和真正的高贵。如今在我们这里没有哪种教育方式像这种这么必要,因为在我们这里有很多倾向正远离一切审美和美感。

35. 鉴于上面列举的因素,希腊人的性格特质在对人的研究方面极其具有优势,但还因为下面这两点对他们的研究成为可能:1)希腊保存了数量庞大的遗产,尤其是大量的文学作品,这些作品从各方面来看对目前的研究目标来说都是最重要的;2)对一个民族进行研究,尤其对他们的遗产进行研究,在没有鲜活的观察下,如果研究要成功的话,要求民族自身既有显著的民族性格,又有断裂的与研究者性格有差异对比的特征。现在大众教育总是领先个体教育,因此综合其

他一些原因,一切文明处在初级阶段的民族都具有显著和断裂的民族性格,但在希腊人身上还融合了其他一些他们自身特有的状况。

36. 如果人们承认,实际上人们为了这里提出的研究的终极目标特别需要一个民族,那么很快也能决定:是否有其他的民族可以轻易代替希腊的位置,那么要指出来的就是,来自这样一个民族的所有这里列举出来的原因就得共同起作用,或者缺少的原因通过其他重要的原因来代替。这些原因中最有说服力的直接或间接建立在这个基础上:希腊人,至少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处于文明初级阶段的民族(第18—23、33、35点),这个要求是绝对必要和不可以不要的。在地球上其他未被开发的地方是否还有这样一个民族存在^①,这个民族将其他的或相似的或比希腊更好的优点和这个特点结合起来,或者是否这个民族显示出跟中国人和印度人更熟悉,这是没有可能事先决定的。但既不是罗马,也不是一个更新的民族能代替希腊人的位置,唯一的情况已经起作用,就是所有这些民族直接或间接来自希腊人,关于那些和希腊相似的古代民族的遗迹我们就知道得很少了,我认为希腊人在这方面是不二人选,这不是他们特有的优势,更多的是他们和我们相对状况的偶然性造成的。

37. 如果有意开始我这里阐述的对希腊人的研究,那么研究会要求固有的普遍的和特殊的规则。最普遍最主要的规则可能是以下三点:1)首先要实现这个研究的益处,不能让最博学的人和最伟大的人来设计描写希腊人,因为这种描写如果要完全忠实,就永远不会那么个性十足;如果描写要个性十足的话,必然又缺乏忠实度。其次这种研究最大的益处不在于像希腊人那样对性格进行观察,而在于对这种性格特有的探索。通过这种探索,研究者自己也以一种相似的方法

^① 见康德的《判断力批判》第258—260页,显然是引用错了,可能是第58页. Kant: Kritik der Urteilskraft.

式被塑造,希腊的思想精神转移到他身上通过和他自身融合的方式创造出美的形象,因此只有自我研究本身最重要,在研究中要不断地考虑到这个目标。^①

38.2)对希腊人自身的研究要遵循一定的系统的跟这个终极目标有关的秩序。因为考虑到这个终极目标,即使所有的作家都重要,人们首先想公平地找出内涵最丰富的作家,在他们中找到一个固定的顺序,这当然是难以找到的。因为如果人们想关注内容,不关注作家的类型,而是关注要处理和研究的事物的类型,如果人们想遵循时间顺序,那就难以界定,人们是否应该关注作家生活的时代或者关注他处理的对象或者在一定程度上兼顾两者呢?

39.3)所处的时代,人们不仅要长久地停留在那些希腊人最美和最富有教养的时期,而且恰好相反还首先要对最初和最早期的阶段进行研究。因为真正的希腊性格特征的萌芽时期是在其早期阶段,研究早期阶段能更轻松愉快地发现,它是如何慢慢变化最后蜕变的,前面提到的几个原因(第22、23、33点)也完全符合较早的发展阶段。

40.尤其针对这里提出的目标,进行这个研究的辅助方法包括:第一,通过批评和评论直接对材料来源本身进行研究,这自然是第一位的。

41.第二,描绘希腊人的社会状况,研究广义上的希腊文物^②,这里提到的终极目标赋予这种状况最充分的发展,这种辅助工作是必要的,一方面是为了理解个别原材料,一方面是为了获得普遍的概貌以及引入整个研究。每个作家只处理某个对象,如果研究者没对相应的社会状况有所了解,就无法从整体上生动地把握个别对象。

42.第三,翻译。对打算被翻译的作家来说有三层作用:1)让那些自己没有能力阅读原文的人认识他;2)帮助那些读

^① 达尔贝格作注:这对一切阶段都适用。沃尔夫:和人的交往不能通过描述来代替。

^② 指艺术史、实用和史源学说。

原文的人理解他;3)先让那些打算读原文的人知道他,透露他的行为方式和思想精神。如果人们根据这里提到的观点要界定这三种不同作用重要性的程度,那么第一种作用是最小也是最微不足道的;第二种作用重要些,但也不总是那么重要,因为翻译正是比较糟糕的辅助手段;第三种是最重要的,因为通过翻译刺激人们去读原文,也帮助读者上升到更高的层次——读者不只是理解个别的地方,而是让自己的思想和作家的思想产生共鸣,如果人们在这两种不同的语言媒介中来审视作者,第三种作用还显得更清晰。要实现这最后一种作用译者必须尊重原文,那么翻译最充分的好处就是把他自己破坏掉。翻译的主要要求根据这三个目标变化,第一个目标是让被翻译的古代的作家适应现代的读者,也就是常常会 and 原文有一定的出入;第二个目标就是忠实于词句;第三个目标就是忠实于思想精神,如果我可以这样说的话,也忠实于作家用来表达的外在形式,在这个过程中首先要取决于对散文作家措辞方面以及诗人节奏和诗体结构方面的模仿。

43. 为了从整体范围上创造出前面提到过的作用,对古代文化的研究要求最伟大的、最广泛的和最精确的学问,这种学问当然只可能在很少的人身上出现,即使是很小的程度,这个作用也在人们即便是不那么彻底地从事这种研究的时候存在,最终甚至也告知所有完全不了解这种研究的人。因为最准确的理解个体的每种知识在和文明高度发达的社会的结合中才能被称为所有人的财产。

3 人的教育理论 (1793 年)

本文是洪堡手写的片段,莱茨曼加上的标题,标注为 1793 年晚秋时节。文献见 1793 年 3 月 18 日给布温克曼的信(参见莱茨曼《洪堡于 1809 和 1810 任职时给沃尔夫的信》第 60 页, *Wilhelm von Humboldts Briefe an Karl Gustav von Brinkmann. Hrsg. und erl. v. Albert Leitzmann. Leipzig 1939*), 1793 年 11 月 19 日给科尔勒的信(参见莱茨曼《洪堡于 1809 和 1810 任职时给沃尔夫的信》第 5 页, *Wilhelm von Humboldts Briefe an Christian Gottfried Körner. Hrsg. von Albert Leitzmann. Berlin 1940*), 这里由莱茨曼提到的引用给布温克曼的 1793 年 12 月 19 日的信指的是后来的计划(《论人性的思想》,《18 世纪》,参见斯普林格的《威廉·冯·洪堡和教育改革》第 57 页, *Eduard Spranger: Wilhelm von Humboldt und die Reform des Bildungswesens. Berlin 1910*)。

如果有人着手描写特有的能力,这些能力以人认识的不同专业为前提,可能会产生一部伟大卓越的作品。分别研究每种专业的真正的思想精神以及研究将所有专业结合到一起的关系是为了完善作为整体的人的教育。数学家、自然科学家、艺术家,甚至哲学家还没认清工作的本质,没从整体上来进行观察,通常就开始他们的工作,而且只有一小部分人以后能做到这点以及更普遍的总揽全局。更糟糕的情况是有人没有选择那些专业中的一个,而想从所有的专业中为他自己的教育谋利。在几个选择的尴尬中以及由于缺乏能力从有限的范围中随使用一个专业来达到自己的更普遍的终极目标,他或早或晚一定会陷入偶然中,他掌握的内容只用于无关紧要的目的或者只是作为一个短时间的百音盒中的传声装置而已。这是常常并且是不公平抱怨的最主要的原因之一:知识无用,研究思想精神毫无成效;虽然我们周围的很多事都完成了,但只有少数在我们身上得到改善;人们只对更高级的少数有用的科学方面的才智教育感兴趣,忽略了思想意识上的更普遍更直接有用的教育。

正是人处于一切特殊活动类型的中心,人只想增强和提高天赋的力量,赋予他的本质以价值和永恒,而不考虑让一切都针对某一方面的目的。但因为纯粹的力量需要一个施展的对象,纯粹的形式、纯粹的思想需要一种让自己体现并能在其中延续的材料,因此人也需要一个外在的世界。这样人的追求就产生了:扩大他的认知和作用范围,虽然他自己也没清晰地意识到这点,他不看重从那个外在世界获得什么或者因为这个外在世界他创造了什么,而是注重他自身内在的完善和完美,或至少注重使折磨他内心的不安得到满足。纯粹地并从终极目标来看他的思想总是他思想精神的尝试,是自我理解;他的行为是他意志的尝试,是自由和独立的;他整个外在的勤奋几乎是一种不让自己内在闲散的追求。因为这两者——他的思想和行为——由于有第三者,由于要对某种东西进行想象和研究,才是可能的,这种东西与众不同

的特征就是不是人(自身)(Nicht Mensch)而是外在世界,人就尝试尽可能多地把握世界并竭尽所能让自己和这个外在世界紧密联系起来。

我们存在的最后一个任务:既在我们生活的时代也超越我们的时代,通过我们遗留下来的生机勃勃的痕迹,赋予人性的概念尽可能丰富的内容。这个任务只有通过我们自己和世界的融合达到最普遍的、最活跃的和最自由的交互作用而得到解决。这也是评判人类认识每个分支研究原本的标准。因为只有这条路才是每个分支的正确道路,在这条路上人的眼睛才能关注(事物)不可逆转的进步直到达到最终的目标。只有在这里人可以找到让无生命力的没用的东西焕发生机和活力的秘密。

也许乍看上去我们自己和世界的融合这种说法不仅是不可理喻的表述,还是偏激的想法。在进一步的研究中至少第二个怀疑*可以消失,如果人们探寻一下人类思想精神真正的追求(这种追求既包含了最充分的热情也包含了最无能的尝试),将会发现,人不可能在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事上裹足不前。

如果人们想对一个民族、一个时代、整个人类表示尊重和钦佩,那么人们要求他们什么呢?人们要求:教育、智慧和美德要尽可能地强大和普及并占据统治地位。他内在的价值提升到这样的高度,以至于当人们把人性的概念从作为唯一例子的人身上剥离的时候,人性的概念要具有伟大而有价值的内涵。人对此不知足,还要求:给自己制定的宪法甚至他周围毫无生机的自然都清晰地打上他自我价值的烙印。是的,他给他制造的后代打上他的美德和力量的烙印(他的美德和力量应如此强大、具有威慑力并照耀他的整个本质)。只有这样他获得的优越性才可能得到延续,没有这种延续,没有在人类完善和形成的过程中确定无疑地延续这个令人

* 指偏激的想法。——译者注

心安的思想、人类的存在比植物的存在还消逝得快,当植物枯萎时,至少可以确定的是,它留下了和它类似的种子。

如果所有的这些要求只局限于人的内在的本质,他的天性会不断地催促他走出自我去接触外在的事物,这取决于他在这个异化的过程中(Entfremdung)不是失去自我,而是相反,他总把他从外界得到的阳光和温暖反馈到他的内心。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必须近距离接触大量对象,在这些对象身上植入他的思想精神并使两者日渐相似。在他身上就出现完美的统一和通常的交互作用。他又要将这两者返还给自然,他身上聚集了几种能力,给他展示同一对象千差万别的形象:一会是理智的概念,一会是想象力的概念,一会是他研究之前感性的直觉看法。依靠这些,就像运用各种各样的工具一样,他得尝试去把握自然,不仅为了全方位地认识它,更多的是通过观点的多样性来增强自身内在的力量,这个内在的力量又产生不同的作用。正是这种统一性和整体性决定了世界的概念。此外,在这个概念中驻足着完美程度的多样性和自身独立的存在,外在的对象以多样性触动我们的感官,通过自身独立的存在作用于我们的感受。因为只有这个世界包括了一切能够想象的多样性并具有如此的独立性,以至于它用自然法则和命运的终结来对抗我们顽固的意志。

那么人需要的就是使他的敏感性和主动性相互作用成为可能的对象。如果这个对象能够使他的整个本性从强度和统一性上忙碌起来,这个对象绝对就是世界或者是被看做这一类的东西。为了避免凌乱和令人眼花缭乱的多样性,人们追求整体性;为了避免以空洞徒劳的方式陷入无限中去,人们设置一个在每方面都能一览无余的范围;为了把终极目标的想法和人前进的步伐结合起来,人们尝试着把零散的知识 and 行为变成整体一致的知识 and 行为,把单纯的博学变成知识丰富的教育,把单纯不安分的追求变成适宜的活动。

这还真的需要本文开头提到的一部作品以最有力的方式来促进。因为这部作品肯定让人们从他们赋予思想精神

的方向和他们对思想精神提出的要求上来研究和比较人类活动的多样性处于重点核心地位,一切本应作用于我们的东西必然到达这个核心。由这个核心引导着,对无限对象进行的研究就局限于我们的能力和他们的多样性共同作用的较狭小的范围内。我们一步一步地从外在的成功中看出我们活动的画卷,这幅画卷犹如明亮而聚焦的镜子表现出与我们内在教育的紧密关系。尤其是那些关心增强自身力量、完善自我个性的人从中发现这个道理,容易估计到生活中的每种活动对内在教育可能产生的影响。

同时那些从事个别工作的人学习用真正的思想精神和伟大的感觉来完成他的工作。他不再只提供知识或工具供人使用,也不再只是帮助提升教育的个别方面。他明白自身潜藏的目标,他知道,他被一种合法的方式推动着,他的活动赋予思想一种独特的崭新的关于世界的看法,也因此赋予他自己一种独特的崭新的性情;他可以通过被他选择的方面来完善他的整个教育,这就是他追求的目标。如果他把他的力量完美地表现在他的作品中,他也会考虑,如何为了力量和力量的提升而工作。但比人评判他应描述的对象更理想的是在作品中看到付出的努力。天才都把满足折磨他内心的渴望作为目标,比如雕刻家本来不是想给上帝塑像,而是要让这个雕像表现出他造型艺术方面丰富的想象力。每种活动都了解自身独特的思想观点,只有在这里面才驻足了真正的完美的思想精神。实施活动的外在方法总有一些,但只有那些多多少少得到满足的人能在其中进行选择。

只有通过深入思考和对自身持续的研究才能探究我们思想精神的处理方式,特别是在更隐秘的作用这方面。如果人们不考虑智力的差异和方式的多样性,正如世界是如何反映到千差万别的个体中一样,这就很少发生。因此那部作品得描绘这种多样性并不允许忽略任何一个专业突出的人,因为这些人的努力相关专业获得了新的形象,赢得了更广泛的理解。他要把这些体现在完全个性化和时代以及民族对他

们产生的整个影响中。由此人们不仅认识多种多样的研究每种专业的方式,也看到一个渐渐从另外一个专业中产生出来的延续性。但因为这种延续性总是被民族性格、时代和外环境的影响中断,由此人们得到两个不同但总是相互作用的结果:一方面是变化着的東西,它是思想活动在进步的过程中逐渐获得的;另一方面是人的性格特征在个别民族和时代从整体上通过他逐渐从事的活动吸收的东西。此外在这两方面都会出现偏差,天才的个体因为这种偏差突然破坏了连续的进步的自然过程,并把他们的民族和时代突然导向了其他的通往崭新前景的轨道。

通过一步一步地观察最后统揽全局,人们可以给出一个完美的解释:人的教育如何通过有规律的进步得到延续,却没有蜕化到单调片面的局面,身体的天性没有创造出新的东西,总以这种单调从新的相同的变化中得以延续。

4 比较人类学计划 (1795 年)

本文形成于 1795 年秋,显然洪堡想把它作为一本专著的方法论导言。从材料上来说只是关于性别的特征而且还只是一部分,这部分与席勒《女神》中有关性别差异的文章有关。虽然在片段《论人性的思想》中有所改动并提到是大部头专著的一部分,整个计划的设计在 1796 年 10 月 23 日给沃尔夫的信中提及。文献见:斯普林格《威廉·冯·洪堡和人文主义思想》第 55 页 (*Eduard Spranger: Wilhelm von Humboldt und die Humanitätsidee. Berlin 1909*)。

1.

就像在比较解剖学上通过对动物的研究来对人类的身体进行解释一样,人们也可以在比较人类学的基础上列出不同人种的道德特点并比较性地进行评价。

历史学家、传记作家、游记作家诗人、各种类型的作家,甚至不排除思辨哲学家都拥有研究这门科学的素材。在旅行中、在家里、在忙碌或闲适的生活中随时随地都有机会去丰富和运用比较人类学,在所有的研究中只有对人的研究才是我们一生的伴侣。这种研究取决于收集、挑选、整理和处理整个生活提供的丰富的材料。

这肯定是比较人类学做的工作,比较人类学通过以普遍为依据、以人的种类特征为前提^①来探究个体的差异,把偶然的暂时的特征从本质和持久的特征里分离出来,研究本质和持久的特征,探究它们形成的原因,评判它们的价值,规定处理它们的方式以及预测它们发展的过程。

2. 研究的重要性

在人类生活中没有哪种实践活动不需要人的知识,不仅需要普遍的、从哲学意义上来思考的人的知识,而且还需要人在我们面前表现出来的独特的个体的知识。人在获得这种知识的过程中容易犯两个错误,第一,有关个体的概念既不清晰和普遍又不独特;第二,既不根据个体可能的本性也不借助个体遇到的一切偶然的因素来研究个体,因为第一个错误,纯粹思辨哲学家常使原则失去实际的作用;因为第二

^① 指纯粹思辨的人的概念或者指洪堡在《论古代文化,特别是古希腊文化的研究》里寻找的以希腊人形象出现的理想。

个错误,纯粹的商人^①使他们的活动不能持久存在,也对启蒙和内在的性格特征产生不了很好的影响。

为了准确地了解人本来的样子,同时又自由地评判他能发展成什么样子,实际的观察和哲学的思考必须共同作用。如果个体的性格知识在比较人类学上上升为科学思考的对象,如果人们在比较人类学里找到一致的描述,这种描述受不同人种的特征和外在环境对内在性格产生普遍影响的限制,这两者的结合就特别轻松。比较人类学给出的普通的类型,就可以在特定经验的帮助下显示出来,在其首先认为对性格来说可能的范围内,就能确定人在每种情况下真正拥有的地位。

人们总是说,如果立法者要对自己的民族持续产生作用的话,他肯定研究过他的民族、民族的思想精神和民族的性情。他如何完整地了解一个民族呢?如果他不同时研究与之有着密切关系的其他民族,不通过和他们对比差异,他就只能部分地了解自己。他又如何允许对个体的性格产生影响,如果他不对下列问题进行思考:首先性格差异如何成为可能,其次人如何与自由的普通的教育要求相适宜,或者政治和道德在多大程度上是必要的。

为了通过个别特征学些统治艺术的技巧,为了了解人们不用学究气地对待法国人,专制地对待英国人,当然人就不需要那么充分的准备,表面的观察研究也很容易给尊重人类性格中敏感的部分和利用人类的弱点提供方法。

但可以做完全不同的事情。个体的特征应该这样被培养:他们保持自己的特点,不会变得片面,他们不阻止实现普遍的理想优秀性格的要求,不只是通过错误和过激行为与众不同,而是不超越他们主要的界限并前后一致,在这种内在的坚持不懈和外在的与理想一致中一切都共同发生作用。

因为只有在社会中人类才能达到他的顶峰,人类需要很

^① 这里针对具体生活的人,指实践者。

多因素的结合,人类不仅为了通过力量的增加来创造更伟大和更持久的作品,而且首先也通过天性的更广泛的多样性来展示自然真正的富足和整体的发展。一个人永远是为一种形式、一种性格特征和一种人的类型创造的,人类的理想^①显示了太多类型各异的形式,就像人总是互相和谐相处一样。因此人类的最理想永远只能以个体的整体形式出现。

从一系列欧洲民族中找出一个来看,这个民族总的来说对欧洲的文化进程贡献不大,它甚至没有自己的宗族,只是其他民族的分支,我指的是瑞士,在文明程度很高的已经远离自然的欧洲突然缺乏这样的民族,它跟其他欧洲民族如此不同,它拥有相当淳朴的习俗,它要求的東西数量很少,只需要很少的金钱和宪法来应急,就像每个民族形成的初始阶段表现出来的那样。

我们以瑞士的性格特征为例,其部分性格如此接近天性,以至于没人能带着衷心的同情看到其特点消失。因为当然不是每种有差别的民族都值得保留,更少的正好是因为很多偶然因素结合而产生的民族。

但也正因为不是每种有差异的民族都值得推荐,甚至很多还应该受到指责(为了只考虑一点),而且突然一下完全把他们从惯常的轨道中带出来,消灭他们的个性,把他们变成另外的人,从生理上来说都是不可能的。人们得研究他们的差别,粗略估计从他们身上能发展出什么。

人应该保留因为天性和环境影响而形成的性格特征,只有在这种性格特征中他才活动自如,幸福快乐。因此他应该同样地满足人的普遍的要求并且不要给思想教育设限。实际的善于识人者应该把这两个互相矛盾的要求结合起来并同时解决两个任务。如果不仔细研究人的天性中普遍的可能的差异以及个别特征与理想类型的一般关系,他在这个工作中如何能脱颖而出呢?

^① 指人文主义。

教育人不仅仅是教育家、宗教老师和立法者的事情。正如每个人除了是他能是的一切以外,同时还总是人一样,他也得对自己负责,除了他可能从事的所有的活动外,他还同时要实际地考虑他自己和其他人智力和道德方面的教育。

普遍的原则规定一切人类组织不能缺少理性:尊重人类组织的道德和文化,永远不要对他们施加负面影响,要消除可能出现的负面影响。尽量纯结和提升的道德及文化个别特定活动的责任的强度随着他们对思想和性格影响的程度增长,在完全考虑他们的时候,得同样既注重个体的性格形式又注重普遍的性格特点。

最好能摆脱立法者的约束,因为他拥有最大最危险的对人产生影响的权力。国家的整个政策,尤其是对内的政策由此屈服于一种对政策自身来说都是陌生的观点。国家的政策本身没有其他事情可做,只需要解决这个任务:如何能达到一切公民联合起来的终极目标,能最快速最切实地保障人和财产的安全^①,这样政策在每种它建议的活动中,都要问问这个活动对公民作为人的性格会产生哪些影响,每种活动都用这个标准来检验一下,因为这两种不同的观点将导致完全相反的结果:纯粹的政治导致强迫,道德导致自由,因此将这两个互相矛盾的要求结合起来就成为最困难的工作,这份工作还因为一旦谈到保护和引导个体性格的运用而必须更多地考虑个别的情况而变得更困难。

关于这个对象普遍的理论被大大地滥用了。这个理论教导立法者为了更方便控制和引导国家而利用这些特点。^②但如果没有更好的道德的观点的话,纯粹的政治观点容易导致有意维护显而易见的缺点和弱点这种危险。

新时代的政治家还发现了新的困难,一些民族不仅仅象以前常出现的那样联合起来,更确切地说还要作为一个整体

① 指 1792 年的《论国家职能的界限》里的观点。

② 洪堡这里指的可能是赫伯斯的国家理论,参见泽肯多夫或者贝歇尔的观点。

发生作用。如果这应更精确和更快速地发生,那么毫无疑问保留个别材料的差别以及让语言、习俗和意见等一致更好。但如果不损失个体特征、主动性和活力是可能的吗?他应该让这两者中的哪一个为另外一个作出牺牲呢?如果政治家带着这样的智慧来进行研究:既认识到个体特征的尊严,也认识到伟大国家和整体群众无可争辩的好处,他就不会让一个为另外一个作出牺牲,而是更宁愿解决让两者的优势相结合这个任务。无论如何,要解决这个任务他能指望的就是最精确地研究他要处理的主体的真正的特征。

看起来宗教可能最不受信仰者个性特征的影响。宗教教导真理,真理是绝对客观和普遍的,但正是在宗教问题上要仔细谨慎些,如果要避免做绝对违心的事或者对宗教抱无所谓的态度这双重危险的话,就最有必要让宗教一直一步一步地跟着思想变化。

生活中其他的活动就很少能对内在的个体特征产生深远的影响了。为了逃脱坏作用产生的危险,避免犯大的错误就行了。

对独特的性格教育产生较大影响的是自由的日常的在婚姻中、在和朋友的友谊中、在或大或小的社会团体中进行的亲疏交往。这种交往的艺术如果不是像以前总发生的那样降格为喜欢或争取获得的天赋的话,就完全建立在对性格的认识和性格教育的基础之上。

首先要努力让人认识到这种交往对文化和性格很重要,要赋予这种交往尽可能多的感情,然后在每次交往中分别列出不同的个性并加以分类,这样研究者就获得一个非常多样化的概念,然后通过有目的的接触同时也使自己更敏感和更独特。两者都只在完全自由的条件下进行,要完全避免一切目的的假象。一切都应该自然地产生,一切都是游戏和休闲,不是严肃的或工作的样子,这就使之成为美的艺术。

设计这种艺术的基本原则是有益的愉快的,但它只能是下面这种人的工作:这种人能将伟大的多样化的独特的性格

和对陌生的个体的广泛的知识相结合,他还具有如此多的使紧密关系变得有趣的思想 and 丰富的感受方面的内涵,最后还拥有在伟大的世界中发挥作用的轻松感和灵活性。

正是为了作为日常需要不断出现的东西,我们最需要个性化的人的知识,有了这种知识的帮助,我们能把我们通常觉得空虚和虚无的时光变成我们生活中最有意义的时刻。

前面没有谈到教育,很明显,像现在这样对他们的研究是多么重要的前期工作。因为篇幅短小而忽略了其他关系,比如医生必须要注意道德和个体的性格特征,认识到这点对他很重要。

因此比较人类学对两个目的和两种工作有益,它使人轻松识别人的性格特征还同时给予哲学上的指导:判断他们的价值、估计他们未来的发展、粗略估计他们和其他人一起作为一个整体有能力共同作用的可能性;比较人类学服务于想利用人和控制人的生意人(实践者),同时也服务于努力改善人和塑造人的教育家和哲学家。

此外,比较人类学是人类思想精神最有意思的活动,因为人在比较人类学中能发现:①自然提供的最仔细最完整地描述的最崇高的对象;②多形性;不仅通过绘画多姿多彩的色调滋养了想象力和感官,还通过细腻的线条丰富了思想和感受;③持续不断地被研究,以至于不仅每种个性都作为整体被看待,而且一切都整合成一个整体。

3. 个体的人的知识对性格特征的直接影响

比较人类学只教人了解人类性格的差异是不够的,它甚至还能做出更大的贡献:创造更伟大的东西;真正更有目的地引导现存的东西。

第一点是否可以称之为优势,或者是否不是相反,更丰富的性格形式的多样性给普遍正确和客观的文化、风俗和习俗设置障碍,可能在大部分人眼中还不是这样的。一切人类

创造的作品因为普遍的独立于个体主观的探讨得到更好的延续,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可排除思想精神方面的工作。同样,确保宪法和人类实际状况的延续和安全更多的是因为单调的习俗而不是不寻常个体不规律的作用。

相反力量、发明精神以及热情取决于独创性,没有非比寻常和特别挑选的思想精神的道路永远不会产生伟大的作品。

首先是性格形式的差异,尽管这种差异有坏处,但确实没法避免,问题只是,人们是否盲目地认为是偶然因素导致的这种差异,或者认为应该通过理性的引导把性格改造成独特的样子,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只有一种可能。

比较人类学研究人的整体类型特征,尤其是民族和时代的特征。这些特征常常是偶然的,那么也应该保留这些偶然的特征吗?哲学家、历史学家、作家、普通人最终在自己身上应该明显地表现出跟他的名字、他的民族、他的时代以及他自己有关的特征吗?人应该让他所处的一切环境状况对他自身产生影响,不要拒绝任何影响,但要超越自我并根据客观性原则来对待一切影响。他应该是这样的。他后来在他活动的不同类型中表现出来多少,取决于活动类型的要求和他个人的天性,在不伤害作品客观价值的前提下,他越能表现出主观独创性,就越好。

人可以在个别情况下和他生命中的某些阶段收集到足够的材料,但材料永远收集不完。他越让这些材料变成形式,越让多样性变得统一,他就越丰富、越活跃、越充满力量、越有成效。多种多样的环境状况的影响赋予他这样的多样性。他越对此影响抱开放态度,越多的崭新的方面就在他身上反映出来,他内心的活动就越会活跃地将这些材料分别处理并把它们连接成一个整体。不恰当的和有害的就是在某些方面无所事事的付出,从中产生愚蠢的民族和家庭性格,这种情况在实际生活中经常发生。对此不是外在环境多样性的错,而是人内在的软弱和懒散的错,在正确的教育理论

的指导下没有一个民族的成员会显著地和其他人相似,民族性格特征会在所有的个体身上体现,但也正因为民族性格在每个个体身上因为一切其他状况的影响,尤其是因为审视和调整性的理性会减弱,从整体上看个体身上的民族性格特征就没那么糟糕和明显,而是表现得更纯粹、更有特点、更细腻和更多样化。

单个的人是脆弱的,因为自身短暂的力量他能做的事不多。他需要一种高度,他自身要站在这个高度上,他还需要一个适合于他的团体,需要一个他可以融入的系列。他让民族的、性别的、时代的思想精神在他身上植入得越多,他就不容置疑地更具有优势。一个罗马人是什么,只因为罗马生了他?新时代的作家是什么,只因为他们把希腊丰富的文艺创作当做自己的财产并突然达到一种高度?

人从对自然主观的知识到客观特征的认识显然是需要一大步的。主观知识的扩展和细化如何能直接促进客观特征的高贵化?毋庸置疑,只有通过两者,即观察者和被观察者——这里指的是人,处处去适应他内在的思想形式^①,即使不是一直有所察觉,以及通过占支配地位概念的团体,最后总以我们自己都不明白的方式,屈服于人和失去生机的自然。

不言而喻,扩展了的性格特征方面的知识帮助人更准确地评判性格以及找到更合乎目的的处理他们的方法。人也因此发现性格中更细微的东西,实际上性格也以更多样化的方式变化着;通过研究个别的类型以及让他们的形式如此独特(像他们本来的样子)、如此理想(像他们能变成的样子)地显示出来,他们就真的发展得更纯粹和更确定。

性格是通过思想和感受活动的持续作用产生的,因为思想和感受这种活动不断地需要某些天赋而从来或者很少用到其他的一些天资,因此人的一些特质被发展,一些被压抑,

^① 参见谢夫特斯伯瑞的概念“思想形式”,“内在形式”。

渐渐地产生出一种特定的性格形式。因为我们的存在方式和评价方式以及理论和实践特征普遍的一致,通过理念和来自我们思想精神的东西就可能积极地影响我们。人通过理智理解不了不是以某种方式表现在感官和感受领域的东西,但人也吸收不了不是通过概念准备好的东西,人无法明白他对什么一无所知,为何缺乏材料。但人也可以什么都不是,人对什么根本没概念,为何缺乏形式。

对独特性的关注还可以做出更大的贡献。一方面获取与内在本质有关的对象,另一方面唤起性格和激发他的活动。一旦个性特征被唤醒了,他就总是自发地从对他产生作用的各方面吸收与他相似的东西,材料和养料从四面八方都朝唯一的地方聚集。这点在天生强烈、热情和单调的性格中表现特别明显。从这些方面看,人们习惯上可以说,这些性格特征在一切拥有它们的東西身上随处可见。因此他们的片面性成倍地增长,他们身上的错误不在于他们的个性太活跃,而是在于因为热情和天性变成了这样。如果这种特征因为精神的情绪,因为试图到处显示出美丽个性而变得活跃,那么成功就完全是另外的模样了。一个这样的人让一切独特的东西对自己产生影响并独特地对待这一切,但他不会忽略和丢弃那些和他不一样的东西,而是用自己的方式和为了自己的目的而利用它们,他会像最大方的人完全客观地接受每个对象,但重要的区别在于获得的程度和方法。一些外国的民族和德国的反差表现得很明显,法国和英国人以引人注目的特定的性格方式延续下来,但他们也经常以片面的方式对待世界并有失真相和客观性。

首先,性格特征如果和纯洁及确定的性格相联系的话,就社会性地形成纯洁和确定性,不仅是一个和另一个相似,他们之间也有互相对立的差别,因为道德和生理组织的特点就是同化吸收的教育动力,这种动力在固有的性格一旦获得了一些特定东西的时候,不是直接以相似,而是以两方面个性相对的地位互相对立产生,因此男性的性格更纯粹和更男

性化,如果女性的性格和他相对立的话,反之也成立。另外,人们发现这种特征在单个个体身上比在整体类型上体现得更充分,首先是在民族的性格特征上丢失掉,这些民族在和其他民族的交往中更多的是要么强化要么放弃他们自身的独创性或者适当地限制和塑造这种独特性。甚至外在的脸部结构都在一定程度上受此影响,比如结婚多年的夫妇之间的相似性,这肯定不是幻想出来的。

如果到了这一步,其他的研究就轻松许多了。因为没有什么比人的个体更活跃地产生作用了,在这方面尤其是起源^①起着作用,它把获得的东西作为完成的天性留给新的个体,每次都把它变成安全的财产,这好像不怎么保险。^②

对个体性格的研究丰富了这最后一点。但种类的高贵化要取决于这个,取决于性格形式的多样性,除了人的天性之外还存在一个奇特的例子,这是众所周知的:家养动物比其他动物显示出更多的种类、更多的变异和更多的个性特点。

4. 比较人类学一般的目的是和方法——可能滥用的危险

比较人类学的追求是要从观念上测定人类天性可能的差异,或者研究如何通过很多人来阐释永远和个体不相适应的人的理想类型。

比较人类学研究的内容不是自然的对象,而是绝对的东西。理想的类型,如此涉及个体和经验性的客体,以至于人们把这些理想类型看做个体应该接近的目标。

如果不对真实的自然进行研究就能达到这个目标,那么比较人类学就是纯粹哲学和思辨的科学。在一定的理解上

① 指种族的延续。——译者注

② 洪堡这里想到的是拉马克施的进化论。

它事实上也可能是。它可以维持在普遍的人的理想类型这个层面上。它可以根据某些方面来分析这个理想类型,从某些技巧中形成个别的理想的形象,在这些形象中,围绕着这些正如围绕着主要作用的特征,聚集着那些其余的按照自己的位置而且是完美教育的人不可缺少的特征。在人的理想类型中有诸如美感、对真理的追求等,两者都各自具有一定的强度并互相作用从而达到完美的平衡。人们分析这两种倾向,把每种都变成特殊个体的基本特征,从这点出发来补充其余的形象,人们不需要任何特别的经验来获得艺术家和哲学家纯粹的性格特征。

但为了完全实现上面提到的要求,比较人类学必须适应对现实严格的观察甚至处处绝对以这为出发点,因为:

(1) 那种更思辨的方法会带来有害的匮乏,不仅在形式的多样化上,也在每个个体的确定性上,即使是非常努力也是不可能从这开始成为伟大的个性的。

(2) 列出理想类型也需要对现实进行仔细的研究,因为理想类型只能是从各方面进行扩展的、从各种限制中解放出来的自然天性。

(3) 如果比较人类学坚持经验性的研究,它就要忍受运用到实际的生活中去,如果它缺乏将理想类型和现实连接起来的方法,就只是徒劳地树立了高级的理想。

人只是根据他周围的生理事物的标准来发展。第一眼看上去和他内在完全不同的环境状况和事件、气候、土地、生活方式、外在的活动等在他身上产生新的常常是最细腻和最高级的道德的现象^①,通过生理的方法、通过繁殖发育和种族的延续,使曾经获得的道德的天性得以传播和延续,因此可能是暂时的和交替着的智力和道德的进步在一定程度上参与了天性的延续。人的生理上的特征因此在性格形成过程中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

^① 借用孟德斯鸠的观点。

比在单个的个体身上体现更明显的是对整个人类的研究。大的团体、宗族和民族几百年来保持共同的特征,即使这种特征经历了大的改变,仍然可以看到原始的印迹。同样的原因历经所有的时代都产生同样的作用,因此从整体上人们绝对可以找到相似的力量产生同样的结果,外在环境也有着同样的影响,激情产生同样的游戏、好的和真的一样的力量,它就来自杂乱无章的事件并具有最多姿多彩的形象。个体行为处处都反映出一种任意专横的倾向,而团体的命运带有显而易见的自然天性的特征。我们还要多么确定、多么清晰地认识到这点呢,如果我们不总是依据这么短的时期,而且在这段时期中我们不是经常被不完整的知识耽误的话。

因此比较人类学不仅被迫从经验出发,还尽可能深入研究经验。比较人类学要非常细致地研究性别、年龄、脾气、民族等保留下来的性格特征,就像自然科学家努力界定动物的种类和变异一样。比较人类学本身是否只想了解理想的人可能存在的差异,因此它得接受这种现象:似乎比较人类学只在意界定个体的人事实上存在的差异。

比较人类学的特点在于:用思辨的方法研究经验性的材料,创造性地研究历史对象,考虑到人可能的发展方向来研究人真正的特征。

在自然历史和哲学判断的结合中虽然通常用第一种方法,同样巨大的危险威胁着第二种方法。因为比较人类学研究人的种类特征,它很容易就被引入歧途,认为这些特征比现实显示和人的尊严允许的更确定、更持久。这种倾向对人的天性的形成是最有害的,人的天性的高贵完全以可能的自由的个体为基础。人们在评判人的时候需要避免困难的困难在于:把人永远作为但又永不作为自然生物来看待。

这里说的这个困难远没那么危险。因为我们的目的只是首先研究个体的差异,并且还是那些和理想的要求和平共处的差异,而不是那些对人进行自然历史分类的差异。对人进行分类是我们达到目的的手段,一方面是为了更接近个

体,更确定地认识那些持久和本质的特征,让我们因为那些暂时的偶然的事件少走弯路;一方面是为了更好地观察自然天性发展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由于类型的相似性促进了个体的独创性,通过利用他们来界定他们,而又不束缚他们的自由。

即使对性别、性情和民族的性格特征像它们实际的样子那样研究不多,这也不是反对比较人类学成功的理由。因为对比较人类学来说,看到本质的不同并在实际运用中检验和评价那些客体身上真实的东西就足够了。

5. 方法、界限范围、分配

根据前面的论述,比较人类学就是哲学实践方面人的知识的分支。像人的知识一样,比较人类学要避免经验性的知识和纯粹的推想,要绝对建立在经验的基础上,它也要认识和遵循经验提出的主要规律,因此它要:

(1)为了保证最完整的素材,要从整个人的外表和他生理、智力和道德天性中提取刻画性格的数据。

(2)在这些素材中尤其注意那些显示了原本的、真正的、常常使他与众不同的特征,要关注力量的比例关系和它们的运动变化。

(3)永远只关注内在的特征和完善,不要只看重主要针对外在目的的适用性。

(4)尽可能从遗传学的角度来描写性格。

(5)从事实和外部出发过渡到普遍的特征,再从普遍的特征深入到原本的内在的本质特征。

(6)准确地将偶然的特征从本质的特征中分离出来并根据偶然性的不同级别进行整理。

(7)把迄今为止从个别方面观察研究的性格特征统一成一个最高级的整体,从这个完整的画卷中总结出概念,最好通过人们尝试突然表达出达到最充分的最普遍的人的目的

的方式来进行。

他们特别的倾向,不只是像人的知识,研究普遍的或者个别的有趣的特别的个体,而是在不损害理念的情况下研究人类可能的差异范围,通过这些差异又引导它去研究种类特征,对前面的规则补充如下:

(1)首先是比较人类学研究:个体无法达到的理想的完美是如何在一些人身上社会性地表示出来的,因为这个目的,在对性格特征的选择上就要引导它达到它的研究目的。要尽可能多地研究那些要么丰富了人性的概念要么互相对立行动的特征,这些特征如此对立以至于要分别阐述,它们不具有同样的强度但可以和谐相处。

(2)因为在方法上要特别遵守种类的特征,因此要尽可能纯粹地从一切单个个体的影响中界定这些性格特征,尤其要从共同作用于个体的原因和概念中引导出它们的特征。

(3)相反,也要仔细地避免因为对种类太固定和太狭隘的理解而限制个体的自由。

比较人类学的范围原本是和整个人类的性别范围相似,如果不是两个原因阻碍它超越界限的话。

为了获得独特的形式,人需要确定的、程度较高的文化,文化的形成最初绝对是以团体的、粗糙的还较少有特定特征的形式进行的。文明的程度必须发展到一定的高度,如果性格是如此细腻,形式是如此确定的话,以至于它也显示出某些特征,这些特征允许在完善的过程中期待扩展人性的概念,更多的是它作为一条道路出现,在这条路上人能以恰当的方式接近这种完美。因为原始民族最初的大部分特征要么只是外在的、偶然的、不重要的,要么完全是漏洞百出的差异,接着出现个别或多或少预料得到的一些特征,到了最后的发展阶段这种特征就得到普及并开始具有独特性。

甚至在发达的欧洲我们还发现上述所有阶段都共存着,文明程度最高的无疑是法国人、英国人等;波兰人、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也许处于文明发展的中级阶段,处于低级阶段的

是俄罗斯人和土耳其人。谁想从这最后的发展阶段中列出独特的理想性格,谁在排除外在的和偶然的差异之后就只能列举出一种独特的性格特征,这种性格特征以一种值得研究的方式不同于普遍的人的性格特征。

即使没有什么东西能反对客体的适宜性,为了进行这样的描述工作,需要深刻的精确的知识。研究唯一的内在的和本质的特征已经比较困难了:多大程度上从对整体的联系上来认识一切,又比如可能存在多少认识各个民族的辅助方法呢?因此那些着手研究的人很快就在特别需要可靠的指导的时候感觉到孤立无助。

从很少的人种开始做这个尝试工作是可能的:赋予他们内在本质特征完整的概念。如果人们看看客体和我们对象认识上的困难,要达到完美的成功,用唯一的人种是不够的。但创造性的人类学不可能满足于只拥有这么少的东西,它总得研究整体和完整的形象。像生理学上那样追求大量的差异对创造性的人类学来说,是陌生的。如果生理学的研究停留在显示了最不同的差异的遥远的地方,那比较人类学就主要限制在高度发达文明的狭小范围内,在这个范围里,特征表现得最确定和最完美。

关于这些内容的先后安排,普遍的导论要放在描述个别特征之前,为了论述①可能性、原因,尤其是差异的价值;②普遍的种类特征的天性;③同种种类中个别的天性,特别是如性别、民族等方面的特征。

6. 来源和辅助方法、必要的思想流派

如果为了人可能的理想化研究人独特的性格,不是零星地研究个别的状况,而是以普遍的定律并作为一种理论来研究,那他的研究就得注意自然研究的所有类型并且同时是自

然历史的^①、历史和哲学的。

人,显然是生理自然链中的一员,他也像其他动物一样会变种,这些种类延续他们的特征并混合其他特征而产生变种^②,这种和其他类似的情况下显然不能拒绝,还必须利用和引导自然作用。在这方面看,人肯定属于自然。人肯定能像自然一样被观察,那些在这种情况下本来的独特的特征是可以人身上来做实验的。

人的专横最爱违背人身上自然的必要性,因此人既通过自然的约束,也通过理性的必要来开始并结束他的行为。像人们惯常说的,他遵循偶然、外在的影响或者内在的暂时的原动力。他以这种方式做的事情,虽然常常是生理上的,因为也不是间接来自理性的,但总是生理和其他自由天性变化的结果,因此既不能用自然法则来估算,也无法做实验。从这方面来说只能历史性地认识人,他是这样的,他变成这样。这个为什么没有令人满意的答案。

天性和专横在真正的人的自由上通过理性结合起来。因为理性根据法则创造出和自然一样的必然性,但理性不会对自由产生一点危害,因为它自己也表现出法则来。这里就是法则并且是那些超越现象范畴、来自独立的力量的法则,这里是开始哲学和美学评论的领域。

每种对材料理论上的处理根据法则以评判为前提,只要人的性格特征很大程度上有能力做这事,他就允许进行科学的探讨。

人的有机天性让人看到法则,这些法则是规律和不可更改的,比如父母的一部分个性特征遗传给孩子是普遍的自然规律,但人的团体组织的错综复杂的经济结构,他和道德性格特征的更难以理解的联系以及用人做实验的巨大的困难使那些法则总不完美,并绝对难以完整地认识。因此在

① 见第9页《论古代文化,特别是古希腊文化的研究》中的注释。

② 这里指混血。

前面的例子中不可能界定,什么特征是、在何种程度上以及在什么情况下或多或少地因为繁殖延续下来。甚至更简单,把个体的身体的和生理学上的特征作为一个整体来了解,也没有一个普遍的公式或方法,人们只观察和认识到个别的差异,从中能推断出很少的结论,甚至得不出什么结论。

哲学上的评判允许最大的严格性和规律性,在给人的思想态度规定规则的时候比为了扩充知识努力发现力量之间真正的内在关联的时候,这种严格和规律性更多更甚。虽然哲学能正确界定和弄清一些个别的状况,但因为这些状况永远不是单独存在的,换句话说没有哪种状况是纯粹存在的,所以哲学也从来不能完全毫无瑕疵地描述或者完全详尽阐述内在的智力和道德状况。

对材料进行历史性的研究比较无规律性。一切个别的状况都表现得和它创造的偶然及专横一样没有规律。但一旦人们突然注意到大的团体,相似的事件会以一种特定的、虽然没那么严格也难以被观察到的规律性重新出现。

比较人类学提供的材料因此不能科学地,甚至绝不可以从理论上来进行探讨。在何种程度上他还可能也是经验性的,那么个别的现象总显示出某种稳定、连续和规律性,这个规律性还必然要和我们知识的扩充以及人自身天性的完善甚至时代的进步共同得到提高。因此虽然研究者尽可能准确地结合现实,但他得同时尽可能地把严格的哲学探讨和研究结合起来,一方面为了从理论上根据规律来归纳繁杂的事实,一方面为了从实践上根据规律来评判通过观察得到的性格特征。

谁在这里想很出色并真正地扩充独特的人的知识,谁就得在一定程度上兼懂自然科学家、历史学家和哲学家风格各异的思想流派,要像自然科学家一样从组织的概念出发,以普遍的完美的规律为前提,从本质内在独特的力量来解释一切,把这些力量中的每一种都同时看做目的和手段,而要作为生理上的解释也永远不要求助于其他的东西;要像历史学

家那样用最不带感情色彩的无所谓的态度去询问发生的事情,把观察到的零星的事实的整体既不看做自然的产物,也不看做纯粹的意志的产物,这样他甚至不用尝试经历从原因和规律到个别的现象,而总是从现象到原因,如果人们把历史学家和自然研究者及哲学家相对立的话,这正是历史学家的特征,他是唯一的只和历史事件有关的人,他工作的领域既不是自然的也不是纯粹的意志的领域,而是命运和偶然的王国,至少在某些方面没人能解释命运和偶然的变化无常。要像哲学家一样不能忘记,自由独立的本质是他研究的对象,他要以最初的、必要的、独立于现象之外的原因为前提,他必须严格按照规律和理性的想法来评判本质。

最大的困难在于,虽然个别流派经常在个别的性格知识部分进行研究活动,但这三种不同的思想流派常常难以同时进行活动,然而它们需要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因为人是自然链中自由的生物,那些自发来自于他的东西,容易成为一种组织类型。因此,如果对性格特征的材料进行历史性地研究,就总是有必要尝试把他解释为自然和组织并理想化地评判为纯粹的人的力量的最自由的外延。在人的道德天性中人们要设想一个灵活的组织,让令人惊叹的轻松变成自然天性,在变化了的性格方向中又把它和其他东西混淆。事实上我们看到,一方面人能获得特征,这些特征和他身上的一切连接起来,甚至影响到他身体的特征或从他身上延续到其他人身上,另一方面,一旦他的思想精神发生了转变,他就可能从先前的形式脱离出来而和另外的弄混。这后一种力量有时也以令人惊叹的程度表现在个体特征和性别或民族特征的斗争中。这种第一眼看上去难以理解的持久及稳定的结合毫无疑问可以解释为人身上感官和纯粹精神力量的共同作用。人的感官力量总是努力同化一切,把一切变成外部特征和自然天性。相反思想精神力量不熟悉持久性,持久性不是建立在当下持久的合理性上,而是建立在过去的痕迹的延续性上。虽然在斗争中思想精神力量总是占上风,但因为感

官力量也一直在活动,因此存在一种常有的天性,这种天性在和变化了的思想流派有矛盾的时候,是难以独裁专制的。

人为地有规律地找到综合性的研究者,他要把截然不同的风格各异的天性和其他特征综合起来,构建正确的关于人的知识,这有一定的困难。事实上人们大部分时候找到的研究者要么太经验化要么太形而上。因此学习人的知识最好的学校就是生活,在生活这所学校里那些性格非常文明,同时习惯根据法则丰富多样并详尽地进行自我评判的人最能成功。因为那些把必要的自由和规律性结合到自身身上的人既不缺乏把握材料的敏感性,也不缺乏让材料置于严格的根据规律来进行检验的力量。

7. 论普遍的性格差异

第一个我们在一些人身上注意到的、在匆匆一瞥中也逃不过的差别是研究对象的不同、勤奋研究结果的不同、满足需求和享受生活方式的不同。单个个体和整个民族身上独特的概念就表现在这些显而易见的差异上,人们还从很多方面来分辨不同的民族,比如服饰、工作、享受方式和生活方式等方面。

第二个层面的人身上不同的特征跟个性更有关系,即使个性不是直接表现内在差异的特征,人们也可以用身体结构和行为举止来估计外在的一切:首先是身材,脸和头发的颜色、外貌、语言、步态和手势。这些特征的类型很重要,因为一方面他们比前面提到的特征更接近人自身,另一方面,和那些人们直接从内在推断出来的东西相比,他们提供了更真实和更忠实的形象,因此保留的不仅是健康自然的行为,即使某些时候在某些方面很少在整体上出错,而且最独特的识人者都关注这种行为,为了在这些特征身上就像在直接的事实身上一样更深入地检验和更正他的判断。

从这两种类型的特征出发,人们终于可以过渡到内在的

差异。虽然人们不是直接在力量中遇到这些特征,因为整个人类都具有这些力量,但可能有程度的区别,因为力量在有些人身上达到一定的高度,而在另外的人身上永远也达不到;有不同的状况,比如想象力在一部分人身上占主导地位,而理智在另外一些人身上占主导地位,或者在他们的活动中,一些人孜孜不倦地积极行动,另外一些人懒散无所事事等。此外在感受上,一些人比另外一些人更温柔和更有魅力,最后在爱好和热情上也有区别。

分别研究所有这些存在的差异,说明个别外表上的差别比性格特征本身的差异更多。只要人们分别研究,就总是不确定:他们是否不是更多地从外在的状况和环境的差异中,而是从内在的性格形式中产生的,个体可能来自于哪种差异呢?只有在内在的性格形式中才存在原本的性格特征的差异,为了找到这种差异需要其他更深入的研究。

8. 比较人类学思想首先为依据的最根本的事实

这个事实就是性别的差异,这个事实促使天性成为每个人如此显而易见的特征,和他人的差异对比如此鲜明,以至于不能产生混淆两种性别的特征或者用第三者来消灭两者的个性特征这种理智方法的想法。各地都在谈论个性差异,性别特征可以作为样板,在这个样板中其他特征的方式、产生、发展和相互之间的关系以及以最引人注目的方式成为一种类型都清晰可见。在一切以自然观察为基础的研究中研究最清晰可见的某些方面是最好的方法。

在两性之中取决于规定所属的个别特征统一性的地方,为了证明性格差异原本的不同,最好研究女性的特征,因为女性的特征具有独特的方式,与男性的特征相比,女性特征更纯粹和更少地将独特的方式和种类的特征相混合。

在和男性的比较中研究女性天性中的某些特征,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1) 她们的身体结构更娇小、更柔弱和更柔和；她们的骨骼更细腻、更柔韧；她们的肌肉更适合做缓慢的需要耐力的事情，不适合做突兀的动作；她们的身材受柔软、流畅的轮廓限制，充满了丰满和优美；她们在举手投足之间的表现更多样化、更生动和更温柔，而不是那么直接生硬和决断，她们的美首先更多地是因为材料的自由以优美而不是因为形式的支配以确定的形式表现突出；最后她们的身体组织因为强烈敏感、积极的神经系统以及一定的被动性而非常优越，由于这种被动性她们能抵抗长时间的不幸和更容易承受大的变故。

(2) 她们在智力方面的能力有这种倾向：明确地观察自然以及一切具有直接价值和内容的东西，她们也反感一切间接和象征性的东西；在探索真理要求活跃和灵敏的敏感性、轻松快速的理解和连接这方面她们有值得钦佩的优点，她们也拥有引人注目的缺点和更反感更多地以自主和严格的精确为基础的那些东西。因此对事物本质的追求是女性所特有的，但正是如此她们在客观的纯粹性上很少达到这点。她们不像男性那样对待研究对象很独断，她们不是要求，而是相反，常常以更宽容的爱护的态度认清研究对象并完美地探究研究对象。关于真理的思想她们会忽略细节。因此她们在观察客体的过程中总是直接求助现实本身，但因为她们更多地依赖现实对象在她们身上产生的印象，而不是倾向去发现、去分析和用实验去探究它们，因此她们很少成功地详尽地探索现实。很多时候她们把主观的想法和现实相连接并运用这种想法，正如用最独特的概念延续她们特有的内在的生活。同样地，她们总是从最有意义和最有成效的结果中获取每种结论，把这个结论和其他的观念相连接，但总是并未仔细地用充分和确凿的原因来支持这个结论。同样的原因她们也根据最抽象的哲学的最后结果感觉到迫切的需要，因为她们的天性与其允许她们安静，不如说直到她们整个的思想连接成一个整体。因为当抽象和她们的个性特征完全矛

盾的时候,她们是不熟悉原本的思新性的推测的。真理意识在她们身上最准确的理解是一种意识,她们因为天性本身深入热爱它和尊重它。但因为缺乏原始的建立在这基础之上的特别的力量,这种力量将本我严格地和它周围的世界区分开来,她们不像男性那样如此接近研究真相这个最终目标。

另外一种性别智力上的特征的差异很大部分建立在敏感性和想象力的活跃程度上,这种想象力允许其他的力量,最少是理智和理性,不那么轻易地单独起作用,相反也不像在男性身上那么专制地处理问题,而是更服从和忠实于感官和感觉。

人不可以从女性的思想精神中期待获得纯粹的个别的知识和真理。思想精神可以做得更多,它的使命更伟大和更高贵。尤其最普遍的思想活动中最伟大和最好的包含多样化的丰富性,对自然最忠实的坚持以及直接的内容,连接一切的追求,把本我和周围的环境既通过互相联合也通过融合成为一个绝对整体的要求,是直接因为天性本身而存在的。它只缺乏保证个体足够的安全。

因此女性的思想如此舒适地作用于男性的思想。在男性的思想因为专横的想法和冥思苦想的推想表示怀疑的时候,女性健康和自然的目光常常使男性的思想变得安静和坚定。相反,男性的思想很早就确定,因为男性忽视或者很少注意跟他意见不一致的事实,女性的思想要求他去怀疑。此外,男性看到无限的他应该慢慢地一步一步穿越的道路,而女性的思想快速地以中等的步伐跳跃着将两个终点连接起来,这被认为是感性上的捷径,也因为这种思想不断使人想起最终极和最高级的应该达到的目标,这个目标不被特有的活动打断。因为和女性身上的特质相对立,男性感到有必要在这方面要更努力地深入研究。

(3)关于性别的美学特征。如果美感应是活跃和激烈的,那么思想的活力处于中间位置,保持在感性和纯粹的理智活动之间,既从身体使用方面也从概念方面来研究对象。

将两者放在一起混合是有必要的,将物质不仅作为概念还作为形象——也就是作为一些虽然感性,但也是非身体的东西来看待。女性智力上的天赋对相似的气质力量的结合,对在现实和纯粹智慧之间的中等的游离很有利。在同样的文明程度上她们绝对比男性更注重高级和理想化(一方面因为她们首先更多地追求统一,另一方面因为在她们身上占主导地位的想象力追求同样的方向,最后因为纯粹的智力活动她们在较低级的范围里容易满足),为了持续停留在分化出来的理性观念的领域内,以及她们不喜欢和感性的现实离得太远。她们只欢迎自身拥有普遍性和必要性,并且不是根据清晰认识到的完美表达出来的原则,机械性产生的评判。另外还有女性身体自身拥有的也有能力接受的外在的妩媚和美,她们分配恰当的丰富和细腻的结构以及独特的特征,她们优美的动作和好听的温柔的声音。此外,这种特有的魅力不断地围绕着感官,也对特征和感受的节奏产生反作用,或者可能更准确地说是建立在这两者之中。最后还有外在的环境状况,在这种环境中严肃的活动是最不令人厌倦的并允许把其他的一切作为游戏和休闲,特别是让悠闲的思想和想象力的发展获得充足的时间。因此妇女的美感是持续激烈、令人惊叹的活跃,她们评价一切都是根据喜好的原则并尝试着把鉴赏力植入她们生活中最小的特征里,一旦人类的文化和女性的性格特征相结合,这在最本质的理解上是性别的天性并且不可避免地发生。这种美感是否准确和纯粹,比如是否不混淆纯粹的舒适和美,更多地取决于个别主体的特征。

从这种更不确定的美感出发,还有很远的路达到原本的艺术感以及更远的路到达艺术天赋。在所有的艺术领域,纯粹建立在逻辑原则基础上的技术的东西可以用对自然的模仿和真相相分离,这种真相又可以脱离原本的艺术的或诗意的、主动的想象力的纯粹的产物。对最初要求的正确判断完全取决于以此为准则的文化理解。这可以是女性的,她们不是那么严格地接受它,而是相反原谅其他美的大的错误。对于

第二个要求女性因为她们细腻的研究思想和可靠的言行举止可能是杰出的裁判。因为离自然很近,没有什么来自自然的特征对她们来说是陌生的,如此有魅力和令人感动,她们不会轻易为了作家在她们身上唤起的感受而感觉丢失了她们内在的相应的东西。因此她们能更深入和内在地理解作家,但她们也会更严厉地评判他,因为她们遵循她们天生的感觉,不受预先规定的意见的束缚(这使男性经常出错),因此毫无特性和不自然的东西很少能欺骗她们。唯一威胁她们的危险是可能将一种过于片面的、过多地来自她们个性的经验作为她们评判的基础。但这种情况较少发生,因为她们的性格特征包含更大的范围,女性的天性本来不像男性那样诗意,因此女性的思想常常也不对艺术最高级和最后的要求表现得更开放和更敏感。女性的思想不容易专注于现实并且很少发展成完全纯粹的理念范畴,女性思想唯一可能缺少的是力量,主动的想象力运用这个力量绝对可以独特地、完全理想地同时在自然和理念之间自由漂移从而得到它们的作品。事实上人们也从这方面发现女性的判断不总是纯粹的,常常更多地通过真相而不是艺术作品的诗意的东西来界定,常常通过主观的关系、一致或差异来博得好感。性别的天性使诗意的判断比在男性身上更轻松和更常可能发生,但这种天性为完全自由和纯粹的诗意的判断设置了更大的障碍(因为这种天性使想象力和感受结合得太紧密并允许性情的力量较少地分开起作用),从来没有应该克服如此巨大的至少关于判断的障碍,以至于她不完全保留她们的特征。

更困难的是独特的创作和艺术天才。天才作为人类思想上最自由和最伟大的飞跃个体,必然在各种类型的性格中碰到许多障碍。试问一下,在哪些性格类型中或多或少会遇到天才。不可否认,在从事艺术的过程中女性在特定的方面是很成功的。她们的作品首先是轻巧、优美、可爱和令人喜欢的,至少在某些特征中是真实的并深深扎根于自然。她们是否也如天才能做的那样,有能力创造一种形象,从而使这

个形象绝对突出于自然又完全是自然的；她们的想象力是否不缺乏优点或者至少不缺乏想摆脱一切陌生法则并且自身有规律的支配力；她们的思想是否不缺乏客观性，这些是另外的问题。至少有一点是确定的：为了和天才的作品保持必要的平衡，女性的性格特征因为较强的敏感性也要求更充分的自主性。在何种程度上单个的个体能克服这些困难，这是没有普遍的规定的。只有经验表明，妇女不轻易在那些成功首先以艺术的、只有通过天赋才可能的形式为依据的类型上做尝试，就像史诗和戏剧化的诗歌以及造型艺术一样，而是几乎只在那些提供更多平面的、给予纯粹的魅力和丰富的材料更多空间的类型及音乐、绘画、小说和抒情诗的文艺创作上进行尝试，即使这些类型可能要求更伟大的艺术技巧和持续的勤奋。

女性在科学或诗意的生产力成为可能之前已经经历一个成熟的阶段，没有经历这个阶段，即使是在最优秀的主体身上，也缺乏足够的清晰和宁静，还更缺乏力量，甚至缺乏将一系列个别的思想和感受从整体中分离出来以及为自己进行处理的倾向。

(4)关于感受力和意志。为了从最特别的一面来了解女性，得从道德的性格特征开始。正如在男性身上的思想一样，在女性身上思想意识最活跃和最主动的。她们从任何一个地方吸收的东西，都会转变成思想意识，一切都会植入到思想意识，一切又来自于思想意识，因此决断的持久的朝着现实的倾向是女性特有的，因为当思想，至少根据终极目标来看，总是停留在普遍性和必要性的领域里，想象力停留在可能性的王国的时候，个体的现在就属于感情和思想意识。

最初和最原始的原因在于性别的自然界定，为了给予和保持生命及存在，必须对自然和现实保持忠实并严格地和它们束缚在一起。虽然这首先建立在身体的组织上，但影响直接扩展到道德的性格特征上。因为在爱情中最人性化和最具思想性的感情和自然的需要连接，那么这种感受绝对通过

整个本质散发出来并告知其本质这种感受的特殊性。同样的情况虽然也在男性身上发生,但主要的区别在于,女性是接受和保持的那部分,一种绝对独特的感情属于她们,也就是作为母亲,女性一旦作了母亲性别特征就深深植入到她们的个性中了。

女性的感受在男性面前虽然以更大的魅力,但也是通过更大的内敛表现出来,不是个别的感情不能深入男性的心灵,以至于这种感情突然要求个人性情的一切力量和动力。有一种特征是男性特有的,但在女性的心灵中听起来(如果概念允许的话),其他的一切似乎都是由一根琴弦发出振动。她们的性情如同清澈静止的水面,从波浪到最细微的振动都扩展到最外面的范围,因此她们的内敛更多地伴随着轻松和温暖,而男性更多的是激烈、炽热与努力。

女性的害羞产生于内敛,就像从害羞中产生女性的庄重一样,害羞的感受总是在人们感觉到专注,不那么冷静地区分思考、理智和感情及爱好时产生,以及在另外的人身上看到对立的情况时出现。因为男性天生更冷静和更谨慎,因此女性的害羞很多时候在和男性的关系中清晰可见。女性的身体组织是适合吸收和接受的,和道德的性格一样,一切都反馈到内在的状况。两者在这种感受的特殊类型中相结合,我们称之为处女的羞涩,人们也可以把它看做是这种感情以不同的程度和不同的形象反映到整体组织和一切状况的源泉。

对女性来说,相当特别的感觉是做母亲,尤其是在孩子出生前。这种爱不是通过对个体的印象产生的(因为对父亲的爱可能增强和改变,但产生不了这种感觉),而且是与最确定的牺牲联系在一起的,这种牺牲以此为基础:陌生的人和自己处于如此普遍和紧密的联系,以至于它构成自己身体的一部分,而且这部分东西还是活生生的人,它为了独立地存在只是短暂地和陌生的身体联系在一起。这样的爱,更多的是女性的天性,她们从来不是从自己的经验来认识它;这种

爱不仅只满足她们身体上的最终目标,而且影响她们的整体性格特征;这种爱让女性打开了不同的获得事物的感官,教她们认识完全不同的将外在的客体和自己连接、驻留在自己身上,又与自己分离的方式,对此男性只有模糊的概念。因此就会出现这种现象:在女性的心灵上每种更深刻的感受及特别的想法是她们心灵的一部分,这部分要她困难同时痛苦地与自己割裂开来,她了解可缺少的甚至痛苦万分的牺牲带来的愉悦,对此,男性只有在少数个别热情的时刻能感觉得到。

活跃敏感的感受和对理解了的想法的忠诚自然产生热情、敏感和激烈的性格。因为智力上的文化减少了理智的片面性,美学的文化减少了感受的物质性,因此在有教养的女性身上这种热情几乎消失殆尽,在她们身上已经很少有那种不一样的强烈的我们称之为热情的冲动,但热情在持续的高级均匀的紧张状态中存在,如果热情抓住了这种紧张状态,就只为一个至少根据主体的观点一切心灵的力量集于一身的对象,并且是以高贵的伟大的方式出现。在这种热情的状况中一旦环境适宜,美丽的女性就会失去她们惯有的羞涩,她可能突然自由地出现,宣布热爱的对象会摆脱外在和传统顾虑的枷锁。

没有什么比道德上的漠然对女性更不利的了。这种漠然在粗俗的天性中表现为严厉和不宽容,在稍好的、高级些的天性中虽然有最自由和最美丽的宽容,但如果值得尊敬的特征帮助伤害道德的事物,对此的估计是最少的,因而和男性的不同,男性容易走得更远并且分享他想宽容的错误。首先是女性——至少从更高贵方面来看是适用的——在对基本原则的评判上比在某些方面运用它们严厉得多,在这方面甚至过分宽厚或不坚定(因为这两种情况都经常出现),这是女性化的特点。

如果人们提出这个问题:总体来说在女性身上感性的、美学的,或者道德的感受是否占优势,那这一点不能在任何一位女性身上得到肯定,通常在自然的教育中大多数的、激

烈的感性很少是女性特有的,以至于著名的关于性冷淡或性热烈的争论在这方面毫无疑问地对第一种感性方面的说法有利。美学方面的感受在取决于感情和性格的时候至少和道德的不矛盾,干瘪的可怜的道德方面的严肃即便符合日常生活的规则,至少不能为自己满足更好的更多样的感受,在美丽的女性身上应激发起真正的强烈的热情的时候,这三种感受方式要同时作用,但这种热情如此强烈地表现在每种感受方式中,因此没有经验的评判者很容易将占支配地位的那种感受解释成是唯一的原因。粗糙的、还完全天然的女性虽然对放纵的感官的欲望不陌生,但这种欲望既不是来自积极的强烈的感性(肯定在更独立和客观的男性身上更明显),也不是来自空洞的感受和想束缚她的对立力量的缺乏。因此和男性相比,这种欲望在女性身上更多地通过文化来束缚。

女性从整体感受上要求的和谐,在每个她以某种热情献身的对象身上要求的整体性以及她强烈而炽热的感情必须要共同作用来创造出人们称之为持久永恒的思想意识的东西,一方面对抗情绪的变化,一方面对抗意志有意的作用方式。因此女性的道德观念更多地建立在自然天性的基础上而不是建立在思考和性格的优势上,因此女性的性情常常保证高贵的思想意识自愿占统治地位的美丽景象,而男性的性情更多地提供个别出色的斗争的崇高景象。男性不大缺乏所要求的力量,显示出一些例子,对纯粹的德行牢不可破的忠诚更多地来自过渡到天性的思想意识而不是来自直接的对法则的尊重。

5 论人性的思想 (1797 年)

本文是存放在特格尔庄园档案馆里的片段,标题由莱茨曼标注,大约写于 1797 年 12 月,结尾的备注是后来添加上去的。

1. 人有一种在他的思想和行为中观察连续性和统一性的需要,他在评判他活动的对象和方法的选择上不能满足于只遵循有限的考量,不满足为了好的和符合愿望的标准只接受与其他价值有关的事物。他得探寻一个终极目标、一个根本和绝对的标准,并且这得和他内在的本性保持紧密一致。

2. 即使他可以在别的时代给他的研究思想设置更小的范围,那么在现在这个时代是不可能的,只要很多东西在人类外在环境中是固定不可动摇的,所有的一切只需要与此比较一下,这个问题就必然是:危险是否威胁人类社会的这些支柱?但如果我们身外的一切都不确定,仅在我们内心拥有一个安全的避风港,自从在地球上一个最重要、文明程度最高的地区社会状况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以来*,就总让人怀疑,其余的东西还有多少可以保存下来,尤其因为那个变化在一个哲学时代被认为是唯一合法的、有些绝对、道德上必要的东西。^②

3. 对最后和绝对的追求还有一个必要的原因,一切间接的有限的总能片面地要么满足我们的智力要么满足我们的感受,我们整个的,也就是我们最好的真正的人的天性只喜欢那些触及我们真实的、内在的、本性的东西。

4. 因此人得探索一些东西,他能让一切都服从这个作为终极目标的东西并根据它,就像根据一个绝对的标准来评判一切。他只能在人自己身上找到这个东西,因为在全体本质中一切都只涉及人。既不涉及他短暂的享受,尤其不涉及他的幸福,因为确切地说,能拒绝享受和放弃幸福是他天性中一个高贵的优点。因此这个东西只存在于他内在的价值和更充分的完美状态中。

5. 它就是人要找寻的尊严,人得回答的问题是:那是什么,人们可以根据它就像根据普遍的标准来界定事物对人的

* 指法国大革命。——译者注

② 暗示法国大革命和建立自然法的要求。

价值和人相系之间的价值？人们怎样才能辨识出它在哪里？人们又如何好像在好像还缺乏的地方把它创造出来？

6. 因为它应该随处可用，所以它得是普遍的东西。但没人能想得到根据唯一的模板改造千差万别的天性，所以它不可以妨碍个体的差异。它得总是一个并是同一个能够以多种方式加以实施的东西。

7. 在人探索这个不熟悉的東西以及实现目标的方法的时候，从理论上来说可以尽可能长时间地进行，他得从普遍的共同作用的可能性出发来关注一切及关注整个人类的完善。在他想实际使用这个方法的时候，他得把他自己包括在内，因为把不是自己可以确定的东西纳入确定的计划是愚蠢的。判断力在世界上寻找全部，认识不到其他的范围，就像是自己的一样，意志在个体身上找到他的全部，但永远超越不了这个范围。

8. 但如果两者不应该相互矛盾的话，那这个问题就可以这样解决：他自己朝着目标前行的同时促进了一切朝着同一个目标的普遍的接近，并且是直截了当地（就这点而言他不仅是整体的一部分），他自己的教育迫使其他人在他们自己的教育上取得进步，并且要和他的教育保持一致——尽管他们不愿意甚至违背他们的意志。理性判断力和实践意志的普遍的相互作用总是产生一种行动的风格，在这种风格中我们用完美的个体的活力完成普通计划中个别的作用。

9. 道德是不能提供他要找寻的东西的，它也不能被看作是熟知的东西。因为即使道德的价值规定所有人的尊严，也只局限于我们本质的一部分，只局限于思想意识。这里人们要求的也是教育，尤其是如此普遍性的东西，这样它从一切力量和一切的外在表现来把握整个人。

10. 这正是我们追求的与众不同的性格特征，要对每种人类活力和每部人类作品价值作出最高的评价，同样地要对一首诗是否具有诗意，一个哲学体系是否真的有哲学味，就像性格是否是真正的人的性格一样作出决定。

11. 有一种特征,让来自人类的一切伟大的东西都有必要打上它的烙印,因为它是伟大人性本身的特征,探寻这个特征并在普天下重新辨认它的特点就是我们打算从事的工作。

12. 为了真正达到这个目标,人可以选择两条道路:经验之路和理性之路。

13. 经验之路:人环顾四周,选出那些赋予他最好和最充分的完美人性概念的人物。因为他看不到理想人物本身,所以他执着于理想人物的最忠实的翻版。他在众多时代和民族中选出作家、艺术家、哲学家和自然科学家,这些人曾经以真正伟大的风格工作过并在他们各自的工作领域表现出自身最纯粹最充分的独特性。人尤其不会错过从生活本身呼唤那些人,他们通过内在的特点和外在的形象最清晰地显示出充分的、高贵的、人性的概念。

14. 接下来他仔细比较所有的人并研究所有人身上的共同点,对他来说这个共同点使他们处于内在价值的高级阶段,在研究中他逐渐得出以下结论:

15. 这个他还不熟悉的东西:(1)不是机械的东西,它不能通过完全遵守指定的规则被模仿,如果因为存在某种相似性而不在一定程度上亲自尝试的话,甚至不能通过纯粹的判断力来把握,谁不懂这点就看不到它,谁看到这点但没法表达出来。

这在艺术上是很明显的,迄今为止没人明白或解释得出真正的艺术思想是如何产生的,更不明白,这个思想是如何被实施的,尽管几乎每个人都能隐约感觉到,而且很多人能清晰地感觉到。

同样比较明显的是在实际生活中。纯粹为了义务的缘故我们履行义务时使用的活力是不能用言语清晰地表达出来的,我们的天性想这样,因此它就是这样。在这点上看得清楚:对纯洁的感觉而言是显而易见的,对乖戾的感觉而言就显得乏味可笑了。尤其是女性心理轻微的波动就更难表

达出来,而这种波动正好泄露了性格最细腻和最美的部分。心灵感受不可能到这种地步,以至于它只对那些理解它的东西敞开心扉,在看到不好的东西的时候本能地退避三舍。

虽然人们能因为纯粹的理智的工作程序跟随哲学家一段路程,如果那个时刻最后没有到来,在这个时刻人们不能再分析性地做事,而只有尝试决定,人是否是天生的哲学家,哲学家的哲学就成不了首要的原因,这是不可更改的标志。

在自然科学家身上是最难把握的,因而需要详细的讨论,我们只满足于说明:对生机勃勃的自然的研究者来说生活的概念,对失去生命的东西的研究者来说动力学上运动的概念及化学上相似的概念是难点。

数学本身是很少拿出来说的,数学以结构为基础,这种结构只能被展示和模仿,不能被解释,因为在这种结构中比纯粹的概念,更多的并非来自感性的天性。

人领会事物有两种方法:①如果人们在我们身外的自然中去真实地展示它;②如果人们解释它作为必要结果所依赖的概念。我们这里谈到的东西不在这两种情况中,它通过下面这两点表现出来:①主动的结果(没有任何来自外在自然的东西);②原始活动的结果,没有更早的它能够依赖和从中被领会的东西了。

因为可能有探寻每种纯粹的思想活动直到原始的自主的行为,那么在每种主动性中必然有难以理解的时候,在这种时候纯粹理智的程序不再够用。

16. 在这些如此优秀的人身上到底有什么特征呢?(2)不是只提供好处和享受、只给人方法或者直接迎合人感官爱好的东西,它直接深入人性并增强内心最深处的力量。

因此我们把真正使我们深入了解我们自己及世界的作家和那些只是令人愉快以及能说会道的人区分开来,把理想的有教养的人和只是有用的商人(实践者),脾气好的父亲或

者只是能聊天的伙伴等区分开来。

17. 它是那种(3)谁拥有它,谁同时就拥有高尚人性的方式。如果他自己发展得片面单调,这种伟大的东西在他身上也不可能具有普遍的支配地位,它一定配得上完美人性的概念并在影响其他人的过程中总是滋养和增强这种人性。

只有真正的作家能对性格产生舒适的作用,其他的对内在的教育要么是有害的要么是可有可无的,从这点来看,有道德是对每个艺术家最基本的要求。如果伟大的艺术家不总是伟大的人,那就是因为他不是在他本质的所有方面和他生活的每种时候都是艺术家。

18. 找到可以用来比较和评判一切的唯一观点的可能性建立在优秀的方式和优秀的人性相似的基础上。没有这样一种观点,人既不能把他周围的东西据为己有也不能教育性地反作用于他们;既不能把世界融入他的个性中,也不能给世界打上自己的烙印,而这可能是他追求的终极目标,是人真正享受的唯一源泉。

19. 因此如果人们给人类活动的个别类型规定特别的法则,通过遵守这些法则应该对人的普遍的尊严保持忠诚,这是一个错误。直接而且只有通过艺术是真正的艺术,哲学是真正的哲学,才能舒适地对性格产生影响。

20. 那些我们这里作为榜样的优秀的人,总是具有(4)果断的、独特的个性。人完美地发展成人,肯定也是作为一个独特的人出现,艺术家、哲学家、自然科学家也一样,总是根据普遍的优秀的每种类型里个体的多样性允许的空间活动。

21. 使那些人成为伟大人物的东西(5)不了解完美的界限,它发展成为无限,没有达到终极目标并详细阐述它的范围的时候,它是生机勃勃的力量的活力,生活通过生命得到增长。

22. 最后这个东西(6)在自己周围也是富有成效并且是激动人心的。它自身是生机勃勃的,它向四周散发光芒,在这个普遍的作用中它同时具有三个主要的突出特点:

23. 第一,它不是通过制订好的计划、有意的变动,尤其不是通过针对其他人的活动发挥作用的,只是通过它在那儿,它行动和被感知,就能发挥出教育的力量。

24. 第二,它作用于各种不同个性的人,对它来说从它存在的东西中找到一点就够了,在那些它发现微弱光芒的地方,在那些挡住它的残渣不那么粗糙和难以看透的地方,它点燃已经快熄灭的火苗并把它重新变成温暖的火焰。

25. 第三,它使那些它能影响的人和那些自身拥有它的个体不一样,此外它不仅不赋予他们特定的形式,还促使他们去找寻他们自身最特别的东西。因为它唤醒他们内在精神的生命力,这种生命力自然就塑造了他们身上只和他们自己相匹配的性格特征。

最能证明这个观点的就是爱情,在爱情中没有什么像我们这里谈到的东西这么强劲、明确地发挥作用,因此真正的爱情永远产生不了平等,而总是理想化地协调性格。相爱的两个人都显示性格独特的一面,在互相接近中共同朝着理想状态努力,这个理想状态是两个人以一个概念和在通过热情激发的想象中结合成一个形象。

26. 人要么通过他本身,要么通过他的作品产生影响,但伟大的人也给他的作品打上他自身的烙印,因此他的存在远远超越他生活的时代,人们因此可以把所有的书和艺术品分成有生命力和无生命力的,有生命力的作品可以塑造人,无生命力的作品只能教训人。

27. 在人研究道德追求的终极目标,而对那些赋予他最好和最充分完美人性概念的个体进行比较的时候,因为从作用上来说是一样的,他在所有人身上找到预示着相似和一致特征的东西。

28. 他发现,它在所有人身上——尽管他们的性格千差万别——既提升普遍的人性,增强特殊的特征,又获得拥有它的那些个性更严厉的人和接近他们的个人。他由此认识到,这才是共同的核心,从这个核心出发能同时认识、评价和

塑造整个人性,这正是他努力进入的核心。

29. 人在用它普遍的作用辨析出这个不熟悉的东西之后,他就得根据特殊的特性去找寻这个东西,他认为用他已发现的普通的特征来进行比较。如果他用这种方法找到一个东西,这个东西不是以有限的(机械的)方式产生,也不导致有限的(物质的)目的,它在出现的地方扩展人性的概念和规定个体的概念,当它能挣脱一切藩篱完善拥有它的人,同时又对其他人产生教育和卓有成效的作用的时候,在这种特性存在的地方又总是陪伴着他们,那么人就可以确定,他找到了他要寻找的东西并完成了他的工作。

30. 为了让我们更了解研究的结果,我们想暂时给这个不熟悉的东西命名为人性的思想,这个命名已表明,事实是值得尊敬的个体也是作为最优秀和最伟大的人出现的。

31. 理性之路:应该找寻作为人追求的终极目标的人的使命以及评判的最高标准,但作为自由的主动的生物,人的使命只在他自己身上。

32. 最伟大的人因此就是以最充分的力度和最大的限度来阐释人性概念的那些人,评判一个人就是要回答一个问题:这个人能赋予人性的形式哪些内容,他又必须从人性中形成哪些概念,如果人是人唯一可借鉴的模板的话。

33. 人性的概念只能是思想精神的生机勃勃的力量,思想精神赋予人性生命力,在人性中显现出来,在人性中活动并产生作用。

34. 因此可以说我们这里研究的对象就是人性的思想,我们要在三本书中连续回答三个问题:这种思想精神在哪里?它如何被认识?它如何被培养?

结尾备注

很难用一个既普遍又特殊,既作为本质又作为力量的语言表达方式来描述人的本质。要用一个合适的表达方式,那

么它得同时涉及感性和非感性的天性,此外它还要显示出它是处于支配地位的东西。

从这两方面来看思想*显然是一切可用的词汇中最恰当的了。①因为它本来就是来自感性的东西,来自通过对水的成分的分离**而来的强烈而刺激的饮料。②因为严格地说,它从未表示过纯粹的非感性的东西,除非有特别的补充说明。人们说心灵和身体(Seele und Körper)比思想和身体(Geist und Körper)用得更正确,常常说纯粹的思想(reiner Geist)。③因为对非感性的东西来说它正好是特别的词汇,我们正好还有足够的身体上的空间给它,为了能显示幽灵(Gespensst)的同义词:死者的灵魂作为幽灵到处游荡。④因为在这个意义上它比同样重要的幽灵这个词(Gespensst)显示了更多的现实性、更有力和更强烈的东西。因此它表达了一种深深的迷茫,如果人们说:他看见了灵魂(Geister),如同他看到了幽灵(Gespensster)。⑤因为在心理学上它从来没有用来表示纯粹机械的东西,人们从来不说思想丰富的(geistreicher),而总是说构思巧妙的(sinnreicher)机械师;从来不说有思想的(geistreicher),总是说考虑周到的(sinnreicher)实验。同样,精神上的(spirituel)和工程上的(ingenieux)也是不同的。⑥因为它总是说明事物总的特征和本质,不是某部分的界定,因此从不用于通过单方面力量表现的东西,至少不是在人们表达这个的范围内。人们从不说一个有思想的(geistreiche)发明,而是说构思巧妙的(sinnreiche)发明,尽管这个发明真的是有思想的(在这个限制里显然有些专制的东西)。⑦因为思想丰富的(geistreich, geistvoll)总是用在深刻的纯智力的力量和活跃的感性的想象力共同出现的时候,正如前面提到的,人们总是说:思想丰富的形而上学者、数学家、逻辑学家。⑧最后因为思想

* Geist,可译为精神、思想,灵魂,呼吸、生命、气息等。——译者注

** Weingeist 酒精,也有灵魂之意。——译者注

(Geist)和字母相比显示了占主导地位的独特的真正本质。

所有的新语言都有相应的表达,它在所有的语言中都是一样的隐喻,只是没有哪种语言为了现在的使用给它合适的修改,在意大利语中“精神”(spirito)这个词的神秘性超过哲学性,在法语中来自蒸馏这个原始的概念有精致细化的意思,在英语中指加强型饮料的兴奋和烈性。

只有在德语中“力量”和“真正的本质”的这个概念保留下来了,原本所有的这些词汇都来自气息(Hauch)、风(Wind)这个概念,作为对非感性事物的比喻它也引申到蒸馏的方法(作为从少量的物质中提取),然后心理学上的意义也或多或少地用了第二个比喻,表现最明显的是在法语中。在德语中其完全保持了原来的意义,第二种比喻只在一些谚语中出现,如取走了事物的灵魂等(den Geist aus der Sache ziehen),原来的意义看起来非常强烈,这种强度更好地保留下来,因为词根本身是德语的(因为语调及特征和我们接近),相反这几个词spirito、esprit、spirit来自spiritus,而这个词又来自希腊语的πνευμα,古代人不把这两个词用于哲学的表述上。

这个表达非感性的使用在古代人那里是因为基督教才产生的并来自希伯来语(还可以进一步界定),古代人是不知道这个词(Geist)在新时代心理学上的使用的。他们不了解精神饮料的校正作用吗?或者为什么一直没用这个比喻呢?

相反,希腊语中ἀδεια这个词特别好,我们常用于要求表达的东西,因为它显示了完全的、真正的和特别的力量并且内外塑形都可以用,它比思想(Geist)这个词更好,因为它不像每个比喻那样被滥用并且它纯粹从自然中而不是从我们的意图中获得概念,因为它是用于观察的感官的而不是想象力的作品。当然它有些变化,因为更多的务实的力量失去了理想性。Virtus、vertu、virtue、virtu这几个词和我们(德语)中美德(Tugend)这个词本来具有同样的范畴,但在使用过程中没有保留这个范畴,因为只有希腊人在整体特征中保留了

这个概念。

希腊人不了解思想(Geist)这个词在心理学上的意义,美德在他们那里起作用,证明了他们更实用的和同样多的理想化的细微差别,在我们这里思想具有如此有力的又因此较少的心灵上的意义,另一方面,针对希腊语中 $\alpha\delta\epsilon\iota\eta$ 这个词,我们的语言有自己的词根,和其他语言相比,这是我们语言一个无法比拟的优点。

6 柏林科学院就职演说 (1809 年)

本文是洪堡在 1809 年 1 月 19 日作的演讲,刚好在他被任命为教育司司长之前。教育司司长也隶属科学院。根据施泰因男爵的建议,洪堡于 1808 年 8 月 4 日在从罗马回到德国之前就被选为科学院的名誉会员。

先生们,承蒙您的好意让我参加今天的聚会。对我来说,回到德国没有比被接纳参加您的聚会更令人开心的方式了。我正想向您的信任表达我诚挚的谢意,又有一种感情折磨我,我没有拥有这个光荣称号的权利,尤其辜负了您的好意。这种想法本身在我看来就是令人高兴和令人振奋的,尤其我环顾四周,看到那些熟悉的面孔,是命运之神让我很早就认识了他们,并和他们保持了多年的友谊,分享快乐和痛苦。因此当我被邀请与他们以及聚会中其他我现在才请求或将来赢得您相似看法的人一起工作的时候,在这种优越感中混合着一切情感:有对祖国同胞的亲近感,有对青年时代的回忆,有对亲密友好交往的享受之情以及令人兴奋和激动的情感。所有这一切在现在这个为了国家利益每种联系都自发地更牢固、更紧密地互相结合的时代加倍地鲜活起来。

正是在这个时代,高等学术研究对生活也日益重要。在目前这个时期:经过长期的不幸,安宁和古老的秩序恢复了,许多在岁月中沉淀下来的发挥过作用的东西被毁坏了,不仅要恢复它们,还要创建一些新的东西,有什么能比牢牢地坚持科学和艺术以及对圣地保持忠诚更令人舒适、更必要的呢?从科学和艺术这块圣地涌现出光明和温暖,直到国家最偏远的角落,科学和艺术包含着每种还因为现实受限的机构的指导性纲领,民族的尊严——最宝贵的财产——绝大部分建立在科学和艺术的基础上,很长时间在欧洲有教养和无党派的地区习惯享受我们的尊重(作为德国人和普鲁士人完全可以这么说)。协会,像这个今天您允许我加入的团体一样,就是作为这种机构设置的,它们首先研究学术最高级和最抽象的部分,协会美好的特权就是从最纯粹的源泉中创造真理。一方面,这些协会由只致力于这种工作的男人组成,另一方面,协会给那些被艰苦卓绝和单调的工作需要耗掉他们大部分精力和时间的人提供避难所,在这个避难所里这些人可以忘记现实有限的条件,可以完全不受打扰地献身于思考和研究。当学术看起来几乎忘记生活的时候,它常常就让生

活得到最令人愉悦的恩赐。因为学术滋养和塑造思想精神，思想精神所创造的一切都有学术自身的特征，是的，学术使思想如此出色、和谐和真正地非同寻常，因此每种从思想上发出的声音都纯粹而饱满，思想精神处理的一切仿佛在没有帮助的情况下紧紧接近最崇高的思想，思想精神也没有错过那个难以被发现的思想与现实发生碰撞且自愿互相融合时刻，因为生活中一切重要的活动中存在这样一个时刻，只有熟悉纯粹学术的人才能到达这个时刻，真正的实际的天赋是永远不能超越这个时刻的。

在您面前继续谈论这些想法是不公平的，我甚至不会提及它们，如果它们不是那么紧密地涉及由于您吸收我成为您中的一员引起的感受，我的目的就像是我的义务一样：感受这种温暖、鲜活，并完整地将它表达出来！

7 科尼斯堡学校计划 (1809 年)

本文是洪堡没署日期的草稿,原草稿题目为《论和科尼斯堡学校教育有关的拟进行的改革》,可能写于 1809 年 7 月底 8 月初,他 8 月 8 日给沃尔夫写道:“我的计划完成了,用了您关于市立中学和文法学校区别的文章。”出自这个计划中的组织方面的建议以短小的片段形式出现在 8 月 15 日的学校会议上。文献见:斯普林格的《威廉·冯·洪堡和教育改革》第 185 页。这里只印出第一部分,后面有关财政和学校章程的内容没收录。

学校应该有哪几种类型,每种应该有几所呢?

人们既可以看看米勒也可以看看霍夫曼的计划^①,他俩的计划里包含了很多合适的建议,计划认为:除了小学、文法学校*,还要有中学(Mittelschule)。

因此可以先讨论这个问题。

我反对。

中学(Mittelschule)要么是小学到文法学校(die gelehrte Schule)的过渡,这样文法学校就不再有所谓的市民阶层;要么作为特殊的学校为那些原本想放弃学术教育特别是不想上大学的人所设,或者两者的功能兼而有之。

用两种不同类型的学校让市民阶层从文法学校分离出来显然破坏了课程必要的统一性,这些课程从儿童上小学开始到中学课程结束,在教材的选择、教学方法以及对待学生的方式上必须保持连续统一,因此要从一个年级到下一个年级并且按照半年的计划来安排。按照这种分类方法,当他们完成了小学课程后而止步于高一级的文法学校时,中学绝对只能处理一部分课程,并且是至少有意往上任意截取的一部分。这是很自然的结果:一所学校本应完全和其他学校一样完成教学内容,现在只学一定的课程,那么这个学校总是看到自身之外的那部分^②,在规定的课程上也好不到哪里去。

从哲学的意义上看只有三种:小学课程、中学课程、大学课程。

小学课程应使儿童有能力获悉、表述、记录、理解别人的

^① 米勒(L. G. Möller): 1779—1846, 旧式中学的副校长; 霍夫曼(Joh. Gottfr. Hoffmann): 1765—1847, 大学教授, 教授国民经济学, 国务委员, 他们两人对科尼斯堡学校计划提出了意见。

* gelehrte Schule: 宗教改革后在新教地区出现的一种学校, 常常是一座城市或者君主建立的, 主要为上大学作准备, 课程包括教授古典语言如希腊语和拉丁文, 以人文科学和数学为主, 在文艺复兴—人文主义时期再次产生影响, 后来发展成现在的文法学校, 目前德国最有名的是马堡、卡塞尔等地的文法学校, 汉堡、基尔等地的文法学校还沿袭文法学校的名称。——译者注

^② 指必要的补充材料在其他学校。

想法以及克服那些在主要的科目中出现的名称方面的困难。它还不是课程,也不是为课程作准备,只是使课程成为可能。其实就只是跟语言、算术以及测量关系有关^①,而且用母语,因为所指的表述方式对课程来说是无所谓的。如果有理由还引入其他课程如地理、历史、自然等,就去做好了,一方面通过更多样化的使用更多地训练因为小学课程发展起来的属于学生自身必要的力量,一方面因为那些从学校出来直接进入职业生涯的学生的缘故必须得超越小学课程。

中学课程的目标是训练能力和获得知识,这两者是学术观点的学术方法的基础。能力的训练和知识的获得都应该通过中学课程来作准备,中学课程应使学生有能力一方面现在收集一切与独特的创造有关材料,一方面将来能根据自己的爱好收集材料并且形成智力方面自主的力量。他忙于两件事,一是学习本身,另外是学会学习^②。但中学课程的所有功能都是相对的,总是从属于更高级的课程,只是知识的收集、比较、整理、检验等。绝对的东西只在完全不能缺少、在主体上成为话题的时候被谈及。中学课程分为语言学、历史和数学,老师必须一直观察学生对这三科中的哪一门特别有兴趣,也特别注意不要让他们偏科,因为中学应该注意和大学保持紧密联系,以便大学能够更好地使学生对某一科进行研究。如果学生在其他人那里学了很多,以至于他能自学了,那么他就成熟了。比如他的语言课在中学就算完成了,当他能通过自己的努力和使用现存的辅助材料有把握地理解每个作家——只要这个作家是真的能让人理解的,以及根据获得的关于语言结构的普通知识轻松自如地对这门语言进行研究的时候。

如果小学课程需要教师,那么通过中学课程教师就不是

① 这里概念上已经借用裴斯泰洛奇的方法,洪堡在部门报告中对此进行了详细说明,见第14篇文章。

② 见施莱尔·马赫《关于大学的断想》第34页,是指大学的学会学习. Schleiermacher, Gelegentliche Gedanken über Universitäten S. 34.

必需的了,因此大学教师也不再是教师,大学生也不再是学习者,而是学生自己进行研究,教授引导学生的研究,支持学生即可。因为大学课程的任务是使学生有能力把握并创造学术的统一性,因而大学课程要求创造力,因为理解学术也是一种创造,尽管是从属性质的。所以大学课程是没有终点没有界限的,严格地讲,对大学生来说不能规定圆满结束的标志。那些中学课程掌握得很好的学生是否需要口头指导,需要多长时间以及以何种方式来进行,取决于学生自己。集体听课原本只是偶尔为之,最有必要的是,年轻人在中学毕业和进入社会之前的几年间在许多人,即教师和学习者聚集的地方只致力于学术的思考^①。

那像这样只有三种课程阶段,每种都是不可分割的整体中的一部分,也只能存在三种连续的教育机构,它们的范围也得和三种课程阶段的范围一致,不可以从中割裂开来。

分离的想法也可能由此而产生,人们在中学中设想一种特殊的学校,这种学校考虑教授和文法学校不一样的其他的知识,现在担心,文法学校因为这两者的联系变得很复杂,也是因为第二个想法,中学应为那些放弃更高级课程的人而设,我反对。

为了暂时说明一下,因为界定一个孩子常常花很长时间都还犹豫不决,这样的弊端就是容易出错:未来的学者长时间地待在中学里,未来的手工业者长时间地待在文法学校,这样会产生畸形教育。

我也否认这种可能性,以恰当的方式把他们交给本质不同的教育机构,很容易看出,因为他们的不足产生的漏洞完全可以通过其他的教育机构来弥补。

中学和文法学校的区别要么在于教材内容的选择上,要么在于教学方法上。此外,在这两方面要注意两类人,一类是必须放弃更高一级教育的穷人,另一类是不想上大学的

^① 这也是大学这个字原始的意义:学者聚集之地。

人,要用同样的原则来评价这两类人。

在教材内容的选择上放弃一些课目,通常放弃两门古典语言,或其中一门,选几门其他新的语言、工艺学和统计学等,另外把文法学校认为是副科的课程比如地理、历史和物理等作为主科来学习。

人们总是以此混淆中学课程要求的对思想智力的普遍训练和以后为实际生活做准备的必备知识的积累,因为与此相反它应是一条基本原则:

无论如何,在每种学校完美无缺地实施力量的训练,一切没有或者太片面促进力量的知识无论多么必要都应排除在中学课程之外,教授为实际生活作准备的课程是特殊专科学校的任务。^①

如果这些实用中学(越好越重要,越多)慢慢地教授文法学校讲授的科目,很多学生想学拉丁文,有些想学希腊文,只是别学太多,人们学习希腊文和拉丁文就像法文和英文一样似乎是因为要用它们才简单地学习,在一定程度上掌握了很多语言但没有真正理解任何一种。因为这肯定是一种误解,人们忽略一些小问题(比如希腊文的发音),未来的批评家最初是与众不同地学习希腊文,无论是普通人还是未来的批评家都应该真正地理解,而不是猜测语言,尤其要直观感受特定的语言。他们的发展道路会有所不同,不过是在稍晚些时候。

同样的在教学方法上也不能考虑太大的区别。中学和文法学校上课时间的长短最能说明这一点。在基础知识的学习上不能做什么,不要缩减,因为相对于学生要训练的以及对学生进行训练的力量而言,人们给每门课程都规定了需要掌握的知识的数量;不能太仓促,因为成长要求自然的过程。唯一可能发生的事又是抢在生活之前:人们可能在中学里机械地教授文法学校里有目的的授课内容比如化学、算术

^① 见第14篇《文化教育部报告》。

公式等。这绝对就偏离了中学课程的范围,是把用于教育的特定的时间滥用来训练动物,还会对人的智力造成伤害。所有这种和文法学校背道而驰的中学是真正的普通中学和特殊专科中学的结合,在我看来从中总是会产出怪胎的。

因为引入中学的缘故,为了防止这些弊端,有几点是在文法学校里首先要关注的:

1. 至少在每个大点的城市有一所或几所优秀的小学,这样即使很多市民只能上这个小学而没上其他学校也没什么坏处。如果人们思考一下,小学课程像它现在这样什么都包括:对概念进行清晰而明确的界定;为高等数学打下基础;激发孩子对艺术的两种主要类型雕塑和音乐的想象力。所有这一切以强烈刺激感受的方式来传授,那人们肯定就更喜欢目前在我们一些著名的高级文理中学中进行的这种教育。

2. 质量上对文法学校低段或市民阶层的照顾要跟对高段的照顾一样多,但要把原来的小学课程和他们相分离,如果他们在一定程度上也教授一些小学课程,那么原本的小学(Elemantarschule)从不好的字面意思^①来看不久就要被看作公立学校(Volksschule)了,这对他们的改善非常不利。如果这些组织得好的低年级衔接好的小学,那么课程就能为了很多生活的目的顺利地在学校得到通过。

3. 文法学校不只是拉丁文的学校,历史、数学课也和语文学一样要认真细致地上。现在在缺少这些课的地方产生了弊端:那些对语言课不太有感觉的人,必须过早地离开学校或者无谓地在学校浪费时间。

4. 语言课真的应是语言课,不是像现在常做的那样用古代知识和历史知识来装饰并作为以练习为主来理解古典作家的一种指南,因为语言的知识作为使头脑清晰、训练记忆力和想象力的东西总是无限有用的,相反文学的知识需要一定的完整性和其他有利的环境。

^① 那时候使用的语言,指低贱人的学校,是穷人学校。

5. 分班不是绝对的,而是根据知识的主要分支来进行,老师允许并促进学生按他的本性发展,他对哪些科目感兴趣,而对另外的哪些科目不太积极,只要他不完全偏科就好。不可否认在语言学习、数学和实践经验上存在着智力上的差异。想发展学生某方面的能力就像把学生分派到不同的教育机构,并使他们的能力得到更多的发展一样美妙。只是在没把这种能力固定地和一种科目结合起来时不可以允许第二种情况发生,因为这会慢慢破坏学生头脑中可能的真正的学术。

6. 有许多专科学校,不乏与市民生活重要行业有关的学校。人们在市立中学*工艺学方面教授的知识能很好地和现在很多手工业者学习的艺术学校结合起来,此外像在柏林,学生可以学习技术和化学方面的课程,因为很多人游学和旅游,因此如果这些人只在君主政体的某些地方出现也不会有什么损失。农业、商业、税务学校等都有了。同样的也有不是培养学术性医生的学校。

这样我就看不到非要用中学来进行补救的缺点了,最穷的人把孩子送到便宜或免费的小学,家境稍好一点的进好点或稍贵一点点的学校,谁经济上还能花费更多,就进文法学校,待到高年级或早点退出上更多的语言课或更多的一般的实用课程。这些中学课程之后接着就是大学、特殊专科学校或进入社会工作。每个人,即使最穷的人几乎都接受完整的人的教育,只在还能继续教育的时候接受有所限制的教育,每种智力上的特点都找到自己的权利和位置,没有人需要在他找寻自己发展轨迹的过程中过早地确定他的命运,大部分人,即使他们离开学校,最终都经历了从单纯的课堂进入专业机构学习的过渡。

* die Bürgerschule:18 世纪产生的旧式五年制中学的称呼,教授普通的课程外特别注重对学生进行商业方面的培训,1910 年在普鲁士由中学(Mittelschule)代替;在奥地利 1869—1927 年是义务教育的高段时期,为期三年,1927 年由五年制的中学代替。——译者注

还有几点关于古典语言学习的看法:原则上说,一种语言的形式作为一种形式要清晰可见,这在一种没有生命力的因为奇特感让人惊讶的语言上比鲜活的母语更好。我可以肯定拉丁文和希腊文是一定可以互相支持的。^①

所有的学生毫无例外都必须在低段学习这两种语言,问题只是是两者一起学还是只学一门,学哪一门先开始,这样如果他以后有兴趣就不会遗漏最基础的语言知识也不会反感完全陌生的知识。

低段的学习结束之后虽然取决于在父母或监护人同意下放弃一门语言,但有必要继续学习另一种语言,他在语言学习方面也可以得到奖项和表扬,即使他没把这两者的学习联系起来,也从来没取得什么进步。

在希伯来文的学习上就必须给予更多的自由,同样要更多地促进这种语言的学习,不仅是因为神学家的缘故,还因为希伯来文的语法和词汇结构一眼看上去跟希腊语差别太大而和野蛮民族的语言结构非常相近,因此尤其从这不为人知的方面来看它扩充了语言形式的概念。

根据这一般的讨论,我允许这里^②有小学或市立中学和文法学校存在。因为市立中学必然有不同的质量,一些市立中学受到限制,另一些非常好、非常完备,那么这些好的完备的市立中学就能在一定程度上被看作是与中学不一样的学校。

必须要增加文法学校的数量,因为所有读过中学的孩子要加入文法学校。

对纯粹的市立中学要有限制,但也要有小学必备的完整性。

文法学校不能收没掌握小学基础知识和没满9岁的孩

① 参见第14篇《夏洛琳和洪堡的通信》第三卷第259页(Briefwechsel Wilhelm u. Karoline v. Humboldt III, 259),以及施普林格《教育改革》第167页(Spranger: Reform d. Bildungsw. S. 167)。

② 这里指科尼斯堡。

子,它有5个年级,市立中学有2个年级。

文法学校每个年级有6个教师、2个助理老师,市立中学每个年级一个老师。

市立中学的课程包括:使学生能够阅读、写作、学会数字和测量,作口语练习,掌握有关人、人的性别、土地和社会学方面最必要和最根本的概念,还有音乐和绘画方面的知识。此外,只要市立中学能提供学习材料,学生的智力用这些学习材料在规定的范围内能得到训练,就开设地理、历史和自然史。

宗教课就少上点,多用激励感情的方式来进行。

两种组织得非常完备的市立中学继续教授这些知识,特别是算术和测量,就像其他小学做的那样,根据理解力的提高增加一些所谓的实用性知识。在进一步的组织上可以考虑用策勒建立孤儿院的方法^①,可以规定组织和这个教育机构应该是什么样的关系。

^① K. A. Zeller. 策勒,1774—1840年,教育家,由普鲁士政府任命到科尼斯堡建立一座孤儿院,同时也作为在普鲁士引入裴斯泰洛奇教学方法的教师培训场所。参见昂斯特·弗希特的《策勒》,斯图加特,1928。Ernst Feucht: K. A. Zeller, Stuttgart 1928.

8 立陶宛学校计划 (1809 年)

本文是洪堡 1809 年 9 月 27 日在立陶宛古门宾伦巡查时写的意见,标题为《对立陶宛公立教育机构有关计划的肤浅之见》。手稿在文化教育部的办公室。参见斯普林格《威廉·冯·洪堡和教育改革》第 193 页。

如果我略过细节,直接谈及计划的主要内容^①,那么它就和迄今为止(文化教育)部门的基本原则相距甚远。在不同地区的实施过程中这种分歧大部分又会消失,但和对此进行思考的同仁讨论原则问题是有必要和令人愉快的,思想精神取决于这些原则,在思想精神上也以同样的方式起作用,这个思想精神显然因为它内在的力量使外在活动看来是一个且是同一个的东西绝对有差别。

分歧在于对市立中学的理解,在计划中市立中学被认为是特殊的学校类型,是根据他们的概念和目的划分出来的,即使它们不是作为这种学校出现,对学者而言也是被看作课程学习的一个特殊阶段。

真正实施起来又产生这样的结果:市立中学和文法学校只在卢克^②是分开的,其他地方这两种学校都是联系非常紧密的。

关于准许市立中学或实科中学分离出来的问题看起来是比较难以进行详细阐述的,产生了两种不同的体系,人们最近在巴伐利亚竭力促进实科中学,以至于人们差点成立实科大学。^③

不仅是一个阶层,而且是整个民族或国家都关心的所有学校都只能以普通的人的教育为目的,生活或者个别职业需求的东西得在完成普通课程之后单独获取。如果将这两者混淆,教育将不纯粹,人既成不了完整的人也成不了分属各

① 洪堡给出的意见表达了对市立学校计划的态度,这个计划是由古门宾伦的校长克莱门为政府设计的,参见斯普林格的《教育改革》第194页。

② 卢克、蒂尔斯特和古门宾伦,三个行政区市,有文法学校,这些学校因为洪堡的努力在1812年被承认为高级文科中学。

③ 指的是自1799年巴伐利亚在实科中学方面所作的努力以及规定的标准,根据这些指标计划成立一所和大学相似的“实科或者物理技术学院”,参见F.茨魏格的《现实的历史——巴伐利亚实科教学机构的历史》,《德国教育》第53卷,柏林,1914(F. Zwerger: Geschichte der realist. Lehranstalten in Bayern, Monum. Germ. Paed. Bd. 53),以及H.吕温的《巴伐利亚的教育斗争发展》,《德国教育》第2卷,柏林,1917(H. Loewe: Die Entwicklung des Schulkampfs in Bayern, Monum. Germ. Paed. II, Berlin 1917)。

社会阶层的完整的公民。

因为两种教育——普通的和特殊的——应由不同的原则来引导。普通的教育应该增强、纯净和调配力量,也就是提升人本身,通过特殊的教育人应该获得应用的技能。对普通教育而言,每种知识、每种技能是毫无生命力、毫无成效的,如果这些知识和技能不是因为对严格列举的原因的彻底了解,不是因为被提炼成普遍有效的观点(像数学和美学)从而提升思考力和想象力,不是通过思考力和想象力来提升性情的话。对特殊教育而言,人们必须经常局限于原因上的不可理解的结果,因为技能必须在那儿,缺乏去理解的时间和天赋,比如非学术的外科医生和很多企业主。可以这样考虑普通教育的主要目的:给少数行业保留未被理解的从不反馈到人身上的技能。

学校组织因此不管社会等级和个别行业,也不只关心文法学校——先前时代的错误,那个时候其他的课程都让位于语言课,语言课(在质不在量)也是为了外在的需要(获得表述和写作的技能)而不是为了真正的教育(了解语言和古代文化)。

普通的学校课程首先关注人和人的本质的主要功能,也就是体操的、美学的、教学法方面的课程,教学法方面来说又是数学和哲学课程,哲学的课程只有通过语言的形式才是纯粹的,否则永远是历史哲学和历史的^①。

因此整体的课程也了解一个或同一个基础,因为原本同时要从性情上培养最普通的临时工和最文明的受教育者,如果要临时工在人的尊严上不那么粗鲁,文明的受教育者在人的力量上不那么多愁善感、乖戾和乖张的话。

更确切地说,在逐步发展的教育中方法应该有所不同,因为可以通过课程或近或远地预见教育的目标,这里我觉得差别也没那么重要,如果人们坚持在每个阶段根据性情的普

^① 参见第2篇《论古代文化特别是古希腊文化的研究》。

通教育的可能性来规定课程内容的数量和特点,并总以他最多最好对性情产生影响的方式来处理每种内容,那必然产生相应的一致。用这种方式学习了希腊文可能对木工不是完全没用的,正如学者学习做桌子一样。然而教材的选择允许有小小的差别,因为每种形式只能放到材料中去练习,在结果中也要考虑这点。明显的对比反差总能避免,永远不要出现这种情况:一个手工业者学了希腊语,但没学一点拉丁文。

在课程没有到达终点的地方——大学,作为原有教学的解放(因为大学教师只客观地指导学生自己的学习),课程的范围只能由对所有课程都必要的条件、力量和时间来决定,只要学生致力于这个,对另外一个有方法,只要老师能引导他,只要政府操心让他到一定的岗位上去工作。

在教育事业的组织上学校当局的义务就是避免学生走上一条对他没用的道路,如果学生以后不从事有关的工作的话。如果一个学生在四、五或者六、七年级待着的话,遗憾的是在我们的学校几乎总是这种情况。如果人们(就像在非常好的学校已经出现的那样)在课程上不注重生活的需求,而是纯粹关注他自身、注重知识作为知识、注重性情的培养以及在背景上注重学术,这种情况就永远不会发生。因为每个方面都用性情和学术(学术是从各方面都完整考虑到的客体)来和过去及未来的一切保持联系。不存在起点和终点,一切同时是手段和目的,也就是每个进步都有好处,即使坚强的决心动摇了。

如果这些原则是正确的,人们把这些原则运用到各种类型的学校里(特殊专科学校总是单独分开的),那么最根本也是最重要的原则就是课程在自然阶段上的统一性和连续性。因为在课程不了解自然的分段时,学校的分段会破坏课程的连续性,造成学校对课程处理和课程精髓理解的差别,甚至也会使老师不确定和迷茫,他们应到达哪个被任意接受的时候。

作为自然的分段我能承认:小学课程、中学课程、大学

课程。

小学课程只包含根据各种类型形成的观点的名称和它们最初的分类,但可以在没有害处的情况下用跟这个形式匹配的材料或多或少地教授自然和地理方面的知识,小学课程使学生跟随老师学习认识事物。

中学课程引导学生学习数学、语言和历史到一个特定的阶段,在这个阶段还将他和老师以及原本的课程束缚在一起是没用的,中学课程使学生渐渐地脱离老师,但教给他老师能教的一切知识。

大学的任务就是让人通过自己并在自己身上能发现的东西即对纯粹学术的认识。最原始的理解对这个自我认识来说自由是必需的,寂寞是有益的,从这两者之中产生出大学整个外在的组织机构。集体听课只是副业,重要的是,人在一个性情相同、年龄相仿的亲密集体中,在一个有一些出色的只致力于提高和传播学术的学者的地方,有意识地为自己和学术生活几年。

如果人们纵览从最初级的学校到离开大学这段历程,就会发现,从智力方面看,学校当局的最高原则就是(人们很少说出来):创造出最深邃和最纯粹的学术的观点,以此使整个民族在尽可能保持所有个体差异的基础上走上这条道路,这条道路一直向前,到达学术和那个根据天赋和外在环境的不同能对学术及学术的结果进行千差万别的预测、领会、检验以及训练的时候,那么个人因为被纯粹的共同气氛感染的热情也会得到帮助。

不是所有的地方都能在一个学校完成这样的中学课程,因为当这些困难只是偶然的时候,我的看法是,每种其他的除了上面提到的区别都可以作为偶然来处理。

下面是给学校当局的实用原则:在能有文法学校的地方(就是那些完成中学课程的学校),就不必有单独的市立中学而要有小学。

相反,在这种情况下不可能的地方,可以和必须有市立中

学,但这些市立中学只是从它们中分离出来的文法学校的低级阶段。

就像是每种实践方法的义务一样,要注意,统一的原则不是让现实的令人舒适的多样性消失,因此在第一种情况下小学可以得到扩充,以至于他们可以让学生比计划中一个年級的市立中学走得更远。他们只是不深入文法学校的拉丁文课程,否则他们就破坏了课程的统一性。他们也得在历史课程上有一定的限制,在数学上老师和学生的天赋以及时间上可以设限,数学是独立的一门功课,在数学上可以更轻易获得学术的概念,因此可以更普遍地存在。

在第二种情况下,所谓的市立中学出于同样的调整^①就得在数学上比文法学校的低年級教得更多,也教更多的历史知识。

我进一步审视这个计划^②,发现下面和这里提出的原则相抵触的主要矛盾:

1. 提出来能忍耐的原则是市立中学和文法学校组合成一个机构,但本来它们应该分开,令人担忧的是这个原则,城市负责市立中学,乡下负责文法学校,这样根据这个计划甚至产生两个监管机构,在这种情况下我看拥有好的文法学校是绝对不可能的。因为若令团体也跟城市有关,也不能再对市立中学的质量尤其对适合文法学校的预备学校负责,因此在我看来这样更好:

(1) 要么把国家的资金交给有文法学校的城市,但要和城市的基金放在一起做用这笔钱能做的事情。

(2) 要么从文法学校的低年級开始就用国家的钱,使以此负担变轻松的城市以同样的比例负担他们的小学,而其他城市同时负担小学和市立中学。不公平是世界的本质,一些比其他的更好还是可以忍受的。

① 就是适应的原则。

② 见第82页注释①。

2. 在我看来分级是远远不够的,只有一个年级的市立中学很难比每所小学的成就更多,对一所同时也可以作为预备学校的市立中学来说两个年级太少了。如果其他陌生学校一、二年级的学生进入文法学校,尽管文法学校努力也可能出不了什么成绩并且他们自己也只有三个年级,人们不久得重新分配组合。

如果老师想按部就班地上课,在小学的时候老师至少有时得上些课,非常完备和好的小学可以有两个年级,即使规定只有一个。

所谓的市立中学(最好叫城市学校)得有两个或者尽可能地有三个年级,要严格地不收那些没完成小学课程的学生,否则还得有一个三或四年级。

文法学校(这里最好叫乡下学校,并入计划中的市立中学)可以有五个年级。

3. 在计划中似乎还有一种倾向,在市立中学中远离未来学术的机会而考虑眼前的生活。比如为什么说数学是根据维尔特,而不是欧克里德斯、诺棱茨或其他严格的数学家来授课呢^①? 每种即使接受不全面的教育的头脑都能接受数学的严谨,大部分人都是这样的,如果人们要在缺乏特殊专科学校的情况下应急从而在普通课程里加入更多的实用性的课程,那么人们可以为反对终极目标做特别的事情了。人们只能让纯粹的知识进入,甚至在算术上我都不喜欢常用杜卡特*等。不能接受高级教育的人越深入生活,人们就越细致地把他固定在少数的他有能力理解的形式上,正是这种情况,因为严格的义务概念对道德产生主要影响,义务概念在人们根本不了解其他纯粹概念的时候只作为约束出现,因为放弃感官的材料对宗教具有重大的影响。^②

^① Joh. Friedr. Lorenz, 约翰·弗里德里希·诺棱茨,是马格德堡的校长,欧克里德斯(Euklid)的一些数学教材,维尔特(Wirth)不出名。

* 14—19世纪欧洲金币。——译者注

^② 相应的阐释见斯普林格的《教育改革》第197页。

在我看来,能大概全面回忆一下是好的,因为前后想想这不适合放到代表团的会议上去讨论。顺便说一下,排除有争议的这些方面——在这些方面(文化教育)部门也可能弄错,即使我也许没有超出他们的意见,整个计划里有优秀的思想精神,很多细节和部门的制度完全吻合,其他一些比如老师还上大量的课这类小细节,可以口头上再探讨。

9 论柏林高等学术机构的内 外组织 (1810 年)

本文前半部分参考了陈洪捷在《德国古典大学观及其对中国的影响》附录中的第一部分译文。

本专题报告是洪堡未完成的构想,显然出自 1810 年,可能是为重组普鲁士科学院而写的。科学院的档案馆出版,文献见斯普林格的《教育改革》第 199 和 208 页。

高等学术机构作为学术生涯的顶峰,是民族道德文化汇集之地,它的概念以此为基础:高等学术机构准备从广度和深度上研究学术,要给精神和道德上的教育提供不是刻意但自然合理的材料。

它的本质在于:内部把客观的学术和主观的教育,外部把完整的中学课程和自我指导下刚开始的研究进行整合,或者说是对从中学到研究的这个过程产生影响。只是关键是学术。因为只要学术存在,即使会出现一些偏差,也会自然完整地理解它。

因为高等学术机构只有在每个人尽可能地拥有纯粹学术概念的时候才能达到目标,所以在这些机构中寂寞和自由为主导原则,又因为人类思想精神的作用是共同整体性的发展,并不是为了让一个代替另一个缺乏的东西,而是为了让一个人的活动激发其他人的活动并且让所有的人都明白普遍的原始的在个别人身上零星出现的力量,因此高等学术机构的内在组织要创造并维护这个连续的、自身不断活跃的但毫无拘束的并非刻意的共同作用。

此外,高等学术机构还有一个特点:它始终把学术当作一个还未完全解决的问题,因此也始终处于研究状态中,因为中学只学习一部分特定的知识。在高等学术机构中,教师和学生的关系也绝对与以前不同,教师不是为学生而存在,两者都是为了学术而存在,教师的工作和学生的现状密切相关,没有学生教师也不能从其他方面进展顺利。如果学生不是主动地聚集到教师身边,教师就要去找学生,为了接近他的目标,他把成熟的,但也因此有点片面及不太活跃的力量和更弱一点的、大胆地致力于各方面研究的无偏见的力量进行整合。

因此称之为高等学术机构的要摆脱政府的一切形式,只能把人的精神生活,外在的悠闲和内在的追求导向学术和研究。可以是一个人独自思考收集资料,可以和同辈人进行交流,可以使年轻人聚集在自己周围。如果政府要以一种更牢

固的形式维护这种不确定的但在一定程度上偶然产生的作用,必须保证这个局面,政府必须认识到:

(1)一直保持学术活动最生机勃勃和最强劲的活力。

(2)不让它降格,保持高等学术机构和中学(不仅是普遍理论意义上的,还有众多的实际的特殊的学校)的绝对分离。

政府还得意识到:他本来是不影响也不能影响这类活动的,相反一旦他介入的话还总是带来弊端,没有他学术自身会按它本来的样子发展越来越好,本来也应该这样:因为在一个积极的社会中针对每种广泛的影响必定有外在的形式和手段,因此政府有义务也为学术的研究提供外在的形式和手段。

不只是政府提供这些形式和手段的方式可能损坏事情本质,还有对完全陌生的东西存在外在的形式和手段这种情况本身也必然产生不好的作用,并把思想和高度降低到物质和更低级的现实层面;因此首先又得关注内在的本质,为了做好政府自己破坏或阻碍了的事情——即使没有他的责任。

如果这只是针对同一种处理方式不同的观点,这样看来,因为政府干涉得越少,因为在实际作用中理论上不正确的观点不会不受惩罚,因为在政府中没有作用是纯粹机械的,那么在结果中就会显现出优势。

把这点先说出来,人们就很容易发现,在高等学术机构内在组织的问题上一切都以保持这个原则为基础:就是把学术看作还未完全发现的也永远不会完全被发现的事物,并一直把它作为未完成的发现来研究。

一旦人们停止研究原本的学术或者想象,学术不需要从思想精神的深处创造出来,而是可以通过广泛的收集把资料排列起来就可以,那么一切都是不可挽回并永远失去了,如果学术要长久地进行,损失对学术来说就是逃避,以至于使语言像一个空壳;对政府来说也是损失,因为只有来自内心又能植入内心的学术改造性格,对政府来说也和对人一样更

注重于性格和行为,而不是知识和言语。

为了永远防止走入歧途,人们需要保持思想精神三个层面活跃和生机勃勃的追求:首先是一切都来自最初的原则(通过这个原则解释自然比如从力学到动力学,有机的到精神层面上的一步步提高),然后是一切都归入一个理想,最后是原则和理想结合成一种理念。

但这不能完全被促进,也没人想到,这在德国人中需要被促进。德国人善于思考的民族性格自然具有这种倾向,人们只需要注意不要压抑这种倾向,无论是用暴力或因为自然出现的对抗作用。

因为要排除高等学术机构的片面性,因此自然可能有很多人在这些机构工作,但他们对学术上的追求感到陌生,一些人还反感,全身心地致力于学术研究的是少数人,为了广泛和长远的影响,只需要不多的时候这里或那里真正地出现,但起主导作用的一定是在那些感受到它的人身上的对学术追求的尊重,在那些想破坏它的人身上表现为畏缩不前。

这种追求在哲学和艺术中表现得最充分、最特别,不只是它们自身容易蜕化,因此不能对它们抱太大的希望,如果它们的思想精神不是它们该有的类别,或者只是以逻辑或数学的形式逐渐成为认识和研究科目类型的其他分支。

如果最后这个原则在高等学术机构中占主导地位:把学术当作这个去追求,就不需要再为其他个别的负责。既不缺乏统一性也不缺乏完整性,一个自动研究另外一个,两个互为补充,产生良好的交互作用,这是好的学术方法的秘密。

那么对内来说每种要求都得到满足了。

有关外在和政府的关系以及政府的工作,政府就只需要通过选择研究人员来操心精神力量的富足(强度和多样性)以及从效果上关心他们的自由。自由不仅受到来自政府的威胁,还来自机构本身,机构像它们开始时那样喜欢采用一种特定的思想精神扼杀别的想法,政府必须防止可能出现的这些弊端。

关键的问题在于筛选到这些岗位工作的人,在这些人身上只有在把整个机构分成各个不同的部分时才能规定防止力量缺陷的调整措施。

据此最多取决于少量的简单的,但比通常干预得多的组织原则,反之在个别部分又能谈到这些原则。

最后必然考虑辅助手段,对此只能作一般的说明,不是把收集那些没有生命力的材料当作主要的事情,而是不能忘记,物质材料的堆积还使思想僵化和退化,因此(物质上)最富裕的科学院和大学不总是完全拥有最深刻和最有思想的学术研究的地方,在政府工作意图中能从总体上谈到高等学术机构,对学校来说是高等机构,对实际生活来说是学术机构。

政府不得把大学当作高级中学或特殊专科学校,不得把科学院当作技术或学术团体来用^①,总的来说(因为下面还要谈到在大学中出现的例外),政府不能要求大学和科学院给他任何直接涉及他的东西,而是要坚信,如果要实现终极目标,要从更高的角度来实现政府的目标,从一个更多的和所有其他的力量联合起来并显现出来的方面来实现,像他能推动的那样。

另一方面,政府的义务首先是对他的学校进行安排,以此让学校为所属的高等学术机构工作。这首先建立在对它们之间关系了解的基础上而且要坚信:中学没有资格预先上大学的课程,大学也不是同类中学的补充的或只是中学高年级中的一个班级而已,要了解,从中学到大学的过渡是青年生活中的一个阶段,在这个过渡阶段,中学要培养学生在德智体方面能成功地自由独立而不受束缚地发展,不要游手好闲或者堕入实际生活,而是带着内心的渴望去追求在远处熠熠闪烁的学术。

他们到达学术的道路是简单而可靠的,要在学生身上寻

^① 也就是说作为公共生活问题的专业和鉴定委员会。

求一切能力的和谐发展,对他的力量用尽可能少的对象但尽可能全方位地进行训练,一切知识都用来培养性情,以至于理解、知识以及思想精神上的创造不是通过外在环境,而是通过内心的精确、和谐和美丽散发魅力。为此或为了达到纯粹学术头脑的预练首先需要数学而且从最初的思考力的训练开始。

这样经过训练的性情就自然理解学术了,因为同样的勤奋和同样的天赋在其他的准备工作中要么是短暂的,要么在受完整的教育之前就葬身于实际生活也因此对生活毫无用处,要么没有更高的学术追求,就用一些零散的知识来消遣罢了。

论高等学术机构的分类原因及它们的不同类型

通常情况下,人们认为高等学术机构就是大学、艺术院和科学院,这个偶然产生的机构像从理念产生出来的一样不难找到其根源,一方面是自从康德时期就出现的受欢迎的词,有那么一点不准确,一方面是因为它们本身无益。

相反,重要的是这个问题:是否真的值得花力气再去建立或保留大学之外的科学院?为了使大学和科学院各自都以它们自己可能的方式工作,应给它们每个单独或两个机构共同指派哪些任务?

如果人们让大学上课和传播学术,规定科学院扩充学术,那么显然对大学就不公平了。在德国,学术肯定同样地并且更多地是通过大学教师而不是通过科学院院士来进行扩充,这些院士正是通过大学教师的职务在专业上取得进步,因为在听众面前作的自由的口头报告,在这些听众中总有一定数量的能共同思考的人,肯定会激励那些习惯这种研究方式的人,就像作家那种闲散的生活或者学术团体松散的联系。学术在大学里显然发展得更快速、更具活力,因为在大学里学术吸收了大量头脑聪明、年富力强的年轻学者。特

别是学术作为学术真的不容易讲出来,如果研究者每次都不是自己主动消化理解了的话,学术也难以被理解,如果人们不在大学甚至不是经常有新的发现的话。此外,大学教学并不是什么特别困难的工作,以至于大学教学可以成为研究中的闲暇小憩而不是作为研究的辅助手段。在每所大的大学里也总有些人书读得不多或根本不读书,他们只寂寞地为自己学习和研究,因此如果大学归类得当的话,人们肯定可以在扩充学术方面相信大学而为了这个终极目标放弃科学院。

在大学教师看来,社会团体也不是很有必要及有规律的存在,它们也难以成为建立如此昂贵的机构的理由。因为一方面这个协会组织对科学院来说也是很松散的,另一方面它首先服务于观察实验性的学科,这些学科中快速实验的结果对一些事实有用,最后在这些学科中没有任何困难也对政府没有帮助就产生了私人团体。

如果人们更仔细地研究一下这个事情,就会发现科学院首先是在外国繁荣昌盛,在外国现在还缺少德国大学的善行,人们几乎不承认,在德国欠缺大学的地方,在没有自由、思想精神难以百家齐鸣的时代(科学院还作出了一定的贡献),可在新时代没有哪个科学院(在发展学术方面)表现特别突出,科学院对德国科学和艺术的发展做得很少或根本没作什么贡献。

为了使两者(大学和科学院)都保持生命力,将两者结合起来是必要的,尽管它们的工作是各自保持独立的,就是让个别的成员不再只是属于大学或者科学院,在这种结合中两者可以独立存在又能以新的恰当的方式被使用。

但这种结合的益处不是得益于大学和科学院的工作的特殊性,而是因为他们独特的形式以及他们和政府的关系。(因为事实上无须成立一个特殊的科学院,可以通过大学教师来完成科学院完成的任务,首先因为大学教师又能够像在哥廷根一样形成一个独特的学者团体,这与原本的科学院非常不同)。

大学和实际生活以及政府的需求关系更密切,因为大学承担国家实际生活的活动以及青年人的指导工作,科学院纯粹只与学术本身有关。大学教师之间在与学科内外程序有关方面保持着联系,有关他们原本的工作倘使他们找到了自己的兴趣所在才互相告知,以此他们每个人都找到自己的方向和道路;相反科学院是一个团体,真正是为了让每个人的工作都经受所有人的评判而设定的。

用这种方式科学院必然作为最高级的最后的学术的自由场所和最独立于政府的团体存在,人们得敢冒这个险:这样一个团体是否因为很少或者片面的工作表明,正确的不总是最容易在最有利的外在条件下得到实现或者不实现。我说,人们得冒这个险,因为这个想法本身美而令人舒适,它以恰当的方式被实现的那个时刻总能到来。

从现在开始大学和科学院之间就形成竞争和对抗的局面,但他们也相互合作,如果一个机构里的工作太多,而另外那个机构里的工作太少,他们也会采取措施使自身的工作达到平衡。

首先这种对立表现在两个机构的人员选拔上,每个院士都有权利在没取得大学授课资格(Habilitation)的时候开讲座,而不必以此成为大学的成员,一些学者有权同时成为大学教师和院士,但两者也必须拥有其他只属于一个机构的成员。

大学教师的任命必须交给政府,允许系部对此影响过多不是一个好的安排,让一个理智而公平的董事会自身来做比较好^①,因为在大学里对立和摩擦是有益和必要的,在教师中间因为工作本身产生的冲突也可以无意识地促进他们观点的更新,大学的状况也和政府的直接利益结合得非常紧密。

科学院成员的选拔应该让他们自己决定,但要得到国王的首肯,这是不大容易的,因为科学院是一个团体,在这个团

① 这里实施了反对洪堡设想的系部建议权。

体里统一的原则是绝对重要的,因此科学院所主张的纯粹的学术目的就和政府没什么直接关系了。

由此在选拔高等学术机构成员时就出现了上面提到的调整措施,因为政府和科学院差不多都占同样的份额,因此很快两者工作的思想风格也显示出来了,在人员选拔上,公众的意见马上公正地评判这两者可能出错的地方,但因为不容易让两者同时至少不以同样的方式出错,因此不是所有的选拔同时受到危险,整个机构都避免了片面性。

其实在这些机构工作的力量要具有丰富的多样性,因为还有私人讲师进入由政府任命的人员和科学院自己选拔的人员这两个层面的范围,这些讲师至少刚开始时能获得听众的掌声。

除他们的研究工作外,还有一个特别的工作就是科学院要进行系统的观察和实验。这些工作的一部分是让他们自己去做的,一部分是委托他们做的,大学又可以对委托的这部分工作施加影响,这样它们之间又产生了新的交互作用。

除了科学院和大学,属于高等学术机构的还有些无生命力的机构。

这些机构必须要和上述两者加以区分,直接处于政府的监督之下。科学院和大学在一定的范围内不仅可以使用它们,还要监督它们。

但科学院和大学只能把它们建议和改善意见提交给政府,而不能直接给这些机构——科学院和大学用这种方式对这些机构产生影响。

科学院通过大学在这些机构那里获得了和它没有关联但它可以使用的东西,比如人体解剖学和动物解剖学等,因为人们是从有限的医学角度而不是从更广泛的自然科学的角度来看这些学科的。

科学院、大学和辅助机构就是整个机构中三个互相独立但又相互关联的部分。

三者都在政府的领导和监督之下,只是大学和辅助机构

多一些,科学院少一些。

科学院和大学是同样独立的,倘使有交集的话,就是它们拥有共同的成员,大学允许所有院士拥有开讲座的权利,科学院从事那些由大学提出的一系列观察和实验的研究。

科学院和大学都可以使用和监督辅助机构,但在监督这方面要做什么的时候要间接通过政府。

来自科学院^①……

^① 这里手稿中断了。

10

论一个民族科学和艺术繁荣的条件（特别针对德国和当前的时代）（1814年）

本文是洪堡在准备维也纳会议初始阶段时写成的片段，由莱茨曼标注为1814年的8、9月，这里提到的费希特的逝世是1814年1月27日。

在不到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德国经历了三个科学的繁荣时期,几个最著名的人物克罗普斯托克、赫尔德、维兰德、歌德见证了这些时代并在他们的作品中打上了一部分时代的烙印。最早在莱辛和克罗普斯托克引领的时代,德国的独特之处才开始和对外国的模仿相分离(因为更早的时候完全是光芒四射的),哲学显出少有的洞察力,追求清楚明晰的概念,寻找一种有时与之不太相称的优美,但还不具备追求一切思想宗旨的本来的特点。在第二个人们可以列出康德、歌德和席勒的时期,在经历了完全降格几乎变成大众哲学之后,从他们老师的错误中产生出真正的哲学流派,这个哲学流派到处传播思想精神和生命(活力)并开创了独一无二的思维活跃发展的时代,文艺创作达到了巅峰,特别是在内容和形式的关系上找到了出色的方法,人们将来可以断言,以后再也没出现过这么纯粹和和谐的关系了。古代文化研究方面的成果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人们可以大胆地说,没有哪个民族像德国人这样深入了解希腊人和罗马人。最后一个时期,列举领袖人物这事可以交给结果去判定,似乎想在天才的深度和广度上都超过前面的两个阶段,但哲学随着费希特死亡了,在其他人身上也销声匿迹了。总的来说,哲学蹒跚着到了一定的高度和深度,人们有理由表示怀疑,它是否还有维持的理由。在文艺创作上充斥着对外国和对非古典远古时代的模仿,人们首先看重的是描述的华丽和繁琐,也不忌讳用人为了技巧来表现艺术。此外,语言和对东方的理解也不是没有重大影响的。^①

在人们带着怀疑的好奇自问的时期,这个新的变化将把德国思想精神导向何方,到那时较少自由的、对自由毫不关心在意的德国感受到外界的压力,如果人们称之为毫不妥协的话,人们将过多地关注这个压力。写作及思考的自由被压制,语言一方面被跟风,一方面被外国的追随者抛弃。因为

^① 指的是浪漫主义的文艺创作和东方研究。

普遍的衰退,科学的发展和每种手工业劳动的分支停滞了,每种不是完全不高贵的性情也因为令人讨厌的现象从思想精神降格为现实生活,这些现象表现为不公平的原因、不理智的目标、令人反感的手段在起支配作用。在这种状况下科学和艺术即使说得再多,听起来也只像在拨动琴弦,即使人们在有力地弹奏。谁喜欢过我们文学的最后一个阶段,谁就哀叹它的没落^①,谁没对此作贡献,可以自我安慰:非正常死亡是在它自然死亡之前发生的。

现在由民族通过自己的力量赢得的战争赶走了外国的统治者,自己的人又可以用自己的意志来进行统治了。在那个努力让正在熄灭的火焰重新燃烧起来的时代,还比现在少地忽略对每种科学追求的保护。民族精神获得更充分的发展,行动给予语言更多的力量,对很多牺牲的忧伤使感情更内敛,长期的匮乏应唤醒又回到科学和艺术寂寞的渴望,对科学和艺术来说又开始了新的希望。但人们还是有理由怀疑,未来是否不辜负科学和艺术。如果对世界大事的主动参与消耗了人的性情,只有慢慢地艰难地回归到思想和知识宁静的轨道上来。最近发生的最伟大的最富有诗意的事件剥夺了想象的自由,这种想象更愿意关注遥远和过去的事件。在危机中建立了新的政府机构,如果政府不想要这些机构,它们就将自动从公民的个人性情中产生,这些机构为了国家比以前更多地对个体提出要求,某些一点一点的和有害物质相似的东西在民族中、时代中甚至语言中发展起来的障碍通过政治上的变化是不能被消除的,最后人们甚至需要审阅上面提到过的对德国文学发展过程的简单描述,为了感觉,把新的进步和发展过程连接起来是绝对不容易的。

这样的时候在我看来是适合进行这篇文章题目所提到的研究的。研究几乎针对所有的时代并以多种方式进行。我的目的不是用以前那种方法:单独分析科学和艺术繁荣的

^① 也指浪漫主义文艺创作。

社会状况以及能促进它们繁荣的方法。我更致力于使研究简单化,一方面找到那个时刻——所有千差万别的科学和艺术的追求可以融合并从中产生出那种叫作真正和纯粹的东西;另一方面找到那个时刻——所有千差万别的状况展示出同样独特的性格特征,在这样的环境中一个民族处于特定的时代和使用特定的语言,这两个时刻的结合自然给出结论并自动运用到各种情况里,我也没有特指我们现在的状况,因为我来自这个时代。不可避免地会把德国和现在的时代当作这样的对象来研究,顺便提及我的目的只是从理论上进行阐述,此外我想作为个体能对整个民族最美的花朵和最高贵的果实——科学和艺术的繁荣——贡献一点力量。

在科学和艺术的繁盛与真正的科学精神和真正的艺术理解之间存在着巨大然而未受到足够重视的差别,前者是昙花一现,归因于偶然和外在的原因,后者只能来自内在有力或者优秀的天性;前者对天才来说常常是陌生的,后者身上天才表现出明显的中等水平;前者最多给将来的研究准备一些材料,后者因为自身的存在散发出光芒、温暖和力量。区分这两个常常被互相混淆的事物,探索这种从它的微动中科学的死板的字眼就能感受到生命的思想精神,是目前研究的首要工作之一。

科学的领域是无法估量的,因此在最千差万别的领域里可以用最千差万别的方式来进行研究。没有一个研究是无益的,相反如果这些研究不混入错误的假设不因此阻碍弄明白其他方面的内容,使从不熟悉到熟悉、从特殊到普遍、从现象到原因的过程变得复杂的话,每种研究都对整体研究添砖加瓦。真正科学的精神因此不只是以一定高度或者正好包揽一切的观点为依据。它是真理的精神同时非常尊重简单的直觉和联想、崇高的原始想法和纯粹的基本力量,它从整体性上包含三者,但它对这三者来说又不是陌生的。

这里说明了要研究的东西。真正的科学得由对基本力量的感觉来深入研究和唤醒并让现象的总和与之连接,这种

力量的本质就像在镜子里一样反映在原始想法中。到达这个深度的方法和到达这个高度的跳跃不需要那么引人注目,也不用经历整个范围,但这些道路必须保持通畅,要有在这些路上继续追求的意识,错误的狂妄自大的对无意义事物的占有必须让位于朴素的对真正科学的追求。

这些概念需要继续发展,使它们清晰一点的方法是在那些与它们相对立的概念上稍作停留,与它们相抵触的是片面的对经验和对概念只有逻辑说明的喜好。因为这两者,真正的哲学被排挤,而在一个民族中没有对哲学的追求就没有完美的科学的繁荣,也不会有长久的纯粹的真正的繁荣。

无论如何,不应该责备在他们自己的领域里澄清和发展经验所作的努力。一切经验科学,历史和生物学可以不被打扰地在这条道路上继续前进,即使它们以这种形式不构成原本的学术,但一直对学术建设有贡献。要受责备的是超越经验的范畴来割裂每种进步或者使经验在另外一个范畴进入的地方,比如在思想和道德的人身上起作用,在这种观点控制了一个民族的时候,人们就得在很多其他的最出色的教育上放弃科学的深度和纯粹度,一切都以运用到生活中去为目的。因为人的感受和行为方式也属于生活和经验,即便来源不纯正,本能上也能正确和真正地理解这种方式,因此从这方面来看又找到一个重要的补偿。

在哲学探讨没有上升到基本本质的深度时,这样一种补偿极少出现哲学探讨没怎么扩展到经验的领域,而是停留在概念纯粹的逻辑发展上。这个狭窄的范围转瞬即逝,零零星星地以这种方式出现,没有任何根基,也不会导致任何新的发现。在这种过程中富裕的毫无价值的假象隐藏着无益的匮乏,这种对每个真实的对象,尤其对使它显得生意盎然的语言不公平的哲学类型能从形式上给予其他学科最充分的帮助。它干预生活较少,甚至不赋予感觉完整的权利。

因为数学独特的令人惊讶的本性可以毫无损失地支持这两个不完美的观点,数学热衷运用到经验上去,没有变得

不纯洁的危险,它将每个概念分解到最后的组成部分,但自己还没意识到,它的本质存在于完全不同于概念转变成其他东西的东西之中,这些错误的观点对数学产生不太有害的影响,因此数学本身也不太重视纯洁,自然来自数学的对真正哲学的追求就被窒息了,它还可能在可靠和清晰的自负中助长不宽容。

希腊人对数学的看法有所不同,当他们把数学看作是对哲学绝对必要的预习的时候,数学纯净的火焰应该点燃哲学的火花,他们年轻的无私的易于接受思考形式内在和谐的感官以及闲散的、很少把认知运用于实际的生活喜欢教学概念惊人的和谐,就像喜欢真实的和谐并把它看作更伟大、更美妙的和谐的表现,这种和谐束缚着宇宙并支配着人的命运。

一切都围绕着和谐,在思想因为思想的缘故心醉神迷时,真正的科学的感觉引导思维回到它的根源。在思维被用于不驻留于它自身的目的时科学可能存在,但科学的精神不太具有活力。如果人们追溯简单的本质,各种现象中科学的需求就是从有形的事物中辨析出无形的东西,此外其他都是不可想象的了,对于科学来说至少也有不存在,这是科学真正的本质,最能通过下面这点反映出来:从这个观点出发,把内在关联带入科学并能持续不断地从内部进行扩充,科学也适合人的需求,对人来说它又不是最终目标,但却是朝着最终和最高级目标前进中的一个阶段。

正是这些基本观点受到驳斥,不仅是来自个人的,还来自整个和令人尊敬的民族,科学局限于对事实的收集和审阅,近似于实际运用。推测思辩是危险、空洞、乏味的,被排斥或者最多局限于训练头脑和赋予更真实、更必要的学科恰当的形式。一段时间以来德国人和外国人之间从来没完全平息过的争论就在于此。这也是我们自己内部分歧的根源。推测思辩因此常常拥有这份权利。每种学科都可以通过推测思辩获得必要的特征,只有借助于这点才能出现一种包含一切学科的科学。

科学的对象和研究领域的界限不仅能通过它们研究的可想象的材料,也通过让科学行动起来的思想活动来衡量,思想活动毫无疑问是更正确的。理解力能让现象从一切思想中剥离,让纯粹的客体和纯粹的主体对立,因此无法回避的问题就是:他们俩中的哪一个独立于另一个而存在,意识中的主体如何又是他自己的客体?是否不必有这样一个永远成不了客体的主体?形而上学是被称为思辨的科学?如果能把这种致力于回答这些问题的思想状态称之为迷茫的话,那么无能的头脑中的一个组织就像身体的某个特征一样不自然,永远无法狂热起来。但这个特点属于健康的头脑,以至于他一旦摆脱了感官的躁动、纷乱的工作和徒劳无益的知识的负担,就回归到他的对象就像回到家乡一样。渴望认识现象也引导到这个方面,因为应该把特别的现象作为原因引出更普遍的现象,这样一切有限的缺乏被迫成为它独特的解释理由,并主动超越它的界限。

11 论历史学家的任务 (1827 年)

本文是洪堡于 1821 年 4 月 12 日在科学院作的口头报告，发表于 1822 年，文献见斯普林格的《洪堡的演讲：论历史学家的任务和谢林的哲学》（历史杂志第 100 卷，1908；约翰西姆·瓦赫：《理解》第 1 卷，图宾根，1926 等。）（*E. Spranger: W. v. Humboldts Rede, über die Aufgabe des Geschichtschreibers und die Schellingsche Philosophie, Histor. Zeitschr. Bd. 100. 1908; Joachim Wach: Das Verstehen Bd. I, Tübingen 1926.*）

历史学家的任务就是描述发生过的事件。他对历史事件的描述越纯粹完整,他的工作就越完美。简单的描述是对他的工作最根本、最不可避免的要求,也是他能够完成的最高的要求。从这方面来看,历史学家对历史事件似乎只是解释和复述,因而他的工作不具备主动性和创造性。

在感官世界里只有一部分历史事件是可见的,其余的得靠历史学家去感觉、推论和推测。显现出来的那部分内容是支离破碎的,把这些碎片连接起来的、让个别现象显示出本来面目的、赋予整体形象的内容都隐藏在直接的对历史事件的观察之后。直接的观察只能感知伴随的和连续发生的外界状况,不能感知内在真相所依据的内在的因果关系。如果人们试图述说最不重要的事实,但要严格地说出真正发生了什么,人们马上就注意到,历史学家不用万分小心地选择和衡量表达方式,他的描述就掺杂着超出历史范围的小小的规定,从中就产生了谬误和不确定。甚至语言也对此产生了作用,因为语言常缺乏自由的,不受制于一切偏概念的表达,而语言是从个人性情整个丰富的心灵中产生的,因此完全真的描述比较少,这种描述是健康的、善于规划的、纯粹的特殊的头脑以及自由的客观的个人性情的证明。因此,历史的真相在某种程度上犹如在远方看着成形的云彩。历史事实在个别有关联的状况下不比流传下来的和人们取得一致的研究结果真实多少,因为它们大部分可能和自身,也最好地和整个关系相符合。

由于和真实的历史事件之间有着时空上的距离,研究者就难以获得有关此历史事件的全貌,也因为这种时空上的分离,人们获得的只是此历史事件必要的基础知识和一些相关的材料,而不是历史事件本身。换句话说,就是本来的、内在的、建立在因果关系上的真相让位于外在的、完全的、表面上的东西,为了逃脱更不确定的错误而选择一个确定的错误。一切历史事件的真相以添加上面提到的事实的不可见部分

为依据,这部分内容得由历史学家进行补充,从这个方面来看,他的工作是主动,甚至是创造性的,虽然他不是创作不存在的东西,但他用自己的力量构思他不能通过纯粹的敏感感知的东西^①,就像它是真的一样。像作家一样,历史学家必须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把收集到的支离破碎的东西加工创作成一个整体。

历史学家和作家的工作领域在某一方面出现交织,这可能值得怀疑。毋庸置疑,两者产生的影响是相似的,因为如果历史学家,如前所述,只有通过补充和结合直接观察到的不完整和支离破碎的材料用描写的方式来找寻事件的真相,他就只能像作家一样运用他的想象力才能做到。因为他让想象力隶属于经验和现实的探索,其中就存在着区别,这种区别会消除刚才说的那种危险。在这种从属关系中不再是作为想象力发生作用,而是正确的预测和黏合能力,但这赋予历史太低级的观点,历史事件的真相看起来可能简单,但却是能想到的最高级的东西。因为如果完全获得了历史的真相,在这个真相中就存在着制约一切真实的、必要的链条一样的东西。历史学家必须追求必要的东西,不是像作家一样在必要形式的支配下给出材料,但在思想精神中要坚定不移地保留规律的理念,因为他心里有这些规律,他就能在对现实纯粹研究的过程中用他的真实性来找到这些相关规律的痕迹。

历史学家抓住了人世间创作的一切线索和超自然理念的所有特征。或近或远地存在的大量历史事件是他研究的对象,他必须了解跟随思想精神的所有流派。推想、经验和虚构不是思想精神分离、互相对立和受限制的活动,而是思想活动的不同方面。

要接近历史的真相,必须同时使用两种方法:对历史事

^① 指亲身体验事件的发生。——译者注

件准确、无偏见及批评地进行研究；对研究的内容进行组合，对用第一种方法没有做到的那部分内容进行预测。谁只采用第一种方法，谁就会错过了了解真相的本质；谁忽略第一种只采用第二种，就会出现歪曲某些现象的危险，最简单的自然的描写也不是用列举和说明某些事件，对边角料进行估量。描述从整体上看要有一种活泼的气息，要散发出内在的特点，这种气息和特点是没法估量、没法描述的。只被限制用第二种方法，这个方法是自然人普遍和独特存在形式的想法。在历史上用第二种方法不是去找到一些细节，更应该少添加诗意的东西。思想应该通过拥有历史事件的形式来更好地理解真正可被研究的材料，学会在其中辨析更多的内容，而不是纯粹地理解行动。一切都取决于研究力量和被研究对象之间的同化作用。历史学家通过天才和研究学习越深入了解人类和人类的影响，或者他因为自然和环境被调教得越人性化，他使他的人性越纯洁地起作用，他就越能完美地完成他的工作任务，这一点是编年史作者证明了的。在许多被歪曲了的事实和一些明显的童话中没人能否定它们中好的东西的历史真相的原因，在它们身上有着所谓的记忆中更古老的东西，尽管记忆中涉及个人的东西对普遍涉及人类的东西有伤害，这是历史在某些细节研究上要求的。

此外，历史正如每种学术活动一样，服务于许多从属的目的，它的研究和哲学以及文艺创作一样，是一种自由的自我完善的艺术。一部分因为地球的特征、人的天性、民族和个体的性格，一部分凭空而来或如通过一个奇迹种植的、依赖于模糊感觉的力量，清晰地由永远的、深深扎根于人的内心的理念控制，发生杂乱无章的事件是无限的东西，思想一直没能力把它变成一种形式，但这个无限的东西又不断地刺激思想，让思想尝试研究它，它又赋予思想优势，让思想部分地完善它。正如哲学追求事物最根本的原因、艺术追求美的理想一样，历史追求人类命运的画卷：它用真实、丰富和确定

的材料以及专注于对象的个人性情来完成。因此个人的观点、感觉和要求就消失并融化在这种追求里了。创造和接近这种气氛是历史学家追求的终极目标,只有当他忠实地简单描述历史时才能达到他的终极目标。

历史学家的任务就是要唤醒并激活对现实的感觉,他的工作因为这个概念的发展是主观的,正如因为描述的概念是客观的一样。每种对整个人发生作用的思想上的追求都拥有一些人们可称之为要素、作用的力量,对思想产生影响的秘密的东西以及和纳入他们范围的完全不同的东西,因此他们常常用新的和变化了的方式把这些带到个人面前。在数学上这就是孤立的数字和线条,在形而上学上就是对一切经验进行抽象化,在艺术上就是对自然进行美妙的加工,一切似乎都来自自然,但没有什么东西以同样的方式在自然身上找得到。历史活动的环境就是现实的感觉,在这种感觉中时代中的存在是转瞬即逝的感觉,还有对过去和伴随原因的依赖感,相反内在的思想上的自由意识和理性的认识,现实不考虑表面上的偶然性是通过内在的必要性被束缚的。如果人们在思想上经历人类生活,就被这些各种各样推动和束缚历史的因素所感动,历史学家为了完成他的工作任务就得收集历史事件,以至于这些事件以相似的方式像现实本身一样触动个人性情。

从这方面来看历史跟生活很像。历史不仅通过个别例子服务于要遵守和要预防的东西,这些东西常误入歧途,很少具有教导作用。历史真正的不可估量的好处是,更多地通过依赖于事件的形式,不是通过他自己使对现实处理的感觉活跃和纯净,防止它超越纯粹理念的范围,通过理念来管理他,在这条狭窄的道路上考虑到个人性情,没有其他成功进入历史事件的东西,只有用明亮的目光在每种起支配作用的理念流派上辨析真实的东西并坚定地与之结合。

历史一定要创造这种内在的作用,历史是否讲述有因果

关系的事件的组织或细节的东西,大概就是历史的研究对象。配得上这个称呼的历史学家,得把每个事件作为整体的一部分,或者整体本身,用历史的形式描写出来。

这就导致更准确的对历史学家提出的描述的要求的理解。历史事件的组织在于表面上的混乱,只从编年体或地理位置上进行了分类,历史学家得区分必然和偶然,发现内在的关联,使真正起主导作用的力量清晰可见,为了赋予他的描述一种形象,建立在这种形象上的不是想象的或者多余的哲学的价值或者诗意的魅力,而是它们最根本和最本质的要求,它们的真实和忠实。因为当人们只停留于表面现象时,认识事件只是一知半解或者歪曲理解。普通的研究者就在里面混合了错误和谬误,这些只有通过真相来予以消除,而只有天生出色的因为研究和训练而拥有犀利眼光的历史学家才能揭开这个真相。为了成为出色的历史学家,他得如何开始开展工作呢?

历史的描写像艺术一样是对自然的模仿,两者的基础都是辨认出本来面目,找出必要的东西,并将它们从偶然中分离出来。因此这不允许我们,把比较轻易认识的艺术家的方法运用到经受更多怀疑的历史学家的身上来。

对有机形象的模仿可以用两种方法:对外部轮廓的直接模仿,正如眼睛和手能做到的;或者从内部开始通过研究外部轮廓如何产生于概念和整体形式的方式,通过抽象概括它们的比例关系,通过一种工作认识形象完全不同于非艺术的眼光对它们的感知;然后从想象力中产生一种新的东西,因此除了完全和自然一致,还要具备更高级的真相。因为艺术作品的一大优势在于:把在现实中模糊不清的、形象的内在真相展示出来。上面提到的两种方法在一切时代和一切类型中都是错误和真正艺术的范畴。根据时代和(地理)位置有两种相距甚远的民族,他们都为我们显示了文明的初始阶段:埃及人和墨西哥人,在他们身上这种差别相当明显。人

们展示了两个民族之间众多的相似之处,两者都克服了一切艺术上可怕的阻碍,把图画用于文字,在墨西哥人的图画中还没有出现(人的)形象的正确观念时,在埃及人身上在最不重要的象形文字上就具有这种风格了^①,这很自然。在墨西哥人的图画中几乎没有猜测内在形式的痕迹,或者有机结构的知识,一切都是对外在形象的模仿,但尝试遵循不完美艺术的外在轮廓肯定很失败甚至导致歪曲变形,相反对比例和匀称的追求会因为手和工具的无能为力脱颖而出。

如果人们想从内部理解(人的)形象的轮廓,就得首先回到形式,回到有机体的本质上去,就是回到数学和生物学上去。数学赋予概念,生物学赋予形象的理念。得有一个第三者连接的东西,心灵的、思想的表达添加到这两者中去。纯粹的形式,正如在部分对称和比例平衡中表现出来的一样,是最重要,也是最早的,因为还鲜活年轻的思想不大受要求准备工作的经验而更多地受纯粹科学的吸引^②。这在埃及人和希腊人的雕塑作品中体现得最明显。所有的作品表现出来的首先是纯粹和严格的不怕坚硬的形式、圆或半圆的规则、角的精确、线条的明确,其他外在的轮廓以这些为基础。在还缺乏对有机构成更准确认知的时候,这已经非常清晰地存在了。当艺术家成为大师,当他能赋予流畅的优美,注入非凡的表达,他从来没有想到,通过它去刺激,如果他不关心的话,这种必要性对他来说也是最根本和最高级的。

如果对纯粹形式的激动人心的爱在寂寞的想象力中没有面对生活的多姿多彩和美好,那么一切多姿多彩和美好的生活无法帮助艺术家。因此不难理解艺术是如何在一个民族中产生的:这个民族的生活也许不是最令人感动和最优雅

^① 参见洪堡的注释:亚历山大·洪堡带回来的墨西哥人的画作,存放在黑森博物馆,是显示他们高超技艺的证据,说明他们在发展的早期阶段某些地区就拥有了较高的教育水平。

^② 纯粹的科学——哲学、数学、比例学,是和经验科学相对的,洪堡的经验科学也指历史。

的,很难以美而闻名,但它的感官很早就用到数学和力学上了,它在巨大的、非常简单但严格有规律的建筑上找到美感,它把建筑上的比例关系也用于模仿人的形体,每个线条的部分使它无法使用坚硬的材料。希腊人的状况是不同的:令人激动的美,动荡不安的,有时甚至是毫无规律的生活,丰富多彩的神话包围着希腊。他的凿子轻易赋予可塑性强的大理石、最早时候的木头一个形象。他在艺术感方面的深度和严肃性越发令人佩服,如果不管所有表面上优美的诱惑,他通过对有机结构更彻底的认识还提升了埃及人在这方面的严格性。

不只是让多彩的生活,而且也让乏味的数学直觉成为艺术的基础也许显得特别。但这也同样真实,艺术家不需要天才鼓舞人心的力量,如果他不把深刻的严肃的严格起作用的理念转化成自由游戏的现象的话。在数学真理的直觉中,在时空永恒的关系中存在着吸引人的魔力,它们可以表现为声音、数字和线条。对它们的研究通过自行圆满解决的任务在发现新的比例关系中提供了新的满足。在我们身上因为过早过多地使用而削弱了纯粹科学形式美的感觉。

艺术家的模仿来自于理念,真实的形象在艺术家看来要借助于这些理念,因为在两种情况下自然是被模仿的,同样的情况也适用于历史研究,问题只在于:是否以及有哪些理念能引导历史学家?

这里需要谨慎才能继续前行,上面提及的理念不会伤害历史纯粹的忠实。因为即使艺术家和历史学家两者都是描述和模仿,他们的目的也是不一样的。艺术家只是去掉现实的表面现象,为了摆脱所有的现实而提及它;历史学家研究它,必须要深入进去。正因为如此,历史学家不能满足于个别松散的外在的因果关系,而是要到达核心部分,从这个核心部分出发去理解真正的关系,因此他寻找事件的真相要用相似的方式,像艺术家找寻真正的形象一样。历史事件不像感性世界中的现象那样明显,以至于人们能解读这些现象。

对历史的理解是特征和研究者带来的感官的共同产物,犹如在艺术中一样,在历史中不是所有的东西都能通过纯粹的一个从另一个理解过程逻辑地推断并分解成概念的。人们掌握正确的、高尚的和隐蔽的东西,因为思想就是为了正确掌握它。如果历史学家把事件的个别情况像它们表面上显示出来的那样依次罗列出来,不严格解释事件之间内在的关系,那么他就像画家创作讽刺画一样。为了能获得作用的力量直觉,辨析在特定时刻选取的方向,研究两者和同时发生的情况以及先前发生的变化之间的联系,他必须熟悉特征、作用和这些力量相互之间的依存关系,就像完整洞悉特殊情况需要普遍的知识一样,这样历史才能被理解。从这个意义上说理解历史事件必须由理念来引导。

不言而喻,理念来自丰富的历史事件本身,或者确切地说,通过真正的历史意义上的对事件的研究在思想精神上产生,不是像一个陌生的附属物品强加给历史,这是所谓的哲学性的历史很容易犯的错。尤其历史的忠实受哲学的危险比诗意的研究多得多,因为诗意的创作至少习惯给材料自由,哲学规定了历史事件的目标,找寻最终原因,人们可能想从人和自然的本质中推导出最终原因,破坏和歪曲了力量特殊作用的一切自由的观点。目的论的历史因此也从来没有找到世界命运活跃的真相,因为个体得在短暂的存在期限中找到他的高峰,因此根本不能把事件的最终目标植入还有生命力的活动,而在失去活力的活动中和对理想整体的概念理解中寻找这个终极目标。无论这个目标在地球和人口普遍的扩张中,在民族越来越发达的文化中,在一切紧密联系中,在最终达到资产阶级完美状况中,还是这种方式的任何一种理念中。^①个人的活动和幸福虽然直接取决于这些,但每代人感受到的,像以前所有人获得的那样,不是证明,甚至不总是教育性质的对力量的练习材料。如果精神不让它重新

^① 黑格尔的观点自称为哲学的历史研究,这里显然也指伏尔泰、莱辛和康德的观点。

活跃起来的话,因为思想精神和个人气质的果实是科学、艺术和道德的活动,精神就会失去而成为了物质的东西,所有这些活动都拥有思想的自然天性,而思想只有通过被思考才能存在。

历史学家必须转向作用和创造的力量。他待在特殊的领域里。为了确定一种真正的历史事件之间的内在联系能显现出来的形式,以便在研究世界史纷繁复杂的事件中打上自己的烙印,历史学家能做的就是可以将形式从历史事件中分离出来。在更进一步的观察中,存在的矛盾似乎消失了。对每个事物的理解作为可能的条件在认知事物上以与后来真正的类似的理解为前提,就是以前的、原始的主客体之间的和谐一致。理解绝不是主体纯粹的发挥,但也不是纯粹地攫取客体,而是两者同时进行。因为在早先存在的普遍的应用中理解一定坚持新的特殊的东西。在两种本质因为鸿沟分离的时候,不存在从一个到另外一个理解的桥梁,为了互相理解,人们肯定用另外一种感官来互相理解,在历史上这种先前的理解基础非常清楚,因为一切在世界史上发挥作用的东西也在人的内心深处活动。因此一个民族的性情越深入感受一切人性的东西,这个民族越更细腻、更全面和更纯粹地被人所了解,这个民族也就越具有这个优势:拥有真正意义上的历史学家。检验性的练习还要加入这个准备工作,这种练习在对象身上尝试先前感受到的东西并进行微调,直到通过这个重复的相互作用同时产生确定性和明晰性。

历史学家用这种方式通过对世界历史创造性力量的研究设计出一切历史事件内在关系形式的普遍的概念,在这个范围中存在着前面提到的理念。这些理念不是带到历史中去的,而是构成历史的本质,因为每种失去生命力和具有生命力的力量根据自然法则起作用,一切发生的事情根据时空处于不可分割的联系中。

在这种联系中出现了历史,但历史无论多么丰富,多么生灵活现地出现在我们面前,也如遵循死的、不可更改的法

则,通过机械力发动的表。因为一个事件产生另外的事件,原因使每种作用的范围和特点都不同,甚至人的看起来自由的意志也在环境中找到了他的使命,这种使命早在他出生前,在他所属民族形成前,就不可更改地设计好了。能从每种个别的因素中估计出过去的一系列事情甚至看到将来,显得不可能,原因不是在自身,而是因为缺乏相应的数量众多的有关前后关联的知识。很早就认识到,只遵循这种方法可能远离对真正创造性力量的理解,在每种作用中恰好估计不到主要的因素,在这种作用中生机勃勃的东西是在游戏中,表面上的机械的规定原来是遵从自由作用的冲动。

除了通过其他的对事件机械的规定外,得更多地关注力量的特殊本质,第一步是生理学上的作用,一切生机勃勃的力量,无论人或植物、民族或个体、人类或个别宗族,甚至思想精神的产物,就像他们以某种特定的连续性继续作用为依据,像文学、艺术、习俗以及市民社会的外在形式具有共同的特点、发展和规律,这样一步一步地到达高潮,然后慢慢地出现低潮,经历某种程度的完美到最后的蜕化等。不可否认的是这里面有很多的历史情况,但清晰地辨析出的也不是创造性原则本身,而是一种形式,创造性原则在这种形式身上没有找到令人振奋和鼓舞人心的载体的时候,得屈服于这种形式。

较少考虑的有多样化的接二连三出现的人的能力、感受、爱好和热情这些心理力量^①,在这个过程中不仅屈服于明显的法则,还从一定的相似性上去理解。作为行动的动力和从这种动力中产生出事件的最直接的原因首先困扰历史学家并最常用来解释历史事件。但这种观点正好要求最谨慎。这种观点是最不具备世界历史的观点的,它把世界史上的悲剧贬低成日常生活的常态,轻易地把个别事件从整体关联中割裂开来,并且让个人动机的小小的驱动占据世界命运的位

① 普遍指的是思想精神、心灵的力量。

置。一切都用来自他们的方法放置到个体身上去,就难以从统一性、深刻性以及特有的本质上去认识个体。因为这不能被分解、被分析,并根据经验来判断,来自于许多人也应该适用于很多人。他独特的力量经历一切人的感受和热情,但让一切都打上他的烙印和性格特征。

人们可以尝试一下,用这里提到的三个观点对历史学家进行分类,但他们中真正天才的特征不是通过所有组合来详尽阐述的。因为这些观点自身也不能详尽说明事件内在关联的原因,基本观点不在这个范围内,从这个观点出发真正理解真相才是可能的。它们包含无生命力的、有生命力的和思想自然的现象,这些现象以一定的规律反复出现而一目了然,但不包括原始力量自由独立的冲动。现象也对有规律的、根据认识到的法则或者确定的经验一再出现的发展作出解释,像奇迹一样产生,可以伴随着力学、生理学和心理学的解释,但不能真正地从这些解释里推论出来,局限在这个范围内不仅不能被解释,也没法被认识。

人们总想如何开始,只能从自身之外的某方面领会现象的范畴,深思熟虑的退出是没有危险的如同错误肯定隐蔽其中。世界史没有这个世界统治是无法理解的。

坚持这个观点的好处在于,通过来自自然范畴的解释认为,历史事件的理解不是完成了的,顺便说一下对历史学家来说,他方法中最后的、最困难的和最重要的部分就变得轻松了。因为他没有直接研究世界统治计划的感觉,每种对此的尝试都可能让他像寻找最终原因一样走上歧途。处于自然发展之外的对历史事件的领导在他们自己身上显露,通过依赖于这些并在他们身上像非身体的本质辨识出来的方法,即使不是现象对象本身,人们永远感知不了这种本质,如果人们不从现象的范畴中走出来,不在思想上转到他们找到来源的东西上去。与他们的研究有关的是解决历史学家任务最后的条件。

历史上创造性力量的数量不是用直接进入历史事件的

力量来详尽阐述的,即使历史学家研究透了一切细节和他们有关的关联:地球的形态和变化、气候的变化、民族的智力和气质、更有特色的个体、艺术和科学的影响、市民活动深入和广泛的影响,那还遗留着更具有影响力的,不是直接清晰可见的但赋予那些力量倡议和方向的原则,就是理念,由于他们的本性这些理念置于有限的范围之外,但在各方面都管理统治着世界史。

这些理念显示,没法通过纯粹的和自然法则一致的作用解释某些现象,只是感谢存在的气息,不用怀疑,同样的没有那种时候,历史学家为了认识历史事件的真相注意到他们之外的领域。

理念表现为两种方式:一种是倾向,它最初不引人注目,但慢慢地清晰可见,最后令人折服,在不同的地方和不同的状况中理解很多;还有作为力量的作品,这个作品在范围和伟大崇高方面是不能从伴随的状况中推导出来的。

在第一种倾向上不难找到事例,几乎在任何一个时代都不会看错,但很显然必须得用这种方法来关注很多人们现在用更多的物质和机械方法解释的事件。

用周围环境状况来解释力量的作品和现象的例子是不够的。力量的作品、现象的例子是前面提到的埃及人身上纯粹形式的技巧的凸显,也许更多的是希腊互相对立又保持在自己范围内的个体的自由的突然的发挥,用哪种语言、诗歌和艺术突然完美地存在,对此人们徒劳地追寻渐变的方法。因为希腊教育值得尊敬和最多包含了解他们密码的东西在我看来,因为一切他们领会的伟大的东西又由分成各阶层的民族留给了希腊人,使他们远离束缚,保持自由,但又包含了相似的情况,比较松散的学校和自由的团体弱化了严格的观念;通过多次对原始民族进行分类,就像在一个民族身上发生过的一样,分成族类、部族和单个城市,又通过不断的联系,让千差万别的个体最活跃地共同发挥作用。希腊因此树立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民族个体的理念,正如一切存在

的秘密都在个体身上一样,人类一切世界历史的进步都建立在自由的程度和个体独特的相互作用上。

虽然理念只能在自然联系中出现,但在现象中一些促进的因素和从不完美到完美的转变能得到证明,而且我们的知识也有理由能填补巨大的漏洞。但美妙的事情在于把握最初的方向,把握最初的灵光乍现。没有这最初的火花,那些外在促进的环境状况就发挥不了作用,训练和渐进的前行即使经过几个世纪也达不到目的。理念只能信任思想精神上个体的力量,但理念置于这种力量身上的种子以自己的方式发展,这种方式保留着,在这种子转到其他个体的时候,来自于这个种子的植物通过它自己开花、成熟结果,然后枯萎消失,就像环境状况和个体互相依靠生存发展一样。这说明,这是理念独立的天性,这种天性在现象中完善过程。在千差万别各种类型的存在和思想作品中形象用这种方式变成了现实,无限的一面反映在这些形象中,它们介入生活又创造了新的现象。

因为在思想精神的研究中一直有稳妥的方法去追寻相似性,在身体的世界里人们不大能期望新的形象的产生,千差万别的组织找到了它们固定的形式,尽管它们在这个范围内从不限于有机的个体,因此这些细微差别不是直接的而且在它们对思想形成的影响中几乎不可见。身体世界的创造是突然的暂时的,是在思想精神创造之前,或者身体的创造至少更早些找到他们的休息点,在这个点上身体创造因为单调的延续方式消失了。比作为形象和身体结构更接近思想精神的是有机的生命,两者的法则也更早地应用到对方身上。这在力量健康的情况下比较少见,即便在这种状况下比例关系和发展倾向非常可能发生变化,这些变化跟随隐蔽的原因阶段性地改变着有机的生命。但在生活不正常的状况下,在病态的时候毫无疑问出现相似的倾向,这些倾向是无法解释的,它们突然或渐进地产生,看起来遵循特有的法则并指出事物之间隐藏着内在关系。很多研究工作证实这

点,即使可能晚些时候才将这些结果用于历史研究。

每个人类的个体是扎根于现象的理念,一些人身上这个理念如此突出,以至于这个理念为了显示出来好像只接受个体的形式。如果人们研究人的影响,在排除一切限定这个作用的原因之后,就剩下原始本能的东西,这个本能的东西,不是被那些作用窒息,而更多的是改造这些作用,永不停止地赋予内在独特天性外在的存在,这种追求正在于此。和民族的特征是一样的,在历史的很多方面,在民族身上比个体身上更清晰,因为人在特定的时候和特定的环境状况中成群结队地发展。在由需要、热情和表面上的偶然引导的民族事件中比那些因素更有影响的是个体思想精神的原则。这种原则试图给驻留在它身上的内在理念创造空间,它成功了,犹如温柔的植物通过有机的生长冲破容器的束缚,对几个世纪的作用进行了反抗。人类族类和个体除了通过他们的行为赋予人类发展的方向,还留下思想精神独特的形式,比历史事件本身更持久和更具影响力。

也有理想的间接的涉及理念的形式,不是人类个体本身,语言就属于这一类。因为即使民族的精神反映在每种语言里,每种语言也有更早、更独立的基础,它们特有的本质和内在的关系如此强大和确定,因此它们的独立性发挥更大的作用,因此每种重要的语言作为理念表达和理念作品的独特形式出现。

一切可思想的永恒的原理以更纯洁和完美的方式能存在和发挥作用、了解一切身体和思想形象的美、认识每种力量根据内在法则在作用上不可更改的真相以及在永远都进行自我矫正和自我责备的历史事件无情发展过程中的法则。

不能直接发现世界统治的计划,而是只能从反映这些计划的理念上预测,对这个人类的观点来说一切历史是理念的实现,在理念中同时存在力量和目标。人们通过对创造性力量的深入研究,就可以在更正确的道路上找到思想自然要去

追求的终极原因。历史的目的只能是通过人要全方位以及用一切形象来描述的理念的实现,在这些形象中最终的形式和理念能结合,历史事件的发展进程只可能在形式和理念不再有能力互相参透的时候中断。

这样我们就到达了这里:发现理念,这些理念得引导历史学家,现在能回到上面提到的对历史学家和艺术家进行的比较上来了。对艺术家来说是自然知识和研究有机结构,对历史学家来说就是研究生活中出现的行动和痛苦的力量;对艺术家来说是比例、匀称和纯粹形式的概念,对历史学家来说就是在世界历史事件内在关系上发挥强大作用的但不属于他们的理念。用最终和最简单的分析来说,历史学家的工作就是对理念追求进行描述,这个理念就是获得现实的存在。因为在最初尝试的时候理念不是总能成功,当它不能控制对抗力量的时候也常常会蜕变。

这个研究过程想记录下来的有两个东西:不能直接感受到的理念统治着一切发生的事情,只能在事件本身认识这种理念。历史学家因此不能只在物质的材料里去寻找一切,把理念的支配作用排除在历史描写之外。他至少应该给理念的作用留一席之地,他得走得更远,让他的个人性情对理念保持敏感和活跃,去预测和辨析这种理念。但他得首先提防所有任意赋予现实创造性理念的东西,或者因为寻找整体内在关系而牺牲生机勃勃的富足的个体的一些东西。这种自由和敏感的观点一定要变成历史学家的天性,这样他把这种观点带到对每个事件的研究中去。因为像上面显示的那样,没有哪个研究是完全独立于普遍的联系以及独立于发生和存在的事情并超出直接感知范围的一部分。如果历史学家缺乏这种自由的观点,那么他认识历史事件就缺乏广度和深度;如果他缺乏宽容细腻敏感的情感,他就会损害简单和活跃的历史真相。

12 论性格

[节选自《18世纪》](1797年)

本文节选自洪堡想写但未完成的性格学研究成果《18世纪》。1796年洪堡为计划中的《论人性的思想》，尤其为他想写的18世纪的性格学收集了大量的材料，1797年刚开始写作，但因为这年去德累斯顿、维也纳、巴黎被迫中断了，《18世纪》的第1、4、5章跟我们这里选编的内容有紧密的联系，本篇是节选自第5章（出自特格尔庄园的遗稿），参见洪堡1796年2月给席勒、1797年2月给布温克曼、1796年6月16日和12月23日给沃尔夫的信。

人比他表现出来的一切言行以及感受和思想更丰富并与之有所不同。当人从现在开始想概括一切原始的东西并把它一下子表达出来,无论多么准确地了解个体,也只是了解他外在表现的某些方面而从未满足自我。人的一切计划和思考可以不太困难地发展到达某个时刻,如果人们达到那个思想或者决心产生的时候,那人就突然像处于未知世界的边缘,在世界本身还处于朦胧的黑暗状态时,从中产生了支离破碎的现象。但正是这最初的动力,这种内在的力量构成了个体原始的本性并促使一切都活跃起来,包括最能使人显得高贵的东西、崇高的思想、美德和英雄气概,而伟大的行为和天才的想法又正是来自这些思想。

每个人不仅在历史的长河中也在个人生活的小圈子中容易想起那些人:他们平时一点没显示出特殊的力量和活力,在危难时刻突然显示出非凡的毅力或者勇气十足的决断力,这好像突然使他们鹤立鸡群。谁没有从法国大革命这么多场景中看到活生生的例子?人们徒劳地试图从向他展示的熟悉的原则以及人的生活准则中解释这种高尚的性格,人无论想探求得多远,都没找到任何使人抱有这种伟大性格的希望。人们也习惯说是不寻常的(社会)状况激发并激励了这种精神,即便如此还必须有一种已经存在的能激励这种精神的力量,这只能是内在的隐藏起来的性格特征,这种性格特征绝不能用大部分已经发展得很明晰的概念或普通的感觉来衡量,而可能是长时间地处于沉寂状态,但如果机缘巧合也会突然活跃并全力迸发出来。这种性格特征不大是理智原则纯粹的结果或者思考的成果,而更多的是纯粹的原始的天性,因此不如说那些原则受这种性格特征的影响,我们也几乎是在相反的情况下用经过训练的理解力和大量的知识遭遇这种性格特征。因此通常在相同条件下这种性格在女性身上比男性身上,在原始粗鲁的民族身上比在有教养的民族身上,在有教养的民族里在社会下层比在社会上层表现得更强烈。一定程度上文明(的发展)似乎削弱了这种动力,

不言而喻,这是通常伴随着文明但并非必然根植于文明之中的一个缺点。持续不断地研究原因和结果之间的关系,探求一切行动和事件的目的容易削弱活力,如果不考虑一切目的而带着这种活力人们只因为自己的缘故喜欢或者厌恶一个对象,因为这种活力是最高贵和纯粹道德倾向以及只建立在偏见和情绪基础之上的东西所特有的,因此它常常不是针对所属的客体而是被文明完全毁灭。道德倾向最初在人身上也是本能存在的,也很容易出现这种现象:文明通过理性歪曲玷污这些倾向,理性要阻止这些倾向不再保持本能。因此不可否认:我们常在人身上遇到一些现象,这些现象是我们从仔细完整地观察到的一切外在表现中无法理解更无法解释的。这必然把我们导向他身上内在的原始的力量,这种力量构成了他的本我和他真实的性格特征,我们也许能用前面提到的方法接近这种力量,但我们永远不能希望完全揭开它的真相。

在教育中,正是这种(原始)力量常使我们的希望落空或使我们的努力徒劳无益。原始的本性,学生天生的性格反抗每种消灭或从根本上改变他的企图。还有一种很普遍的现象:接受同样教育的兄弟姐妹在童年时期就显现出来的性格差异一直持续到成年。没有哪种活跃的力量只是痛苦地反对外来影响,无论人们如何想从外部去加强、引导和支持这种力量,在这种力量身上发生的一切都是它自身特有的内在活力的作品,如果我们抱怨这种反抗,人的天性也让这种反抗和明智的教育相对立,我们就不能忘记,如果缺少这样一种反抗的力量,那么获得吸收的能力也是不可能的。人以更出色的理性拥有我们通过整个有机自然碰到的这种内在独立自主性。在人身上可能发生作用的范围更广泛,但能保证成功的可靠的规律不怎么确定,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自由不能和天性一样被估计,因此除了人的普遍特征还要考虑个体独特的特征,因为个体也有原始的性格特征,我们要仔细研究人出生的那个时刻,这样我们才会遭遇已经存在的特征。

因此想完全从影响人的外部环境推导并彻底把握和描述人的天性是绝对徒劳的努力。人想如何深入、如何接近真相,最后总遗留下一个未知数:原始的力量、原本的自我和生命同时被赋予的个性。人的自由以此为依据,这种力量才是人原本的性格特征。

在我们继续研究之前,为了碰到可能容易出现的异议,得在上面得出的结论上停留一会儿。因为谈到原始力量,就好像我们要强调人原始和天生的道德差异,因为我们把这种力量当作不可消灭的、每种外来影响也不可征服的东西提出来因而就产生了不少尴尬,就是使这种内在的困难和完全普通的对道德的要求相一致。

在最准确和最严格的理解上一个人是否天生和其他人不同,或者是否最初所有人共同的特点只是因为每个人特别的社会状况被改变或个性化了,这是一个完全超越我们经验和认识范畴的问题。我们评判一个人不是直到他走完人生的大部分阶段,不是根据他人生的长短,而是根据他的进步的大小,因为我们能评判的一切总是外在环境和内在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因此我们永远不能把这两种总是同时对我们起作用的外在环境和内在力量严格地区分开来。一切我们能把握强调的就这么多:任意一种力量无论是对等或不对等的(如果人们想允许自己作本来无权作的评判的话,虽然不对等的概率大些),首先独立于它周围的一切环境而存在,因为此外没有从外界对它产生作用的东西存在,另外对我们来说正好如此,似乎我们在许多人之间观察到的差别事实上天生就存在,因为一个孩子在离开母亲的怀抱之前,就处于一种特定的状态,因为他感受到的这种状态以及身体的特征在他一生中对他的性格产生深远、持久的影响,因为这一系列原因是处于我们经验范围之外的,因此我们也有理由把这些事实上从外界产生作用的差异看作是原始和本质的特征。

把道德的人和生理上的人一样作为科学研究的对象,并因此使道德的人成为纯粹自然生物系列中的一员,肯定是份

可疑的工作,这个工作要求非常小心,因为研究者常常完全把这个具有客体独立尊严的工作作为纯粹的工具置于他研究的终极目标之下,专横地只为了他自身的目的对待这份工作,因此经常并普遍出现的现象也作为铁定的不可更改的自然规律被强加给道德天性。因为这个天性是完全自由的并且没有什么能反抗理性和意志的规定。只要我们在哲学研究中接近无法解释的自由的秘密时,我们就感到陷入了无数的困难和表面上的矛盾中。一方面我们不能否认,每种自然可能赋予我们的性格特征,也必须置于我们意志的力量之下,一旦长久地保留这种性格是不道德的,就要消灭这种性格;另一方面我们得承认,不能以任何一种方式消灭一种真正的原始的天生的性格,我们能削弱、改变,但永远不能根除它,因此它不是在每次变化中都是可见的。如果自然告知我们一种与我们思想精神的道德教育完全不相容的性格特征,怎么办? 如果人,像一些哲学家试图说服我们的那样,是一种纯粹自然程序的结果,只依赖于命运把他拖入的环境中,那这个矛盾事实上是不可解决,危险也是不可避免的:偶然的力量让我们正好成为坏人如同现在成为疯子一样。但这个乏味和违背理性的结果表明,人身上原本有种力量,这个力量按照天性为了利用外在影响而控制了外在影响,这是我们后来才认识到的道德的力量是从他最初存在的那一刻起就以一种崇高形象出现在我们面前的力量。人从他第一次呼吸开始就是人,他原始的性格特征只能是他个人独特的性格特征,来自这个个体的我们称之为理性的东西只能是一种形式,在这种形式下我们最清晰、最确定地辨析自身无法解释的力量。在某种个体独特的性格好像给道德设置障碍的地方,这些障碍可能总是来自性格偶然的特征,永远不是建立在他的本性之中。人们可以设想这是一个恒定的原则:天性永远不用不可克服的困难来反抗理性(就是在人们能将两者互相对立的意义上说的,因为模棱两可的表达,天性造成了整个误解)。

无疑这是正确的,因为理性忠实于自己并无条件地追求道德上必要的、生理上能达到的东西。天性自然而成功地反对这样愚蠢的做法:消灭自己的性格特征去接受完全陌生的性格特征,因为天性一定支持纯洁和提升自己性格特征的努力。

这里人们也证实了一切思想教育的两条主要规律:一方面是自我教育,允许自己在独特的道德研究中不考虑身体、性情或习惯等表面上的困难;另一方面是其他人的教育,找寻他们独特的个性并非常严格地忠实于这种个性。牢记这两条规律是很有必要的,尤其在屈服于偶然的困难的环境和生理天性这个弱点和片面的使一切天性都服从一个标准的要求普遍盛行的时候。

13 论语言作为特殊思想形式的特征

[节选自《拉提乌斯和海拉斯》]
(1806年)

本文是洪堡写在《拉提乌斯和海拉斯》中的一段插入语，它显示洪堡开始转向语言学的研究(1806年)，虽然他语言哲学方面的主要思想反复出现在朋友圈中，最终成形是在《论比较语言研究》和卡位著作* (见17卷本《洪堡总集》第2卷)中。

* 卡位著作，指洪堡关于爪哇岛的语言著作。*Kawi-Werk*，卡维是爪哇岛的语言，是印度文化和本地文化相结合的产物。——译者注

大部分伴随民族生活的状况、居住地、气候、宗教、国家宪法、风俗习惯等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跟民族相分离,甚至在激烈的相互作用中,他们在教育上给予和感受到的东西也能被分离。只有一种东西具有绝对不同的天性,它是民族的气息、民族的灵魂,它也亦步亦趋地跟随民族并不断地引领着研究——它就是语言,人们可能把它看作正在起作用或被影响的东西。

如果不使用语言作为辅助手段,每种有关民族特征的尝试都是徒劳的,因为语言反映了整体性格,同时单个的个体为了在普遍中显现出来也融入作为民族普遍理解手段的语言中。

事实上,个体的性格通过两种方法体现,即种族来源和语言融入民族性格。看来,种族来源在民族通过语言产生之前作用不大,因为我们很少发现孩子身上具备父辈的性格特征,但总是发现,一代人身上具有他们种族的特征。

语言同时也是一个很方便用来把握性格特征的依据,它是事实和理念之间的手段,因为语言是根据普遍的至少模糊感觉到的原则构成的并且大部分也是从已有的材料中组合而成的,因此语言不仅提供比较几个民族的方法,还提供一条追踪一个民族影响其他民族的线索。

我们必须暂且研究、阐释希腊语的特别之处,希腊语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希腊人的性格或者希腊人的性格在多大程度上体现在希腊语中。

如果描述个体或民族的性格特征已陷入尴尬,那描述语言的性格特征更甚,谁尝试过,谁很快就会觉得左右为难。如果他准备说一些普遍的东西,他就变得不确定,如果他想深入个别的部分,他就漏掉了特定的形象,就像一片遮住了山峰的云,可能从远处看显出一种特定的形状,但在雾中又模糊起来,描写语言的特征就像踏入相同的境地一样。因此为了出色地克服这个困难,有必要首先更详细地讲讲跟语言

无关的东西,并说说个别语言之间可能存在的差异。

语言通过习俗产生,词汇只是独立存在的事物或一个概念的符号,这种狭隘的观点对每种有趣的语言研究产生最坏的影响。这在某些时候无疑是正确的,但更多时候也绝对是错误的观点一旦开始处于支配地位,就毁灭一切思想精神并摧毁一切活力,人们把经常重复出现的下面这些套话归功于这个观点:语言研究只在为了外在目的或者偶尔发展不娴熟的力量时才有必要,最好的方法是最快捷地导致机械理解和使用一种语言;如果人们能正确利用语言的话,每种语言大约都一样好;可以更好的是,如果所有民族通过使用一种或同一种语言互相理解。可能还有针对这种偏见的东西存在。

如果进入更深入的研究,发现情况恰好相反。

词汇用于表达一种事物或者一个概念时无疑是一种符号,但根据词汇的构成方式和它的作用它又是特立独行的事物,一个个体。所有词汇的数量——语言是一个世界,这个世界处于我们外在显现和我们内在影响之间的中心位置。倘若族类的分支互相理解,语言自然以习俗为基础,但个别词汇先是因为说话者自然的情感而形成并通过和听者相似的自然的感觉被理解。除了使用语言本身,语言研究表明,一般来说在人和世界之间,特别在人和每个民族之间有相似性,这种相似性表现在语言中,因为展现给世界的思想精神不是能通过大量的观点被详尽认识的,而是每种新的语言总发现新的因素,因此不如说增加千差万别的语言是好的,就像允许增加地球上居住的人的数量一样。

大致说来,我们这里谈到的是对语言的本质作了一个尽可能短的分析,从这个分析中可以看出,特殊的语言之间在哪些方面有所不同并且在价值上根据程度不同可能有差异。

语言只是思维的一部分,追求将外在的印象和内心还模糊的感觉变成清晰的概念并将这些概念相互整合以创造出新的概念。

因此为了促进人与世界这两者之间的作用与反作用,语言必须接受他们的双重本质,或者更确切地说语言要用独特的新创造的东西来消灭两者原始的天性,以及客体和主体的现实性并只保留他们各自理想的形式。

在我们继续解释之前,我们要暂时确定在评价一切语言时的最根本和最高的原则:语言总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更高的价值,在这方面语言同时容易获得关于世界忠实、完整和充满活力的印象,有力和激动人心的个人性情的感受以及把两者理想地结合成概念的机会。

因为应该理想地吸收和掌握现实的被理解了的材料,因为是统一的和同一个的客观性和主观性只是因为主动的行为让内省与它们互相对立时而有所不同,还因为理解也是真正的并加以改动过的自觉行为,因此两种行为应该尽可能准确地结合在一个东西里面。

也就是说,在原始的控制个人性情和世界的基本形式之间应该存在一种自由的和谐,这些基本形式本身是不能被清楚地观察到的,但一旦思想精神处于正确的气氛中它们就会起作用,恰好语言作为无意从自然对千百万人产生的自由和天然的作用中,通过几个世纪以及在遥远的地方出现的产物,作为巨大的、无法解释的、神秘莫测的团体,能够创造出这种气氛,能够创造出比个人性情和世界更多的其他的东西。

词汇很少是它指代的事物的概念,也很少是纯粹的暗示,因此要和理解力一起思考或者和想象力一起阐释这个事物。词汇通过可能性与概念区分开来,词汇表达的事物根据最千差万别的观点,以最千差万别的方式通过自身特有的感性的形象与纯粹的暗示区分开来。谁说出“云”这个词,既没想到定义也没想到这个自然现象特定的概念。自然现象所有千差万别的概念和形象、一切跟着感知而来的感受、所有一切跟自然有关的对我们内外起作用的东西都能突然展示

给思想精神,并不会产生迷茫的危险,因为有种声音黏住并束缚了它。当他可以做更多事情的时候,他从曾经在他身上出现过的感受出发回到这个或那个那里,当他像在这里(为了找到这个词,人们可以把波浪、波涛、翻滚、风、吹动和森林等相比较)很重要的时候,他自己以和对象相称的方式把心灵调节得与它相似,一方面自己调节,一方面通过回忆与它相似的其他东西调节。因此词汇作为绝对具有独特本质的事物出现,当词汇通过感性的赋予天性的形式使超越一切自然的理念成为可能时,就这点而言词汇和艺术品有相似之处,当然也只是在差异存在的时候。这个超越一切自然的理念正是使世界的对象能被用作思维和感受的材料的东西。因为每次被阐述的东西既不需要被完整地描述也不需要记录下来,不如说不确定的对象自己总是提供新的变化,缺乏这种不确定性主动的思维是不可能的。感性的活跃是思想力量在语言使用中活动的结果。思维从来不单独处理一个对象,从来不在现实的整体上需要对象。思维挑出关系、状况和观点并组合它们。词汇远远不只是能将这关系、状况和观点塞进去的空洞的低级载体,而是感性的形式,这种形式因为非同一般的简单直接而表明:表达出来的对象只根据思想的需要被展示,这种形式因为来自思想自觉的行为而不让理解的精神力量超越界限,因为它们变化的能力以及与其他语言因素的相似性为思想努力在世界中找到并在作品中创造的一种内在关联作准备。最后这种形式因为他的短暂性不在任何一方面驻足,而是要求一切都指向那一贯的目标。从所有这些方面来看,感性形式的类型(如果这种感性形式不对继续需要研究的多种多样的方式产生影响的话,是难以被猜想到的)绝不是无所谓的并且有理由断言:在绝对感性的对象上,不同语言的词汇不是完美的同义词,谁说出希腊语和德语中“马”这个词时并不表明他就能绝对完美地是在说同一个词。

谈到非感性的对象时更是这样：词汇在非感性的事物上远远更比感性的事物偏离符号通常的概念，这时词汇要求更多的重要性。思想和感受在一定程度上还具有更不确定的轮廓，还可以从更多不同的方面来把握并在更多的千差万别的感性的又能激发自身特有的感受的形象中来被描述。这种类型的词汇即使显示能完全变成定义的概念也不怎么能被认为是同样重要的词汇。

14 文化教育部报告 [节选]

(1809 年)

本文是洪堡 1809 年 12 月 1 日写给国王的官方报告,副本保存在国家档案馆里。洪堡 1804 年在歌德面前曾表示不赞同裴斯泰洛奇的一些做法(8 月 23 日的信件,文献见路德维希·盖格:《歌德与洪堡兄弟的通信》,柏林,1909。[*Goethes Briefwechsel mit Wilhelm und Alexander v. Humboldt. Hrsg. v. Ludwig Geiger: Berlin 1909*],歌德还让人把这意见刊登在大众文学报的知识界专栏里(文献见盖格,第 327 页);穆特西乌斯的《歌德和裴斯泰洛奇》,莱比锡,1908,第 49 页和 248 页, *Muthesius: Goethe und Pestalozzi, Leipzig 1908, S. 49 und S. 248*;参见给卡洛琳关于策勒机构示范作用的信(卡洛琳,17 卷本《洪堡总集》第 3 卷 282 页)。

文化教育部的管辖领域非常广泛：民族的道德教育、民众的教育、负责给全国各行各业培养人才的课程教育、上层社会需要的高雅的教养方式以及在大学和科学院培养博学的人才和研究意识。我可以这么认为，如果我渐渐地把文化教育部的工作分别集中到这些领域却又不对他们进行监督管理，而是注意观察，所有这些领域是如何自主发展成长的，这是用有害的方式在分散文化教育部的工作。我的主要目的是制定基本原则，严格按照这些原则执行，而不是用过多的方式来进行强有力的影响，并让那些需要建议和基本指导方向的领域顺其自然地发展。

困难在于，让民族愿意并保持这种倾向：遵守法律，衷心拥护君主，在个人生活中有节制、有道德、有宗教信仰，工作积极，最后愿意献身于严肃的工作，摒弃肤浅的轻率的娱乐行为。

要做到这点，民族一方面要对他们的义务有明确清晰的认识，这些认识首先是通过虔诚逐渐变成自然的情感形成的。这个前提是普通老百姓也不能缺少的，在此基础上发展出科学和艺术上最高级的东西，（如果不是用自然的情感而是）用其他方式这种东西容易变质为无益的博学多才和狂热的梦想。

因此最大的努力在于：通过整个民族根据不同层面的理解力让感受建立在明确清晰的概念上并深入灌输这些概念，以至于这些概念在行动和性格中清晰可见，而且永远不要忘记，宗教情感对此提供了最保险和最好的方法。

渐渐地，文化教育部还找到一个促使启蒙的宗教虔诚方面的令人舒适的结果与规划得当的教育紧密结合的迫切理由：教育对下一代比对现在这一代人产生更多的影响。如果人们认为，如果忽略成年人的道德和宗教虔诚，最好的课程可以对年轻人产生真正的有益的影响，这绝对是错误的看法。

如果要成功地开始改善民族的工作，人们得齐头并进并

且不要认为,可以消除前面提到的偏见,就像教育对年轻人一样,礼拜仪式也肯定对成年人产生影响,只有教育和宗教这两者相辅相成,成功才是真正大有裨益的。毋庸置疑,现在对孩子教育关心过少已经对那些没上学的年轻人以及成年人的道德产生了不好的影响,道德的畏惧从那些真正受过严格道德教育的孩子身上自动迁移到还没道德败坏,只是漠不关心的父母和其他人身上。

我想能向尊敬的陛下保证,教育部用这种方式首先打算做这个构成所有国家基石的东西;到处都用最简单和最自然的方法,而放弃一切人为的方法;不是片面关注博学多才和高雅行为,而是注重改善性格和思想意识,不是只想着民族的个别部分,而是注重民族不可分割的整体。^①

教育部有一些原则,这些原则在工作中被用作评判标准,到现在为止教育部实际很好地遵守了这些原则,比口头上说的要多,这篇报告开头提出的观点就是建立在这些原则的基础上。

教育部制订普通学校计划考虑了国家全体成员并尝试促进人的力量的发展,这种力量是每个阶层都需要并很容易和每种职业都需要的能力和知识结合在一起的,教育部的工作就是安排不同级别和种类的学校,以使每个臣民,尊敬的国王陛下,在学校里能被教育成有道德的人和良好的公民,就像他的情况允许的那样,没人用对他余生毫无用处和毫无必要的方式接受他上的课程,通过下面的方式有望达到这个目标:在教学方法上不是只注意学了这样或那样,而是在学习中训练记忆力、增强理解力、纠正判断力和使道德情感变得高尚。

通过这种方式,教育部就获得一个比最近在其他一些德国邦国中受欢迎的简单得多的计划。在这些邦国中尤其是

^① 下面省略了有关文化部的段落。

在巴伐利亚和奥地利^①,人们几乎尝试特别照顾到每个阶层。我坚信这是绝对错误甚至跟人们想达到的终极目标背道而驰的。

绝对有些特定的必然的普通的知识,更有每个人都不能缺少的特定的对思想意识和性格进行培养的教育。如果每个人自身并且不考虑他特殊的职业是一个好的、正派的、根据他的社会地位进行过启蒙教育的人和公民,这个人显然就是一个好的手工业者、生意人、士兵和商人。如果给他上课(这是必要的),那么他以后就能轻松地获得他所从事的职业的特殊技能并永远拥有从一种职业转到其他职业的自由,像生活中经常发生的那样。

如果人们从一种特殊的职业开始,那么人们就会使他变得片面,他永远达不到熟练和自由,为了在他的职业生涯中不只是机械地模仿别人在他面前做的事情,而是自己做到扩充和完善,这种自由是必要的。人因此失去了力量和独立,因为一些职业比如士兵和商人从事的职业是依赖政府的,政府自己承担这个责任,如果政府只把人教育成士兵和商人,这些人也必须用于这些职业并给这些职业提供后援。尊敬的国王陛下,如果生意一点都不被看作供给,如果每个人更多的是出于对重要工作的喜欢而不是为生计的缘故从事这份职业,如果政府让人离职的时候不是抱着给人口粮这种讨厌的想法,而是能相信,在离职的时候另外的行业需要他,生意会更好更有成效。

最后困难出现了,就是在孩子或年轻人身上常常很晚才能正确确定未来的职业,他的可能使他献身于其他职业的天赋能力险些没被发掘,险些被窒息。

因此只要教育部能影响的地方就让手工业、商业、艺术等特殊专科学校都上普通的课程,并谨防出现职业教育和普

^① 正如第8篇文章注释3提到的(第82页)并参见鲍尔生的《文法学校的历史》,第二卷,1921第479页. F. Paulsen: *Gesch. d. gelehrten Unterrichts*, Bd. II. 1921, S. 479.

通教育相混合的情况。教育部认为普通的学校机构是自己管辖的,通过特殊专科学校教育部和涉及自己的其他政府机构保持联系。

根据教育部的计划,城市里只应该有小学和文法学校。

在小学应只教那些作为人和公民必须知道的知识,在文法学校应该分阶段教那些对每种也是最高级职业必要的知识,每个人达到的教育程度要根据他在学校度过的时光以及他在学校达到的年级来定。因为一个城市的所有学生不可能也不应该是一样的,因此也要有小学能教授更多的扩展性和完整性的课程,因为富裕的人家在同一所小学为他们的孩子付出了更多的学费,另一方面小点的不可能拥有大的可以上到大学的文法学校的城市,就要有教授一部分文法学校课程内容的教育机构。

采用以上这种方式也不会缺乏人们习惯称之为中学和市立中学的学校,没有哪个阶层会缺乏一个促进他教育的学校机构,这样各地都是统一的计划,因此从一个学校转到其他的学校就能毫无纰漏了。

文法学校到目前为止犯了个错误,就是在学校只教授语言并以一种方式授课,如果没有上完这个课程的话,花费到这上面的时间几乎完全是损失了。

教育部是可以采取补救措施的,并且也开始实施了,在每所文法学校除了古典语言课还设置数学和历史课,这样每个学生都不允许完全冷落任何一门课程,而且能根据自己的天赋优先专注于其中一门学科。

在语言课上教育部应该普及下面这种教学方法:即使人们忘记了语言本身,这种教学方法也能使学生最初学到的东西终其一生都是有益和宝贵的,这种方法不仅训练学生的记忆力,还增强他们的理解力、检验他们的判断力,以便让他们获得普遍的观点。

教育部要特别注意:在一个人的能力被检测为可以转校或转级,以及老师确信他已达到了相应的级别可以转校或转

级之前,他不能从一个低级学校转到高级学校以及在高级学校从低年级转到高年级。绝对不允许在未满18岁之前上大学。

教育部希望保留因尊敬的国王陛下的厚爱而同意的国家财政拨款来委托市镇维护和完善城市的教育事业^①,尽管初步尝试失败了,我还得请求尊敬的国王陛下原则上不要放弃这件事情。这不仅对学校而言是必要的(否则学校无法得到帮助),对公民来说也是有益的,如果他们把学校的完善看作是他们自己的事情,他们将具有更强的公民意识,甚至更有兴趣参加学校的课程,即使公立学校花费他们一定数量的钱财,他们肯定倾向于更好的公共教育而不是私人教育,最后如果他们有一些牺牲来关心孩子的道德,他们会变得更道德。人们不可忽略这里或那儿可能产生的矛盾,在真正的集体精神形成之前,还不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有理由从优秀的城市规划那里期待什么,某些个别成员可能会赞同的协会团体常会反对,在这些社团中思想正直的人会高兴,如果其他人被迫因为最有说服力的理由不能不考虑的话。

在我任职之前,国务委员尼克洛维乌斯^②直接在内政部长的领导下带领公共教育部首先对农村的小学开展了一项活动,我深信这个活动特别有成效,我指的是对行政委员策勒的任命^③、在黑森州孤儿院里成立普通机构和有计划地在全国推广更好的教学方法。尽管策勒对裴斯泰洛奇的方法

① 施泰因男爵1808年的城市级别,德国城市自我管理“马格纳·卡尔塔”。施泰因也要求教育税,就像洪堡在这里赞成的一样,也暂时征收过。见里希滕·施泰因的《普鲁士裴斯泰洛奇学校改革的危机年代》,见《教育杂志》1955年第二期第100页。E. Lichtenstein: Aus dem Krisenjahr der Pestalozzi-Schulreform in Preußen, Zs. f. Pädagogik 1955/2, S. 100.

② 1767—1837年,文化部部长,1817年后任教学部部长,参见弗里茨·菲舍的《路德维希·尼克洛维乌斯,斯图加特,1939. Fritz Fischer: Ludwig Nicolovius, Stuttgart 1939》。

③ 见第7篇文章第80页注释^①,策勒尝试结合贝勒·兰卡斯特和裴斯泰洛奇的方法,见里希滕·施泰因的《普鲁士裴斯泰洛奇学校改革的危机年代》。教育杂志,1955年第二期第90页。E. Lichtenstein: Aus dem Krisenjahr der Pestalozzi-Schulreform in Preußen, Zs. f. Pädagogik 1955/2, S. 90.

作了一些重要的改进,但本质上他的教学方式还是裴斯泰洛奇的。

因为我从我自己的经验中得知,给这种方法界定一个明确清晰的概念是多么困难,因此不管策勒的教育和教学方式是否具有裴斯泰洛奇提出的教学方法的特点,如果我斗胆用寥寥数语简单说明策勒教育和教学方法的特点,请尊敬的陛下原谅。因为教育部和我绝对信任尊敬的陛下,也许您不相信,我们打算在您至高无上的国家实验性地引入这样一种新的方法,我们虽然给予那些要进行改进措施的人必要的自由,但一步一步地检验他的方法,在我们有能力确信批准的时候,允许他进一步行动。

策勒学校的特点在于:学生教育的目的、他们的课程以及推广和评价这种教育和课程。

就教育这方面来说,学校的特点是:

(1)无论如何,教育和课程总是紧密结合。没有真正的教学时间,像在其他学校一样休息时间之后就是上课时间。

孩子们一整天都在老师的眼皮底下忙活,总是这样他们就清楚地知道,他们要干什么以及得怎样开始。也就是说课程一直贯穿着他们的整个生活。

(2)教育直接建立在宗教情感、对普遍存在的更高级的行为举止的敬畏和敬爱上。

奖励和处罚几乎完全没用,体罚是绝对禁止的,共同的、有规律的、伴随着友好和友爱并结合礼拜仪式和宗教课的生活,宗教课虽然只给他们讲宗教简单的规定、十诫和基督教最初的教义,但会对心灵产生影响,通常要让孩子们学会主动坦白、忏悔和进步。

(3)孩子们也互相进行教育、互相监督。

设置几个让孩子们操心的职务,孩子们轮流交换着做并由他们自己选代表,多少有点像传声发动装置,因此没有这个机构让两个老师给30个孩子上课并监管他们可能比较困难,通过职务的权利和义务孩子们会习惯秩序、严谨和公平。

(4)同时,要采取其他的活动引起他们互爱的感觉:年龄大点的或理解力强点的是年幼和弱小孩子的老师和监护人,他们不是袖手旁观,而是用各种方式照顾年幼体弱的孩子,用这种构成未来生活的方法在早期就在孩子们中间产生喜欢关心和感恩的群体。

(5)在整所学校气氛常常是严肃的,要摒弃一些新的教育方法中特有的玩耍和戏弄性质的东西,只是这种严肃不要吓着人才好,因为到处洋溢着友爱并没有恐惧,每个孩子都享受到在普遍法则下可能的自由。

关于课程方面:

(1)出发点不是以前惯常的那样,孩子们只学习读、写和算等,而是尽可能地协调发展和训练身体和心灵的主要能力,以此让这些能力自发产生。

这和以前的方法是有区别的,在迄今为止的方法上人们只是简单说明这个或那个应该怎么计算,没有引证最直接的原因,相反,新的方法是孩子练习快速准确地寻求数字之间的关系,通过这些数字关系的学习让他们知道以后几乎一切计算都是可能的。

学生运用旧的学习方法,就只能掌握实际学过的计算方式,一旦条件发生变化,他就不能举一反三并且因为没有练习还会忘记所学的知识,这样他只是学会了一种技能而他的理解力并没得到增强。相反,用新的方法,学生到哪里都能举一反三,他永远不会忘记学过的知识,因为他本来就不是死记硬背,而是获得了理解真正的数字关系的能力。

(2)因此上课的内容也要作相应的调整:体育课用来增强体质;画画和音乐用来使眼睛和耳朵习惯匀称和自由;数字关系(其中算术是一部分)、空间比例关系(这个过程中出现了数学原理)、母语方面正确的知识(尤其注意孩子对每个单词有明确清晰的理解)用来训练头脑;最后宗教课和最自然的道德情感的发展用来训练头脑和心灵。读和写就自然成为语言或算术课的一部分;劳动和对一些最必要的手工、

缝纫、制鞋、纺织以及园艺和种植工作的指导要与身体锻炼相结合,这样农民和城市平民也绝对不会学习超越他们(认知)范围的东西。因为如果人们也想面面俱到,数学的基本概念对未来的农民、手工业者和士兵尤其有用,同样,绘画、正确的唱腔服务于虔诚观望公共宗教仪式。

(3)为了在每个教学科目上达到既定的目标,要排除一切机械的做法,整个教学方法的根本原则是:孩子对他每时每刻听到的、说的和做的以及为什么这样而不是那么做永远要有完整而清晰意识。

强迫和使孩子习惯对每件事、包括最细微的事情都作出解释,孩子就在这个过程中学会了清晰地思考、明确地知道自己要干什么以及如何清楚地表述自己的思想。

孩子自己推论所有的概念,同时在老师的指导下发现它们。孩子学什么都不是死记硬背,因此也几乎不需要书本和教具。

(4)一切取决于:能用数学的精确和确定来说明孩子真正掌握了的和还未掌握的知识。因此每门课的课程要分级,老师在还不能确定孩子是否已经掌握所学内容时不能进行下一步教学。

(5)正如前面提到的,通过学习好的孩子给差点的孩子上课,因为好学生为了教会小点的学生,自己得翻来覆去用不同的方法学习学过的知识,他们自己也就越来越熟悉并胜任每门功课。

这样一种清晰、明确和主动的教学方法也会从性格上影响学生的行为方式,使他们能明辨是非,学会采取明确和果断的措施。

如此,为了在短时间内普及与此类似的学校,使用这种教学方法远比用旧的教学方法轻松愉快。因为:

(1)如果固定了上课的方式和方法,在特定的阶段孩子的进步和成功就不怎么依赖教师特别的能力了。

勤奋和努力练习,结合健康的头脑和一些先天的天赋,

甚至可以在短时间内让人,就像被教过的那样,又继续上课。

(2)农村的教职因为先天因素是不能获利的,因此策勒的学校就考虑让孩子们习惯物资的匮乏并知足常乐,教会他们自己设法获得自己想要的东西,并让他们尽可能地利用园艺和种植来增加自己的收入。学校的指导方针就是这样教育孩子,以至于他们将来在不利的环境下也能欣然接受教职并且在令人压抑的情况下也依然满腔热情地坚持到底。

(3)在农村教育事业上大的困难在于几乎不可能给贫困孩子什么教材,因此这个方法要考虑不要使教材成为必需品,一个教学用的石板就几乎是孩子们能得到的唯一的用具,书最好没有,纸、笔和墨水严格地说也肯定不需要。

教育部认为,并且有理由声称,策勒的普通学校已开始符合这里简单描述的学校雏形了。^①

^① 报告接下来的部分还包含一些有趣的内容,有关送到裴斯泰洛奇那里去的埃勒文、教师考核、个别的学校、大学初级阶段和科学院方面的内容,其他的关于洪堡学校政策的文献来自总集以及其他出版物,由哥洛格选编的《洪堡和普鲁士课程管理的改革尝试》,比勒菲尔德、莱比锡,1921。G. Gloege: W. v. Humboldt u. die Reformversuche der preuß. Unterrichtsverwaltung, Bielefeld/Leipzig 1921.

15 歌德的直觉和形象 [节选]

自《论歌德的第二次罗马之行》](1830年)

本文是洪堡 1830 年夏天在加施泰因写的对歌德意大利之行第三部分的评论。

人们很容易把歌德和古典作家或现代一些伟大的作家放在一起比较。容易将他和古典作家相比较是因为整体风格、少年维特和荷马的单纯相似的地方、整体布局、《伊芙格拉》《赫尔曼和多罗特阿》以及一些悲歌和箴言诗；将他和现代作家相比较首先是因为一些戏剧作品、《葛茨》《艾格蒙特》和一些诗作。在《伊芙格拉》里出现了许多跟古代文化有关的东西，在《艾格蒙特》里又是另外一个现代作家的精神在飘荡。如果人们看几篇完全歌德似的作品——塔索、浮士德、一些叙事诗及很多抒情诗，给我的感觉是，人们认为没有哪种比较卓有成效并得出这个结论：歌德只能和自己进行比较。很难用言语来描述歌德这类作家的特征。这不取决于描述，更少地取决于歌德作为作家的评价。这里的目的只是指出，关于他的创作和研究从他自己的报告中得出什么结论，首先会得出如下结论：原则上歌德的创作欲望和他的追求是一致的并且是同一种东西，只是两者的作用不同而已，歌德的创作欲望，就像上面提到的那样，与他对造型艺术的喜好以及在造型艺术方面的天赋交织在一起，他的追求表现在他从（人的）形象以及外在客体出发探索自然对象内在的本质及他们的形成规律。如果人们恰好没注意到这种内在联系，歌德作为作家和自然科学家如此纯粹和决然地朝着两个背道而驰的方向发展，因此似乎可以确定，如果没有这种自然的观点，他的创作会有所不同并且会出现一个问题，他是否获得独特的在自己的发现中活动的对自然的研究方式，如果创作不是这么有力地促使他把词汇变成直觉、在感性现象上找寻更纯粹和更深刻的真理的话。歌德自己认为这种内在联系不像诗和造型艺术的关系，相反，他半风趣半严肃地抱怨“人被许多思想精神追寻尝试”，并追问“为什么现代人对那些他们既不能达到也不能完成的要求这么心不在焉和敏感”（第44页）。事情简直不能没把握。文学创作对每个真正的作家来说永远是一种世界观，这种世界观取决于作家的个性面对现象的方式，并决定个性和现象紧密渗透的相

互作用,这导致无法识别赋予最初冲动的东西,即使是小小的诗作也有同样的要求。作家要解决的任务是用活生生的现象去把握、描述对象和他的必要的连接,它既反作用于个体也反作用于整体现象。仔细观察造型艺术,它涉及自然整体有机结构并要求艺术家全力以赴。它们因与诗歌不同的作用方式而产生差异。作家难以直接感性地描述思想意识,他只能激发听者的想象力,这种想象力创造出来自他自己但由他规定的形式的概念,为此要求听者整个的个性,如果词汇具有活力的话,词汇必须让它的根达到个人性情的最深处。诗歌因此永远不能和特殊天赋一样,驻足在心灵里,诗歌永远包含整个个性,尽管也有这种情况发生:人在诗歌的意识中不是那么贴切地接近被诗意地理解和描绘的东西。从这里提到的差异来看,诗歌是不能用和造型艺术同样的方式来进行训练的,因为造型艺术中的创造不能纯粹地和模仿相分离,节奏和语言如果不持续保持思想和感受就不能像眼睛和手在画画时那样互相适应。来自内心自由的创作也不能是毫无弊端地太表面和太机械地被激发。因此,歌德在上面提到的地方又说:“人们得少写多画。”他以此指出,作家应该尝试在相似的艺术上达到让现实的对象转化成艺术的描述这种技巧,为了将训练过的感官同样地用到他自己从事的工作上,首先必须到伟大的有个性的艺术家身上寻找这种程度的与这些艺术相似的以及两者与自然研究的活跃的感情,这样这种感情又让我们对他们进行更深入仔细的研究。

为了让眼睛感到是可以描绘的,感性直觉在绘画中采用的方法和作家通过完全不同的媒介把直觉展示给思想精神的方法有很大的差异,构思轮廓都不一样,绘画有点像歌德诗中爱神的样子:她炽热的手指轻轻一动,那些东西就像被施了魔法微微颤动,闪闪发光并发出沙沙的响声。因为每种伟大思想精神的文艺创作都具有个体的痕迹,歌德创作方式相似的方面和独特之处在于理解的方式。他自己常常都没意识到,用真正出现的形象去找寻有机或无机事物身上的形

象是造型艺术家的工作。换句话说,试图从重点、必要的条件上去把握形象。因此画家研究解剖学,打破现象是为了重新组织它们,植物、山的形状,通过形成它们的山的类型来刻画,歌德文艺创作中的从创作作用来说依赖的一切都建立在这个广泛的基础上,它们都有固定的结构,每个形象都像出自他的本性,在提出美的要求前才是真的。因此对歌德和其他能和他共同感受的人来说,艺术上可模仿的事物的形象有些永无止境。为了阐明这点,他在事物身上特别是在人身上找到了什么样的错综复杂的东西(Labyrinth,这是他特有的表达方式(第38,214页)),我只需要把歌德支离破碎的表达组合起来。“对人体的研究完全吸引了我,其他的一切都消失了,我的一生尤其是现在因此又变得特别起来。这是不言而喻的。”(第212页)“对人的形象的兴趣消灭了其他的东西,我感到很愉快,我越来越远离其他事物,就像人们远离炽热的太阳一样。一切在罗马之外想研究的东西都是徒劳的。没有在这里学会编织的线索,人们是走不出这种错综复杂的状况的,遗憾的是我的线索不够长,但还是可以帮助我走过最初的几道坎。”(第213页)“我的宏伟理想只是空中楼阁,他们打乱了一个更严肃的时代,我现在研究人的形象,这是人类一切知识和行为的原始动力,我在努力研究整个自然方面做的准备工作,特别是骨科学使我取得了很大的进步,现在我看见,现在我享受最高级的、古代文化留给我们的东西:雕像。是的,我也许明白,人能研究一辈子,最后还想叫道:我现在才看见,我现在才享受。”(第216页)“我如何才能表达,我在这里正如在离别时感受到的,在这瞬间人比人本身更多,人感到,人应该研究的最恰当的东西是人在一切多样化的景象中察觉到的人的形象,但谁在看到的时候没有立即感受到,他就是不完整的,即使准备了也像被破坏了,如果我试图在一定程度上让我自己明白比例、解剖学和运动的规律,在这儿我很容易注意到,形式包含了一切:四肢的匀称、比例、性格和美。”(第322页)“人们还可以找到类似的句

子,从这些地方看出,这里指的是对对象的哪种看法,现象又是如何把握和记录和他相遇的东西的,根本原因在于,歌德在其他地方提到过从他青年时代就驻足在内心的永不停息的本能,直到词汇、名称和“传统对他来说什么都不是,一切都是活生生的概念和直观的知识”。(第7,29页)“练习看和解读事物原本的样子,让眼睛忠实于看到的。”(第27,217页),也就是借助想象和尊重完全撇开(外在的)假象。这在意大利之行中表现特别奇特,歌德强烈地渴望去意大利,从到达罗马的最初几天开始,就像舌头在摇晃的碗里找到了平衡一样*,一切都清晰而安宁,他如此冷静地感受新的印象,最初的切身体会是从来没有如此正确地评价一切,这样的直觉移情到对(人的)形象的理解,他们内在关联的法则和发展的顺序都成为研究的对象,人们也不用担心以此会破坏人物的魅力,仅仅理解和研究都可以是准备工作的一部分并作为辅助手段,还可以制定标准,设定范围,(人的)形象总是一致的、完整的。现在出现了难以理解的、不能通过研究达到的、只能被感觉和被创造的、不能被做的东西,这样艺术品又变成了自然的作品,这可以说是独一无二的,这也证明了,歌德关于造型艺术的说法也适合运用到诗歌中去。“可以确定,古代艺术家都具备关于自然的很多知识,对能被阐述的以及如何被阐述有很明确的概念,比如荷马,遗憾的是最初的艺术品数量太少,人们看到这些艺术品,就只有好好了解并安静地进入这个世界,这些高级艺术品也是人根据最真和最自然的法则创造的最伟大的自然作品,一切专制的、想象的都轰然倒塌,这就是必然性,上帝。”(第80页)有机教育的发展理论跟这个连接上了并继续发展,研究一系列的(人的)形象的规律,不仅从空间上,还从时间上研究他们的发展,什么接近人的内在本质,允许最多样化地运用到思想和感受上去?因此在歌德身上用独立于他们又针对他们的

* 这里指歌德的心不再躁动不安。——译者注

直观能力汇集了自然、艺术和诗歌。文艺创作建立在感知的基础上,这种感知通过遵守有限的个别现象说明:世界是如何无限地需要被感知和被阐释,个别的现象又是如何无法被解释。事物的固定关系、它们变化的发展规律、美的纯粹的标准,一切都在作家的个性中被获得、被认识和被感知,并通过艺术和自然观察的眼睛交给感性直觉和想象力,所有这一切构成形式,个别独特的有兴趣的人用这种形式可以诗意恰当地表现,通过他的天赋再给他支持,他诗意地感受到的一切自动凝结成这种形式,歌德的文艺创作就有这个特点,而这个特点总能让我们佩服不已。

洪堡 人类学和教育理论文集

HONGBAO
RENLEIXUE
HE JIAOYU
LILUN WENJI

上架建议：学术社科

ISBN 978-7-5624-7367-1



9 787562 473671 >
定价：28.00元

责任编辑：李桂英

封面设计： 周娟 刘玲